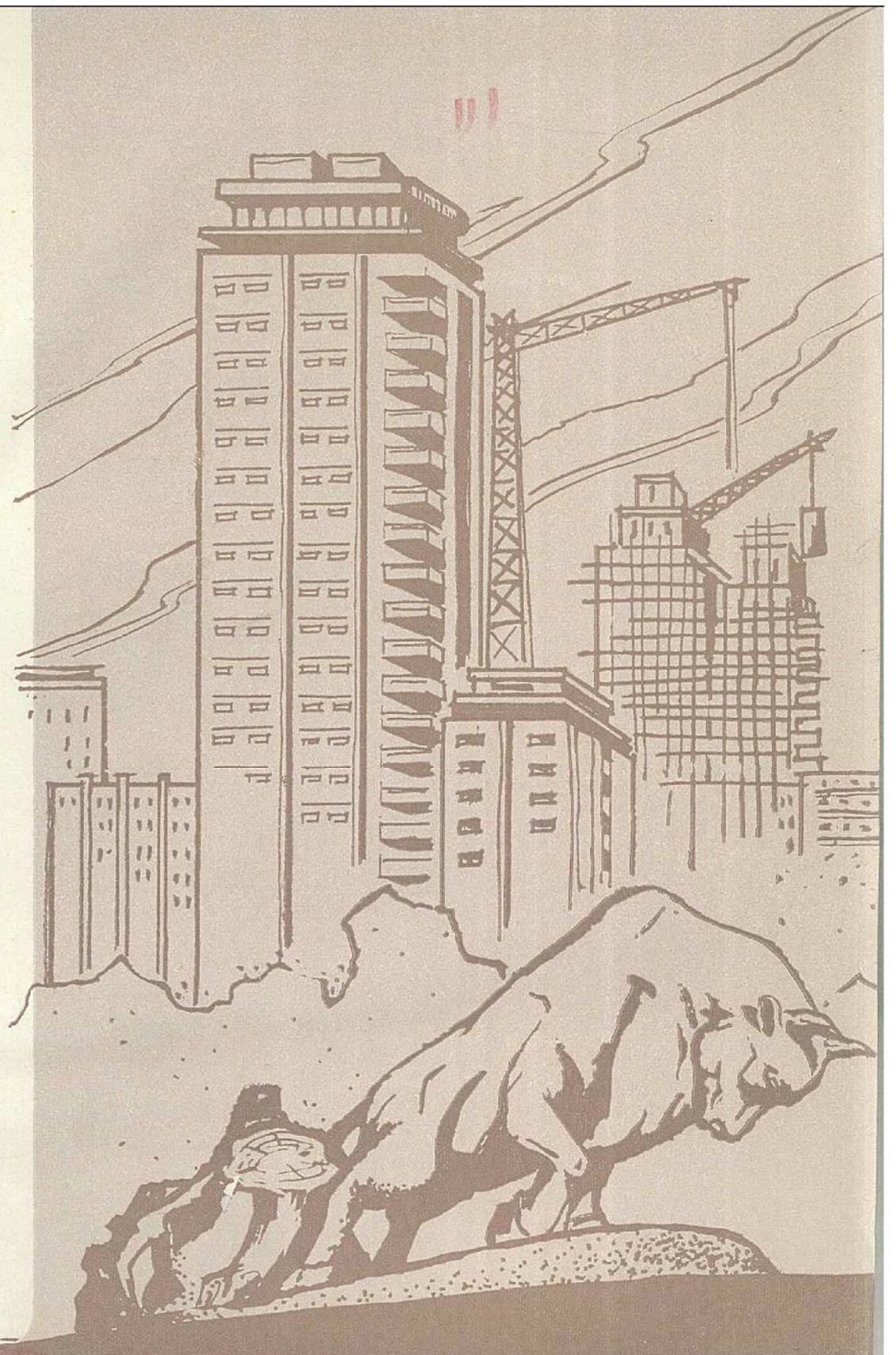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1985 XUESHU YANJIU

学术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目 录

· 经济特区研究 ·

试论深圳特区工资分配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控制.....雷 强 王 璿(5)

从深圳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看国营企业

领导体制的改革.....沈 乐 高颂琪 林 浩(11)

城市体制改革与做好经营工作.....于光远(16)

论社会主义经济竞争.....高伟梧(18)

塘鱼生产与价值规律

——顺德县塘鱼生产情况调查.....杨伟蘊 陈学工 曾牧野(25)

广州东方宾馆提高利用外资经济效益的调查.....蓝桂良(28)

· 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 ·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辩证法.....马中柱(34)

再论“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刘景泉(40)

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剖析.....史贻逵 吴 晖(45)

· 青年论坛 ·

为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出现新的技术革命.....钟 坚(52)

· 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

控制论与社会科学的联姻.....圭 人(54)

浅谈“黑箱”方法.....泽 良(56)

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胜舜(59)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陈善光 (68)
从出土陶瓷看古代中菲关系	张维持 胡晓曼 (7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军事技术的运用及人们对其作用的认识	许锡挥 (81)

· 开发岭南的先驱 ·

东吴首任的交州刺史步骛	何维鼎 (87)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来新夏 (89)
训诂学渊源论略	潘允中 (92)
从哲学和文论的传统认识《文心雕龙》的唯物主义性质	韩湖初 (97)
海南岛教育发展的战略和战术	林尤照 (108)

· 新书评介 ·

《哲学简明教程》评介	方 里 (107)
------------------	-----------

· 来稿摘编 ·

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姜明安 (109)
旧中国市建制设置概述	田穗生 (111)
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	段立生 (118)



书海酌蠡

丘逢甲祖籍不在商丘	李鸿生 (24)
关于郭沫若《赠达夫》诗的写作时间	吴海发 (120)
“枝辩”应是“强辩”	董志翘 (114)
康有为《蝶恋花》词辨	陈永正 (114)
《顾亭林诗集汇注》一补	官大梁 (17)
《红楼梦》标点一得	周林生 苏 海 (44)

· 学术动态 ·

广东社会科学界纪事 (115)	童大林谈广东经济研究的一些课题 (116)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问题论点综述 (116)	近两年来哲学界探讨“两变”命题的部分观点综述 (118)
丘逢甲学术讨论会论点简介 (83)	

封面设计	马丽蓉
------------	-----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 1, 1985)

CONTENTS

Tentative Remarks on the Micro-efficiency and Macro-control of Wage
Distribution Practised at Shenzhen.....Lei Qiang and Wang Ju (5)

The Reform in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State Enterprises as View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at Shenzhen of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on the part of Factory Director or ManagerShen Le, Gao Songqi, Lin Hao and Tan Xinying (11)

The System Reform in C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Yu Guangyuan (16)

Problems Concerning Economic Competition in Socialist Society
.....Gao Weiwu (18)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Raising of Pond-fish in Shunde County
.....Yang Weiyun, Chen Xuegong and Zeng Muye (25)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Benefits as Resulting
from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by the Dong Fang Hotel in Guangzhou
.....Lan Guiliang (28)

Dialectics of Economic System in Socialist SocietyMa Zhongzhu (34)

More on the "Two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Two Transformations"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tter to
consciousness and vice versa)Liu Jingquan (40)

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Shi Yikui and Wu Hui (45)

On Dr. Sun Yat-sen's "Open-doorism"Chen Shenglin (59)

The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ew Advance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Chen Shanguang (68)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Ancient Times as Seen from Unearthed Ceramics.....	Zhang Weichi and Hu Xiaoman (75)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Main Military Tactics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General Comprehension of the Function Exercised by Such Tactics	Xu Xihui (81)
Qu Dajun and His Book "Guangdong Xin Yu" (Notes on the geography, products, customs and climate of Guangdong Province)	Lei Xinxia (89)
A cursory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Pan Yunzhong (92)
The Recognition of the Materialistic Nature of the Book "Wen Xin Diao Long" in Terms of the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Han Huchu (97)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ainan Island.....	Lin Youzhao (108)

Recent Academic Trends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Book Review

Extracts from Our Readers' Contributions

试论深圳特区工资分配的

微观效率和宏观控制

雷 强 王 瑋

一、特区工资分配体制的改革

深圳经济特区在创办初期，基本上沿用的是内地的高度集中的工资分配体制。随着不断增多的外商到特区投资办厂，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工资分配形式，而且，原有的分配体制已经愈来愈不适应特区的经济发展了。1982年开始，深圳特区的一些合资企业采用了新的工资形式。1988年，特区九个国营企业和一些集体企业相继进行了工资改革。到目前为止，不仅国营和集体企业，而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进行了工资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各部门、企业的职工工资收入中都有一部分是浮动收入，它采用双挂钩的分配形式，即与企业盈利和个人劳动成果挂钩。企业盈利多少决定了这个企业职工与其它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的差别，个人劳动表现则决定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工资收入的差别。

第二，单一的固定工资支付形式改成分解的结构工资支付形式，目前，特区各企业工资分解的部分是不相同的，有基本工资+职务或岗位工资+浮动工资+年功工资的形式，有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形式，还有计件工资、承包工资和基本工资+超产奖等形式。这些分配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根据各分配指标在生产中的作用，把工资分解为相应的几部分，每部分是由一个或两个分配指标决定的，这个指标的变动只影响工资收入的这一部分，不影响其它部分，使职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工资变动的原因。

第三，在企业内部，发挥了各级生产组织在工资分配上的作用。这些生产经营组织是指车间、班组和商业企业内部的门市部和柜台。一方面它们向企业承包生产任务、利润指标，对承包的指标完成情况负有经济责任。另一方面它们再把指标分解和落实到每个职工，明确了每个职工的岗位责任。虽然这些基层生产组织起着承上启下的联系职能作用，但已不是过去那种行政的上下之间的联系。例如，新安酒家实行了部门、楼面或门市核算制后，使这些基层组织相互展开竞争，促进了整个企业的生产发展。

第四，一些企业实行第一线职工的浮动工资与企业利润增长情况挂钩，第二线的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的浮动工资与第一线职工的浮动工资挂钩，使企业所有职工的浮动工资都与企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基本上解决了非生产人员的浮动工资难以核定的问题。如，深圳市机械厂的管理人员是根据职务和责任，按工人当月平均工资的110%至150%的幅度进行分配的。后勤人员是按工人当月平均工资的65%至105%的幅度进行分配的，蛇口工业区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浮动工资是按下属各企业职工的平均浮动工资发放的。

归根到底，特区企业的工资制度是以如何促进生产发展作为分配出发点的。刺激职能成为工资分配的主要职能，浮动工资成为工资分配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在职工收入中，凡是能浮动的部分尽可能地浮动，能实行以浮动工资为主的单位都实行了这种分配形式。1988年的九个国营企业工资的改革试点，其利润总额超额完成了24.8%，职工人均工资增长10%左右，1988年的实现利润比1982年增长了24.6%，销售总额增长70%。由于特区生产发展较快，特区职工工资水平增长也较快，这对于特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深圳经济特区的工资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深圳特区的平均工资水平为180—200元左右，相当于广东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1倍左右，相当于全国国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的1.2倍左右。从劳动生产率指标看，特区全民所有制企业比广东省和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平均水平高40%~50%左右。这种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一方面反映了特区的工资起点较高，另一方面反映了特区的工资增长率较快。在创办特区初期，根据当时香港平均工资水平1500—2000港元的最低限的50%确定特区的劳务费，在750港币中，25%上缴劳动保险基金，其余的归职工个人所有，当时折算成人民币为130元左右，所以，当时的涉外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资水平，工资水平就是确定在这样一个较高的起点上的。由于涉外企业工资水平较高，而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资水平纷纷与涉外企业看齐，所以，近两年来，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上赶上了涉外企业的工资水平。目前有些国营企业甚至超过涉外企业的工资水平。从工资增长率来看，1979~1988年，特区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每年递增19%，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3.8%，两者的比例为0.85:1，也就是说，每提高劳动生产率1%，工资增长0.85%。如果加上各种补贴，那么，职工收入水平的增长基本上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同。所以，特区生产发展速度高，工资增长率也高。这种较高的工资水平和增长率对特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它具有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较高的工资水平和增长率对特区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有利于吸引内地有技术的职工和生产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到特区工作，对内地的人才流动具有较大的吸引力。目前，在特区熟练的技术工人是非常缺乏的，虽然这种缺乏技术工人的紧迫感还未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随着引进技术项目愈来愈多，

对职工消化和掌握技术的能力的要求愈来愈高，这个矛盾就会暴露出来。所以，吸引较多的内地技术人员能够弥补特区的人才不足，缓和特区这一矛盾，并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另外，也有利于稳定当地劳动力在特区内就业，减少劳动力的外流。第二，较高工资水平，既有利于增大货币购买力，加速产品的价值实现，进而缩短生产——消费的周期，尽快地收回周转资金，也有利于增加储蓄，为生产建设提供更多的积累。第三，高工资水平对已经开工投产的企业来说，可能会增大成本、提高价格、减少市场竞争力，但这正形成一种外在压力，使企业改善管理，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消耗。如果工资水平总比其它地区低很多，那么，一些已投产的海外企业无须采用先进技术，也能够得到较大的利润，这就削弱了引进技术的动力。

其次，高工资水平对特区经济发展也具有消极的影响。第一，高工资水平不利于吸引外资，在其它优惠条件不变情况下，比如规定廉价的土地使用费、税收优惠和管理从简等，劳务成本费用的高低就成为一个主要吸引外资的因素。劳务成本费高一些，对外资的吸引力就少一些；相反，劳务费低一些，对外资的吸引力就会大一些。劳务费增长慢一些，所保持的吸引力的时间就长一些；相反，劳务费增长快一些，这种优势消失的也会快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外商投资，无利是不来的，要吸引他们来，就要让他们感到有利可赚，而劳务成本费用的高低成为吸引力大小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且比其它优惠条件都重要一些，因为它直接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劳务费低些，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第二，高工资水平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竞争。目前，特区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的，1983年，电子装配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8%，纺织工业占9.47%，这是特区产业结构中，产值所占比例最大的两个行业。这类行业主要是使用劳动力为主，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所以，在这类产品的价值结构中，劳务费占其成本相当的比重，如果劳务费再增长得较快，那么，这类产品成本就会增加较大，就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第三，如果工资水平增长较快，而劳动力的技术水平提高较慢，那就不能尽快地掌握和消化较先进的技术，不能增加加工的层次，变简单劳动为较复杂的劳动，使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迅速的提高，进而客观地限制了工资水平的较快增长。在劳动力技术水平提高比较缓慢的条件下，如果加速工资增长就会使这种局面更快地出现，进而激化生产能力与消费水平的矛盾。

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那么现阶段特区应该是加速提高工资水平呢？还是放慢工资增长的速度呢？这要以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来确定。特区经过五年的建设，基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更多的外资引进来。目前，特区的投资环境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海外企业（不包括“三来一补”）仍未占有主要的经济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说，特区仍属于投资阶段。在这个前提下，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都应应以引进外资为主，显然，高工资水平和增长率对引进外资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要以引进外资为主，特区工资水平不宜提高过快，而高工资水平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在生产经营阶段表现得更充分些，比消极影响更大些。

高工资水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投资阶段会比积极影响更大些。因此，目前特区工资水平不宜较快地增长，进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在正常的经济发展中，无论工资增长过快或过慢都需要在宏观上调节和控制。在特区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现阶段，更需要对各企业的工资增长率进行一定的控制管理。由于特区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中海外企业所占比重会愈来愈大，所以，宏观控制的管理手段也是有其特点的，那么，特区应如何控制各企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呢？

三、深圳经济特区工资水平宏观控制的特点和手段

要有效地控制特区工资水平，首先需要了解特区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工资分配调节机制上的特点。

在特区，海外企业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随着外资的不断引入，这类性质的企业会逐渐增加，并将在特区的经济成分占主要地位。在这类企业中，职工主要是以雇佣劳动力的身份出现的，由于客商对生产资料具有使用权，在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这种利益结构和他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外商不可能轻易地增加工人工资。因为，在无其它条件的限制下，这类企业的工资水平不会有较大的增长。相反，在国营和集体企业内部，劳动者是以生产资料的主人的身份参加生产的，每个职工都有一定的权力和责任管理生产。所以，职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的利益根本是一致的，而且，管理者也是劳动者，这样，企业的管理者就可能根据生产发展情况，在企业管理权力范围内，最大可能地增加工人的工资水平。因此，这类企业的工资水平就可能增长较快。例如，在特区创办初期，我们在与外商签订合同时，明确规定海外企业的劳务费每年要保证增长5%—15%。可是，事实上除了友谊餐厅每年平均增长5%的工资以外，其它的一些海外企业都未完全按合同办事，虽然一些海外企业采用多种分配形式，使职工的实际收入有所增长，但对比近年来国营企业工资水平的增长来说是较低的。在1981年，特区的海外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高于国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到1988年，两类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基本上消失了，其中有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资水平超过了海外企业。比如，沙头角综合公司月平均工资为829元，建筑行业平均月工资达300—400元，化工建筑材料公司224元，糖业烟酒公司210元等等。之所以能够消失这个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与海外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具有根本的差别。可见，虽然海外企业的工资起点较高，但增长速度是较慢的；相反，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资起点虽比海外企业低，但增长率较快。由于利益关系的不同，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资水平有快于海外企业工资水平的增长。所以，特区要控制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当前主要应限制和调节国营和集体企业的生产和工资的增长率，但也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内，海外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会有较快增长，所以也需要对这类企业的职工工资增长进行相应的调节。

由于海外企业和国营、集体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特区劳动部门对这两类企业采取的工资调节和管理手段也不完全相同，对海外企业不能从企业内部直接根据其生产的增

长确定与工资增长的比例系数进行事先的控制和调节，只能是按照劳务费合同规定进行监督管理，并且，要规定统一的工资增长税进行反馈控制管理。对于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工资分配就具有从企业内部根据企业生产增长确定与工资增长比例系数进行事先调节和控制的可能性，当然对国营企业的工资水平管理也主要以经济手段为主。

具体地说，在深圳特区，对国营和集体企业工资总额主要应采用经济手段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控制：

第一，特区的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50%左右与企业盈利挂钩，企业盈利直接影响到每个职工工资收入，企业的工资总额客观上与企业盈利也是联在一起的。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不能下达绝对数额进行指令性控制，应采用工资总额增长企业盈利增长而相应增长的比例控制。比如，规定企业盈利或劳动生产率每增长1%，企业工资总额可提高0.7~0.8%，企业要想多增长工资总额，只有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或增加企业盈利。目前，深圳市宝华电子厂是根据单位产品工资含量提取工资总额的，一些建筑公司是以每百元产值提取工资含量确定工资总额的。这些都根据企业盈利增长确定其工资总额增长比例，工资总额不封顶，而且，企业盈利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工资增长的比例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就要保持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性，不能由于企业工资水平增长快或慢，就任意提高或降低两者比例关系。这种以确定劳动生产率或企业盈利增长与工资总额增长比例关系来控制企业工资总额的办法，是一种经济调节的办法，是可取的。

第二，深圳特区的多数国营和集体企业是以承包工资额为主要形式的。根据项目和任务进行承包，有时工资收入会增长很快，有时也会增长较少，这就难以采用前一种手段进行调节，只能规定企业增加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保证企业以丰补欠。如何规定这个增长幅度？应与涉外企业中劳务费每年增长5%~15%的幅度相同。这样，可以做到涉外企业和国营以及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避免其过大的流动。如何保证控制在这一幅度内？应采用工资累进税调节，如果超过所规定幅度，应按比例向企业征收工资累进税，一些国家管理和控制工资经验表明：工资税是控制工资总额的一种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目前，在深圳经济特区，工资税还未完全制订出来，致使一部分国营或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增长较快。工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不相应增长是影响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如果不能采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只有通过物价上升达到货币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的平衡了。显然，采用工资税进行调节比由工资推起的物价上升的调节有利得多。规定统一的工资调节税应不分哪一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它应对特区所有企业都具有调节作用。可见，特区要加强对企业工资总额增长的控制，不仅要确定企业税利或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工资总额增长的联系，而且还要规定统一的工资调节税，限制企业划出自主工资总额增长的幅度，这两种控制手段都适用于国营和集体企业；对于涉外企业，前一种控制手段是不适宜的，只有采用后一种手段进行调节。

在特区，随着基本建设阶段的基本完成，外商的投资不断增加，涉外企业将会占有主要地位。当特区进入正常的经营阶段后，也要防止工资水平较低地增长。如何调节涉外企

业的工资水平呢？采用调节国营和集体企业工资增长的办法是不适合于涉外企业的。在特区，影响涉外企业工资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第一，劳务费用的合同规定，即按照经济合同规定的比例进行增长。第二，劳动力的流动，即通过劳动力在企业之间的流动，调节企业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别，使其趋于平均化。第三，国营和集体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第四，劳动力的数量供求关系。

从第一个因素看，劳务费用合同，不仅要明确地规定劳务费和年增长率，而且要以一定的法律形式作为保证。目前，特区的经济法还不健全，即使涉外企业不按合同办事，也不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比如，一些涉外企业采用各种借口抵制劳务费每年5%的增长，原因在于没有严格的法律保证其合同的实现。因此，我们要学会用法律形式与外商打交道，根据一定法律规定，保证合同的效力。从第二个因素看，特区的劳动制度是一种合同工制度。职工与企业都是按签订的合同办事，他们之间是一种经济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具有选择职业和企业的权力，根据个人兴趣选择职业和企业的生产条件以及工资待遇选择企业。前一方面表现了劳动力流动的个性，后一方面体现了劳动力流动的共性，劳动力流动的规律性就体现在其共性之中。这种共性是，劳动力是由待遇较差，条件较艰苦，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向待遇较好，条件较优越、工资水平较高的企业流动。如果个别企业、工资水平较低，就会影响本企业劳动力的稳定性。目前，蛇口工业区的管理部门就采用了有计划让劳动力流动的办法，平衡各企业的工资水平差异的。所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个别涉外企业压低工资水平或提高劳动强度的现象继续发生。从第三个因素看，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资水平增长是较快的，这也迫使涉外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得不增长，否则，劳动力会从涉外企业向国营和集体企业流动。再从最后一个因素看，如果特区需要就业的人数多，工资水平就会低些或长期得不到提高。相反，在劳动力缺乏条件下，高工资成为吸引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目前，特区的劳动力是相对不足的，所以需要通过较高的工资来吸引内地职工到深圳特区就业。但如果内地职工过多地涌向特区，劳动力会出现过剩，一些涉外企业便会利用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压低工资。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特区吸收外地职工到特区来要有计划地进行。上述四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且相互联系的，不能偏废某一方面，只有利用这些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影响，才能防止一些涉外企业压低工资水平的情况发生。

总之，特区工资水平的宏观控制，既要在现阶段防止工资水平增长过快，又要避免一些涉外企业压低工资水平的现象继续发生。这就需要抓住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控制和调节。这样，既可以达到控制的效果，又不造成副作用。

从深圳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看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

沈 乐 高颂琪 林 浩

国营企业领导体制应该如何改革？这是当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深圳经济特区，从1984年四月开始，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干部选举聘请制。这一改革的成效如何？它为我国国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提供了哪些具有方向性的经验或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1984年七月间到深圳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通过对深圳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改革实践的评价与建议，来进一步探讨我国国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向。

深圳特区的国营企业，过去同全国绝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这种企业领导体制，虽然过去在一定条件下，也曾对企业生产起过促进作用，但其固有的弊病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显露出来，不仅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而且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

1. 不符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是事无大小，都要提到党委集体讨论的桌子上进行一番争议，削弱以至取消厂长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统一指挥权，使企业的经济运转陷于迟钝、缓慢和阻滞的状态，导致经济效益的低下。

2. 不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在这种体制下，上级主管机关和企业党委成了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广大职工实际上并没有享受他们应该享有的对企业的重大生产经营和分配活动的决策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而官僚主义、走后门、以权谋私等却得以滋长。

3. 不利于真正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企业党委包揽一切，使自身陷于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为繁杂的事务所纠缠，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政治监督和政治保证，实际上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党的领导。

旧的企业领导体制，是旧的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深圳特区开始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加快特区经济发展步伐的时候，改革国营企业领导体制，便成了一项迫

切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国营商业系统率先推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和选举聘用合同制，随后国营工业系统逐步实行。

推行这一改革的具体做法，据深圳市商业总公司的介绍，以属下公司为单位，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全体职工学习有关文件，统一思想认识。第二步，评议原领导班子。方式是以科室，门市部为单位，全体职工参加的背靠背评议，然后召开公司领导班子扩大会议，进行面对面的汇报。第三步，举行以开创新局面为题的多种形式讨论会，即“竞选演说”，演讲会自由报名，涌现了不少有胆有识的企业领导人才，而它的最大的好处是让群众直接识别和发现人才。第四步，进行无记名的民意测验，然后将票数最多的几位候选人名单公布，再广泛征求意见，最后通过公司的职代会正式选举产生。选举分两次进行，先选出经理。副经理候选人由经理提名，经职代会投票选举确定。经理和副经理选出后，由商业总公司分别发出聘请书，签订聘用合同，明确规定经理责、权、利统一，经理对企业的经济全面负责，对企业经营决策、年度计划、机构设置等重大事宜上有统一指挥权，对公司的人、财、物有调度处置权，副经理协助经理执行职权；还规定经理、副经理的待遇及奖惩；特别是规定了经理、副经理任期为两年，任职一年后，举行一次群众信任投票，如得不到半数信任票的，自行辞职或报经上级批准，予以解聘。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深圳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转变：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变厂长（经理）的上级主管部门的任免制为职工选举上级聘用合同制，这是我国国营企业领导体制发展史上具有崭新和深刻意义的两个转变。

二

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就其生产力方面即其自然属性来考察，其本质特征，是机械化协作形态。这方面，它区别于个体小生产经营，而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相同。机械化协作形态产生了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实行统一指挥、调度和组织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一再说明，生产过程的统一指挥是协作劳动的共同要求。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867页）“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它就“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81、485页）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所具有的机械化协作形态，象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实行统一指挥，绝不能搞多头指挥。国营企业领导体制必须充分地体现这一客观要求。

然而，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就其生产关系方面即其社会属性来考察，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的形态。这是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就社会属性考察，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的过程，劳动者不过是被宰割的牛羊。而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产生的生产经营过程，则表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的运动过程。所谓公有制关系，通俗地说，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与共同管理，即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明过的“自由人联合体”、“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这种公有制关系，在我国国营企业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除了极少数巨型或微型企业单位外，一般的说，应该表现为国家所有集体管理这样两个自由联合劳动层次的具体形态。这里说的是“应该”，不是说的现实。现实中许多国营企业还是采取国家所有国家管理，或向国家所有集体管理的过渡形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多数国营企业的公有制关系将会逐步完善，转到国家所有集体管理的具体形态，这个趋势是不难看到的。这正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工人合作社时肯定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388页）我们在考察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社会属性时，不应该把公有制关系简单地视为生产资料公有，而应当认识它的丰富内涵，即共同占有与共同管理的关系；不应该以尚带有很大缺陷的国有制现实模式为准绳，而应当以正在逐步形成中的国有制新模式为出发点，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和正确把握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在社会属性方面的本质规定。

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两重本质属性，也是深圳国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改革的方向和模式，既要使经理、厂长拥有生产经营活动的统一指挥权，又要使企业劳动者拥有在国家计划和政策指导下的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新的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领导体制，必须是能使这两方面结合得好的体制。

三

下面我们对深圳的改革作一些评述。这些评述，同时是对我国国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探讨，并对一些观点提出我们的不同意见。

首先一个问题是：深圳的改革是不是有成效的？是否具有带本质性突破的意义？

深圳的改革，虽然时间还短，但实践已开始证明，这一改革是有成效的，并且具有本质性突破的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1. 适应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在生产力方面本质属性的客观要求。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在责、权、利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厂长（经理）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统一指挥权和调度权，为企业经营活动有效的运转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深圳市友谊公司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该公司1984年3月份进行了改革，新班子上任，转接期间，个把月内企业利润继续直线下降，某些人暗地里等待着改

革的失败。然而新的体制和新的人终于显示了它的活力，象一部修好的机器那样顺利启动和运转起来，企业利润的箭头反方向直线上升，5月份利润达56万元，6月份更升至138万元，比旺季的1月份还多40万元，有力地显示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优越性。

改革总会有人疑虑，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会不会削弱党对企业的领导？实践的结果恰好相反，在友谊公司，过去职工反映“政治工作没踏入公司的门”，如今党委从日常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大大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是政治组织而非生产组织和行政组织，企业党委的领导，不是通过包揽行政事务，而应是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政治监督和政治保证，来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厂长（经理）负责制本身不会削弱反而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总之，深圳的改革所揭示出来的第一点，证明改旧体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是完全必要的，合乎客观规律的。

2. 符合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在社会属性方面的本质规定。改厂长（经理）的上级任免制为职工选举上级聘用合同制。在旧体制下，企业领导人的任免和选择，虽然与企业的成败和全体职工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但工人实际上是无权过问的。对企业领导人来说，约束力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头。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公有制关系的本质要求，而且由此导致种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弊病。实现劳动者在国家计划和政策指导下对企业经营的决策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深圳的干部选聘制，其意义就在于迈开了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把一批年青的，有朝气的能人推上企业领导岗位，并且使他们既获群众拥护，又有群众监督，是这次改革最突出的成果和生命力所在。

其次，深圳的改革有哪些不足和缺陷，需要在今后进一步的改革？我们的建议是：

1. 逐步创造条件实行完全的厂长（经理）“组阁”的办法，以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目前的做法，副职的产生，虽则形式上由正职提名，实质上是通过民意测验，由职代会选举决定的。采取这种办法不无理由，可能是出于防止厂长（经理）个人独断独行的考虑，但毕竟不利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因为副职的确定虽然符合民意，却不一定在工作上能和厂长（经理）配合默契及协调。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可以通过明确的具体分工和思想工作得到一些弥补，但体制上的缺陷还是存在的。因此，随着党委监督、保证作用的加强，随着职工在企业经营决策权力方面的扩大，应该把目前对副职的选举方式转变为厂长（经理）“组阁”方式，由厂长（经理）根据自己的意愿组成和谐默契的指挥班子，最大限度地发挥指挥系统的高效能，实现完全的厂长（经理）负责制。

此外，厂长（经理）的任期，两年的时间短了一些，在一年一度举行信任投票这项规定的制约下，我们认为应把任期定为三至四年，尽量减少领导班子的频繁变动，有利于指挥系统效能的充分发挥。与此同时，可规定厂长（经理）连选连任不超过两个任期，以利于新生力量的成长和接替。

2. 在坚持国家计划和政策指导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和实现职工的决策权，是今后进一步改革的重点所在。

(1) 选择一两个职工政治和文化素质、经营状况较好的中小型企业，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决策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或由职工代表、党委代表、行政领导代表三结合组成的企业管理委员会决策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摸索符合我国情况的民主管理企业的最有效形式。

(2) 在现行厂长(经理)民主选聘、规定任期和一年信任投票的基础上，建立定期的厂长(经理)工作报告制度，作为逐步扩大职工决策权力的过渡措施。厂长(经理)定期(半年或一年)向职代会报告企业生产经营的计划、重大措施、发展状况，和人、财、物的调动处置状况等等，让职工代表咨询和审议，既是职工民主管理企业职能的发挥，又是职工对企业生产经营指挥班子的监督和经常性考核，既有利于提高职工的企业主人地位和管理素质，又有利于职工在厂长(经理)任期过半或届满时对指挥班子的正确选择，并且有利于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

最近，有的同志在正确肯定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同时，却又把厂长(经理)负责制视为“我国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向”。还有的同志认为，企业的重大经济问题，由厂长(经理)决定，工会主要是抓好工人的学习，协助行政管好职工福利。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国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向，固然应该包括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一基本方面，但绝不是仅此而已，还应包括职工在国家计划和政策指导下，对企业的经营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这另一基本方面，并且两者是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理由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已阐述过了，不再重复。众所周知，恩格斯非常强调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生产指挥上的权威，但他也同时断然否定“个人管理工业”的制度。他说：“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认为应在“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8页)，实现“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列宁也是这样，他主张讨论决定问题的集体管理制，执行过程的一长制。(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遗憾的是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执行过程中的一长制竟然变成了决定问题过程中的一长制，取消了集体管理制的原则。在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中，我们要避免这种错误，努力探讨如何实现一长制和集体管理的有机结合。

我们在坚持逐步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时候，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切实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并且及时总结群众在这方面的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之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营企业领导体制。

一九八四年十月

城市体制改革与做好经营工作

于 光 远

1984年5月，我去沈阳参加《经济效益报》（绿版）创刊会议时，第一次考虑改革和经营的关系的问题，做了一个以此为题的演讲，以后又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在讨论和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感到，做好经营工作对于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本世纪末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十分重要。因此，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和同志们讨论。

我对改革和经营的基本观点是：1.改革和经营是社会实践中两个不同的东西。它们各有各的社会功用，它们是各有其独立性的；2.改革和经营都可以做广泛的理解或解释。他们都可以涉及很广泛的领域；3.改革和经营又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这种关系是相互的。

具体说来，关于第一点，改革就是去改变现行的体制。改革不能直接取得经济或者其他社会效益，而经营则是为直接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所从事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营”一词和“建设”一词，它的含义是十分接近的。由于改革和经营是不同的东西，彼此各有其独立性，所以在同样的经济体制下面，不同的经营可以取得不同的效益。同时，相同的经营在改革前与改革后也可以取得不同的效益。前面这个例子是经营有独立作用的表现，后面这个例子是改革有独立作用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向经营要效益，也可以向改革要效益。不过向改革要效益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经营来取得。

关于第二点，改革，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主要指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也可以包括科学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的改革），以及其他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我们的经营也可以包括个人的经营、企业的经营（可以把这些说成是微观的经营）和国家的、宏观的经营。除经济方面的经营之外，科学事业、教育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领域都有一个经营的问题。

关于第三点。改革和经营的关系有：要想经营得好，就要求改革排除经营的体制中的某些环节和方面的妨碍。越是要求经营得好，对改革的要求越是强烈，此其一。改革也不是不需任何物质条件的，比如进行工资改革、价格体系的改革，在物资充裕、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就比较容易成功。同时改革也需要人的条件，比如：进行改革所需要的人才，进行改革时所希望的人的觉悟的提高等等。物质方面的条件需要经济方面的经营来提供，人的方面的条件又要依靠教育等领域内的经营，此其二。还有，当人们利用改革所创造的好的条件积极从事经营取得好的效益的时候，改革的成功就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因而改革的成果就会被人们所公认，改革得到了巩固。如果人们不能利用改革后好的条件在经营中取得好的效益，那么虽然改革是正确的，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公认，

很难说就已经巩固。

根据我对于改革和经营的这些理解，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将要发生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做这样的比较：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农村中的经营者主要是农村中的劳动者个人。他们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把他们的事业经营好了，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效益，从而农村中的改革得到了巩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基本情况。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就要城市中的各个企业、城市中的各个单位以及城市中的各个领导机关积极投身到改革当中去，使改革的事业取得既快且好的成就。同时与此有关的经营者，包括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其中就有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是实现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决定的主要力量，又是做好经营的主要力量。改革的实现需要他们来推动，改革所创造的有利的经营条件要他们去运用并取得经济效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改革要靠他们通过经营来巩固。由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这就需要在贯彻三中全会决定中做过细的工作，同时也就要求在各个地区、部门、单位中的广大的干部做好经营工作。

由此看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经营问题要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营问题重要得多。所以在学习和贯彻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把经营这个问题突出地讲一讲。

1984年12月18日

書海酌蠡

《顾亭林诗集汇注》一补

官大梁

《顾亭林诗集汇注》第586页：《为丁贡生亡考衢州君生日作》，王遵常按：丁贡生不详。据序知名雄飞，据诗知为南京人。《同志赠言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有其署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月第一版）

按：丁贡生，即丁雄飞，字菡生。《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作菡生（中华书局本《顾亭林诗文集》）。丁雄飞是明末清初金陵著名的藏书家。

《金陵通传》：“丁雄飞，字菡生，善古乐书，积书数万卷。每出必担簏囊载图史以归。居乌龙潭心太平庵，立古欢社，与黄虞稷互相考订。……雄飞撰述甚富，著有《尊儒帖》、《乌龙潭志》、《清凉山志》等书，计九十八种。所积书有《古今书目》十卷，尤多秘本”（转引自李希泌、张叔华《中国古代藏书家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又见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

清方文《禽山集》卷五有《韩圣秋招同纪伯紫、杜于皇、丁菡生集乌龙潭》诗，此可窥见丁雄飞交游之一斑。

丁雄飞的卒年当在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或稍前。顾炎武1662年写的《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说：“麟士、年少、菡生、于一诸君相继即世，念之尤为慨然！”

论社会主义经济竞争

高伟梧

(一)

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既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又不能放任自流变成无政府状态。这就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竞争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改革计划管理,建立适应商品经济的计划体制。

恩格斯说:“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15页)商品生产者追求利润,争取经济利益的经济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运动,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否定了竞争,就是否定了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了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就难以发展。我们过去由于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仍是商品经济,把市场机制、经济竞争看成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因而加以排除和压制。经济体制僵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没有竞争,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没有竞争。我们今天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竞争。

1. 竞争促进企业的改革、增强企业的活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而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形成现实生产力的是企业,企业是社会生产力体系的细胞、器官和基本因素,因此,解放企业的生产力、增强企业的活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然而,企业活与不活的标志在哪里?企业的活力又是怎样产生出来呢?对于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企业来说,活与不活就是在于能否对错综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市场自主地作出灵敏的准确的而又有效的反应,企业的活力具体表现为对市场的适应力、应变力和开拓力等等,一句话,就是市场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的生命力,竞争力越强生命力越旺,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就是没有活力的企业。

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在竞争之中发展起来的,脱离了竞争的社会实践,无从培养和发

展竞争的能力。企业的竞争,是企业之间施加的压力,也是市场消费者的评判与检验,不通过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内在的价值规律就无从发挥作用,只有广泛地开展竞争优胜劣汰,企业受到“生命威胁”,才迫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者不断改革生产技术、改进经营管理,千方百计提高生产率、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我们过去由于长期实行统购包销,企业没有外来的挑战和压力,竞争的

能力就退化和丧失。象我省不少企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市场开放，开展竞争，由于不适应这种形势，产品打不开销路，大面积亏损，严重者濒于破产，经过几年竞争的锻炼，企业竞争力大为增强，扭转了严重亏损的局面。

诚然，企业的活力不能光靠外在的压力，还要有内在的动力。这对于社会主义企业来说，就是要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生产经营的得失成败直接关系到业主的前途命运，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企业主就得拼死竞争。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是公共财产，是联合劳动，要是竞争的结果对生产者经营者毫无经济利益的影响，那么竞争压力的作用也就不大，价值规律就不会象房屋倒在人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必须打破国家的和企业的两个“大锅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实行按劳分配，把企业的经济利益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联系起来，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个人的工资、生活福利以及社会荣誉密切联系起来。然而，如何才能彻底打破两个“大锅饭”，实现按劳分配，贯彻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原则呢？这也不能离开竞争。这是因为，作为商品生产的单位，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不只表现为实物量即使用价值量，还表现为价值量，既要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物资，同时还必须盈利，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利。产品的社会价值取决于竞争，价值的实现也取决于竞争，竞争分别出企业利润的高低经济效益的大小，竞争须要打破国家的“大锅饭”也为企业不吃“大锅饭”创造条件。其次，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成果也表现为商品的价值，按劳分配不是直接的实物分配，而是社会价值的分配，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首先取决于企业市场竞争的结果。这样，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使职工关心自己产品的竞争力，而为了适应市场的竞争，企业内部也就必须奖勤罚懒，要多劳多得，承认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再次，竞争才能充分地发挥生产者与经营者的个人与集体的聪明才智，区分出企业的与个人的劳动贡献的差别，就可以更有成效地给予劳动者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总之，竞争促使企业内外打破平均主义，分清企业的和职工的责、权、利，更好地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统一起来，企业内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真正当家做主。

2. 竞争促进经济机体的生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企业是生产力的基层组织，是经济细胞，企业有活力，在竞争中不断地推陈出新、新陈代谢，经济机体才能生机勃勃、健康地发展；反过来，机体不健康，僵化无生气，企业细胞也活跃不了。企业的活力是经济机体生机的基础，而机体的生机又是企业增长活力的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促进。

既然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货币关系便是整个经济机体内在的本质的关系，也就只有充分地利用市场机制、开展经济部门的各地区和各种经济形式的竞争，给企业提供活跃的条件和场地，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朝气蓬勃，生机盎然。(1)商品生产决定流通，但流通也决定生产，要使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首先就必须疏通流通渠道，流通渠道阻塞，商品生产不可能发展起来。我国过去的计划体制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弊

端，就是条块分割，行政权力封锁和垄断，堵塞了流通渠道。我们现在的改革就得破除自然经济的“无流通论”，清除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关卡的阻隔，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这当然要靠政策，但到底还得靠物质的经济力量，就是也得靠商业的和工业的竞争，靠各地区的、多种经济形式的竞争，才能彻底地战胜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各种多余的行政庇护，加速商品的流动，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2)要商品生产得到发展，必须有货币资金，就要有多种形式的多条渠道的资金积聚和集中，这也就得开放金融市场开展竞争，在中央银行的统一指导下，让地方、集体、企业成立银行、钱庄、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开展贴现业务，多渠道多形式集中和发放资金，加速资金循环和周转，提高资金的利用率。通过竞争，搞活金融，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和佛山市地区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同时，只有资金的自由流动，才能形成平均利润率，才能形成生产价格，才更有利于竞争的开展。(8)商品生产面向市场，生产经营者都必须掌握市场的行情变化，信息灵敏是搞活经济的其中一个基本条件，尤其是对我们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没有信息情报不可能对市场作出有效反应，就根本谈不上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要克服商品生产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非有准确的市场预测不可，这就不可能没有现代信息事业的发展。如何使我国现代信息事业充分发展起来呢？关键的还是改变只由行政单位“官办”的旧体制，打破部门和单位的封锁和垄断，实行信息情报商品化和商业化，开展竞争，国家、集体和个体一齐上。(4)企业的竞争，集中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的竞争力决定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包括品种、款色等）。这又是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科学水平。而企业的生产和经管水平到底还是得取决于企业劳动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的素质，即是要有人才。所以，商品经济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智慧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要提高我国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就得实行科学技术商品化和商业化，开放技术市场，展开竞争；要出人才，要造就一代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就也必须人才流动，人才竞争。要是仍旧是人才单位、部门所有制，实行技术封锁和垄断，企业的活力深受限制，整个经济也难活跃。(5)要搞活经济，不只要有国内的商流、财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才流，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还必须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智力，增强与国外的商品、金融、技术，信息和人才的对流，这实质就是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国际竞争更为广泛、复杂和剧烈，也就更能促进国内的开放与改革。如我国的经济特区，尤其深圳特区，改革所以更快更好，经济更有活力和生机，其中一点就是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的剧烈竞争。总之，经济机体的活动和生机在于运动，在于竞争。竞争推动企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信息和技术市场的开放，也促进人才的流动。如此，整个国民经济以及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事业，都必须适应竞争，并在竞争的推动下，进行改革和得到发展。

(二)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在不同的方向上起作用，商品经济是如此，价值规律也是如此

此。我们要强调竞争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但也不能说得太过完美，必须同时看到它的不足和局限，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计划管理，限制和消除竞争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1.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生产的具体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使用价值也只是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并不如一些同志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然而，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的必须是使用价值，这样社会总体的需要，和企业具体生产目的就存在着矛盾。要是光靠竞争自发的推动，企业只是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眼睛光盯住市场，就不可能了解全局，就会缺乏全面的战略目光。而市场的需求只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完全等于社会实际的消费要求，同时影响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工资收入，物价，社会心理，政治形势，甚至天气变化等等，这是不可能完全预测的。生产者一般是以产品的价格作为市场需求的指示器，然而价格却是交换的结果，反映的是过去，企业跟随市场行情走，免不了会陷入被动和盲目状态。这种盲目性，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不是自然而然地按客观所需要的比例协调地发展。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再是自发的了，这是错误的。一切客观规律总是没有意识的，价值规律本身是不会“自觉”起来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不能只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不能一切都得靠竞争解决问题。

2.现阶段，我国仍有非社会主义经济存在，旧社会的思想意识、习惯势力以及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还有其影响。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市场中缺斤少两，偷工减料，伪造商标，哄抬物价，甚至诈骗勒索，走私行贿等等，违反国法，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也较为常见。要是放任自流，社会主义的竞争也可能使用资本主义的你虞我诈的手段，最后必将导致竞争性质的变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竞争，也会变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起破坏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不能容许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组织起来的，必然要摆脱过去社会经济自发的盲目的发展状况，结束社会经济规律异己的统治。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的联合劳动取代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企业的生产力就要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器官”起作用，而企业联合劳动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根本一致的，所以，互相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关系。这样，不但必要而且可能自觉地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经济实行计划的管理和调节，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实现总体的综合平衡，保证整个商品经济大体按比例协调地发展。

我国原有的计划管理，过度集中，统得过宽，管得过死，且单靠行政手段，就割断了商品经济固有的联系，否定了价值规律，排除了经济竞争。这种旧的计划体制是非改不可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倒过来只强调市场机制和发挥竞争的作用，认为一切应由企业自己作主，国家完全不加干预，只靠市场和竞争调节

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整个经济失控，没有计划调节的作用，这样的放活是放任自流，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混乱。以直接行政管理取代竞争，或以竞争取代计划管理都是不行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是广大劳动者参与生产经营竞争的经济运动，也是国家自觉进行计划管理的经济运动，是必须并且可能使竞争和整个市场机制都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总体目标服务。

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既有市场竞争，而又有计划管理，一方面从国家这个社会经济中心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和计划调节，一方面又有市场机制，有企业自主竞争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和反馈，这样纵横上下有机结合起来，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就能够做到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就能够实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会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

如何协调经济的竞争与计划的关系，建立既统一而又灵活的计划体制，关键在于改革计划管理。要使国家的计划体制适应于竞争和更好地管理竞争和进行竞争的计划调节。当前总的来说仍是要继续放开，这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创造竞争的条件和环境

(1) 保障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旧的计划体制集中过多，限得过死，束缚和压制了竞争，首先就是否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内部的生产 and 经营，企业没有了竞争的必要也没有竞争的可能。所以，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是开展竞争、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和最基本的条件。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不但表现为能自主地管理人财物、产供销，生产和经营上有真正的决策权，还要自负盈亏。要是企业不对生产经营的效果效益负起责任，要是国家依然对企业实行行政保护，统收统支，统购统配，企业没有压力，也就会失去动力，这就不利于竞争，不利于优胜劣汰，也就不利于企业的进步。

(2) 形成买方市场。要是市场上的买方没有挑选的权利，劣等产品大可销售且也有盈利，这样企业就在市场上没有真正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企业的缺点暴露不出来，既抑制了竞争也阻碍了改革。近几年来，由于市场开放，生活消费品的买方市场逐渐形成，这对于消费者需要的满足，对于促进工商企业改进技术、改进经营管理，对于改变社会商品供应上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不应是买方市场，我认为只要是商品经济，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向价高方向流动，资金向利高方向流动，买方市场是必然的基本的趋向。现在，从我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可以越来越看得清楚了。要形成社会主义的买方市场，就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准许商品流动、资金流动、劳动力流动和企业机动转产，要是的一切都计划规定死，企业就不可能依据市场的变化而作出灵敏的积极的反应。不形成买方市场不能很好地开展生产竞争，而要形成买方市场，让消费者能行使挑选的权利，则又待竞争的开展。

(3)放开物价。市场竞争的焦点是物价，市场的计划管理首要的也是物价。没有计划价格，就不可能有计划市场，就没有计划的经济，但是要是价格都定死而不允许升降浮动，就根本不可能开展竞争。所以，必须对现行的僵死的价格体制进行改革，使竞争得以在同等的价格条件下开展。改革旧价格体系，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多层次的价格体系，目前来说就是要进一步放开，也就是要削减国家指令性计划价格，开放更多的自由价格，而以指导性的有一定浮动幅度的计划价格为主。从我们省农副产品价格的开放的实际情况来看，农副产品价格的放开，大有利于形成买方市场，大有利于开展竞争、促进生产的发展，也大有利于稳定市场物价。放开物价，还要让企业有一定的定价权。价格决定于社会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而要使价格灵敏地反映生产率和市场变化，不给企业产品定价的机动权是不行的。当然，物价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国家的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不能无所控制，必须有一定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我认为要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可分三种情况规定：指令产品可以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保护价格界线，只准下浮或者上浮；一般产品可以规定上下浮动幅度；自由交换的小商品则是完全自由价格。企业则可在国家统一政策下，根据自己的生产率和市场变化自己作出决定。

2.对正当的竞争进行保护

我们要鼓励竞争和保护竞争，就是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对正当的竞争鼓励和保护，一是对不正当的非法的竞争反对和取缔。(1)首先是要靠国家的法令。必须制定市场竞争法，商标法，技术专利法等等，分清合法竞争与非法竞争的界线，使商品生产者，使商品经营者有法可依循。现在人们对竞争仍是存在“左”的观点，还有许多障碍竞争的旧习惯势力，如随意增加税收，乱设关卡，硬性规定地方产品的推售额和排斥国营以外的其他经济形式等等，这都是对竞争进行了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继续搞条块封锁和垄断，不利于竞争不利于改革和进步，必须有具体的明确的法律，保护正当的竞争。(2)要加强市场的管理工作。有法而无执法，没有经常的严格的检查督促，还是不行的。这就是要加强市场各方面的管理工作，检查商品的质量、商标，价格，检查度量衡的标准，检查税收的情况等等，对合法的正当的给予维护，对非法的不正当的按法规处理，这样才能制止非法的竞争对合法竞争的侵犯，才能伸张正气，使正当的竞争得到顺利的开展。(3)要加快社会保险工作的发展。商品的竞争必然要分胜负，免不了有优胜劣汰。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是必要的，没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不会有前进和进步。然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性，不能让其自流，不能产生经济的大动荡。这样，就须加强对市场的科学预测，加强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计划指导，同时要制定社会主义企业的倒闭法和积极发展社会保险工作。社会保险就是发挥社会主义企业间的互相支援的作用，由社会共同分担亏损倒闭企业的部分损失，使倒闭企业的劳动者不致于生活无着。这也就是对竞争的保护，使竞争真正建立在社会主义企业的互相协作的基础上，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当然，这也必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竞争的正常开展，促进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拓。

8.对竞争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和调节

社会主义是计划商品经济，就是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都为实现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目标服务，实现综合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地发展，而这当中，关键的是不能顺从竞争的盲目的自发的的发展，必须有意识实行有计划的管理和调节。(1)必须对竞争实行宏观的计划控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计划，当然也要利用价值规律，考虑竞争的作用，预测竞争发展的趋势，但还必须根据资源、国际环境，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以及政治形势等等多方面综合情况。所以，一方面国家计划要保护竞争，要有弹性，另一方面也必须使竞争服务于总体计划，基本控制在总体计划范围之内，这就是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根据生产和产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开展竞争的范围和程度，小部分实行指令性计划，基本控制竞争；大部分指导性计划，就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只有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才是完全性的竞争。(2)对企业的竞争实行有计划的引导和调节。微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如何适合和服务于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这是计划管理中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经济杠杆，如增减税率、利率和调整价格等等，调节经济利益，使企业根据切身的利益，抑制或发展某方面的生产和交换，这样既使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为总体的经济目标服务，向着更有利于综合平衡的方向发展，而又不至于缚住手脚、压制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主要是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引导和管理经济。

書海酌蠡

丘逢甲祖籍不在商丘

李 鸿 生

丘逢甲祖籍何处？有些文章提出祖籍河南商丘。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值得一酌。

据丘念台《岭海微颺》记载：“我的祖先，是属于中原南迁的客家族系。”“客族……由大陆中原诸省随宋室向南方徙居，其中大部分落籍福建、江西两省”。“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江西为元兵败后，乃进屯广东潮阳。当时闽赣两省拥护宋室的许多义民，都相率跟着迁移。我们丘氏先祖，就是在这时期由福建汀州宁化县迁居广东梅州镇平县的。梅州是宋时的建制，清代改为嘉应州，镇平县则于民国四年改为蕉岭县。原因是避免河南省南阳府的镇平县混淆一起。”台湾学者蒋君章先生据丘念台以上叙述，以为梅州镇平县乃从河南南阳府镇平县移来的客家人沿用原来地名之故。所以丘逢甲祖籍应为河南南阳府镇平县。笔者以为，此说似更为可信。

塘鱼生产与价值规律

——顺德县塘鱼生产情况调查

杨伟蕴 陈学工 曾牧野

近年来，广州市水产品市场搞得很活，品种繁多，价格平稳，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这得归功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归功于价值规律的自觉利用。现在结合我们1984年7月间到供应广州市的塘鱼主要产区顺德县的调查，谈谈价值规律在发展塘鱼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一、五年间塘鱼生产的大变化

顺德县全县耕地面积67万亩，其中鱼塘面积占40%。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塘鱼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塘鱼亩产一直在300多斤左右徘徊；1969年亩产320斤，到十年动乱后的1978年亩产也只有393斤。那时水产品留购政策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农贸市场和水产货栈被当作资本主义阵地冲垮，实行单一渠道，单一价格，水产市场被管死统死。连续十多年，市场只有定量供应的平价鱼，品种少，质量差，各种名贵河鲜杂鱼绝迹了，卖活鱼的传统经营特色也消失了，供求矛盾越来越尖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左”的错误，贯彻、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与首创精神，使塘鱼生产得到迅猛的发展。1979年顺德县塘鱼平均亩产即上升到424斤，全县总产量突破一亿斤大关。1983年，平均亩产达到620斤，总产达到15400万斤，比1980年增加48%，产值由1980年的6066万元，上升到1983年的12777.4万元。三年间总产值翻了一番。

顺德县塘鱼生产的积极性是怎样被调动起来的呢？过去，在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商业管理体制下，对塘鱼的生产与销售采取统死、管死的政策；农民生产的塘鱼，要全部由国家商业部门收购，兼之收购价格不合理，卖了鱼不能保本，

农民不愿养鱼。丢荒了不少鱼塘，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两大因素刺激了农民养鱼的积极性：一是国家调整了塘鱼派购政策，使农民得到必要的物质利益，这首先是调整了塘鱼的收购价格。全省塘鱼收购价平均提高30%，顺德县塘鱼收购价提高27%，即从原来每担收购37元提高到48元；其次是调整奖售政策，即派购每担塘鱼由国家商业部门奖售牌价饲料从50斤，增加到100斤。第三是实行新的开放政策，即规定塘鱼主产区在完成了国家的派购任务后，渔农可以直接在农贸市场销售，或同国营水产部门搞议购议销。二是广州市水产市场进行了大幅度的经营体制的改革，一方面保持部分塘鱼的牌价供应（凭票供应），另一方面实行放开经营，在城内设置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国营水产部门大搞议购议销的经营活动。开放初期，由于鱼货长期供不应求，商品奇缺，因而价格急剧上涨，1979年一斤鲮鱼售价高达三元三角、三元五角。价格大大地高于价值，给渔农带来较大的额外利润。额外收益刺激了渔农生产积极性，使塘鱼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了。渔农在基本不增加鱼塘面积（1978年全县鱼塘247,469亩，1983年149,500亩）的情况下，自觉学习科学知识，实行科学养鱼，努力提高单产。一是提高养鱼密度，原来一亩放养一千条，现在增加30%~50%；二是充分利用水域，进行立体养殖，草鱼增加投养尾数，鲮鱼实行全年育鲮，提早育鲮，尽量做到常年捉鲮，均衡上市；三是改变饲料结构，使用精料和高级饲料；四是推广使用增氧机和土法免疫，使草鱼成活率普遍达到80%以上。科学方法使亩产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平均亩产393斤，1983年达620斤。由于塘鱼生产大发展，广州市场塘鱼价格逐年下跌，1984年6月间一斤鲮鱼零售

价约1.5元。

二、计划工作要建立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近年来顺德县塘鱼大增产，从而改善广州市塘鱼市场的供应状况，是我们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调节供求、扩大市场调节，促进生产，促进城乡市场繁荣的成功例证。这一成功做法，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计划经济工作中如何更广泛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

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计划调节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广泛地发挥着作用；从而，计划调节必须遵循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在它的基础上作出规定和影响。塘鱼计划价格二十多年不变，计划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渔农吃亏，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即使三令五申，用尽一切行政办法，塘鱼的派购计划任务仍难完成，人民生活需要满足不了。调整塘鱼收购价格，增加奖售物资，农民多得些实惠，这实质上是国家采取接近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农民交易；同时允许农民在完成派购任务后卖议价鱼，让农民依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自发调节部分塘鱼生产。这样一来，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上去了，国家计划完成了（只有完成才有议价鱼卖），多年来无法解决的“吃鱼难”问题缓和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较满意。可见，无论市场调节也好，计划调节也好，都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力来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当然，价值规律也非万能；它要在计划指导下起调节作用，不能象在私有制条件下那样纯粹地起自发调节作用。塘鱼购销体制的改革，就是让一部分塘鱼议购议销，价值规律可以在这里自发地起作用。但放开经营的这一部分商品，何时开放，比重多大，是由国家根据具体情况有计划确定的，这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一种表现。同样的道理，到一定时期之后，经济条件成熟了，国家可以全面取消塘鱼派购任务，让水产品全部议购议销，但仍然是置之于国家计划指导之下。“放”和“统”一样，都是计划经济必须采用的手段，看哪一种能促进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就应用那一种，千万不能作教条主义的理解。

计划工作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

律制约下的这种有机联系，构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和内在推动力。正是由于价值规律在计划指导下起作用，能避免盲目性带来的破坏和浪费，从而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更加发达，发展速度更快。

三、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改进流通，促进生产

顺德县的调查表明，塘鱼生产出现这样一些新情况：产量多，价格下降幅度大，已引起渔农的担心，怕鱼价继续下跌，得不到正常的盈利。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除看塘鱼价格本身外，还要参照相关农副产品比价，综合分析才能判断价格是否合理。历史上鱼和肉之间的比价是：二鱼一肉，即二斤鱼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的价格。目前市场上已基本形成这个比价，说明价格是比较合理的。但与前两年比，养鱼的盈利水平大降，渔农的生产积极性有所减退；同时，现在的承包基数是参照前几年生产量和价格水平制订的。随着价格水平下跌，按原订合同的承包基数，渔农感到吃亏，所以如何在新形势下适当调低承包基数，是保护农民利益以促进塘鱼继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例如，顺德县勒流区的渔农感到原来的投标基数较大，现在鱼价下降，以为吃亏了，有的就不愿承包，或要求缩短承包期，从过去的3~5年缩短到1~2年；有的认为塘鱼的经济收益不如种甘蔗，因此想转移生产甘蔗，也由于饲料价格下降幅度小，在大量使用精料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相应减少，在饲料方面出现由精变粗的趋势。塘鱼生产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必须在疏通流通渠道上寻找出路。

顺德县塘鱼在流通上有三大去向，一是提供出口；二是罐头加工；三是供应广州市场。这三个销路目前都有限，由于各种原因，有的不仅没有扩大流通量，反而缩小了。例如1984年一至六月外贸部门出口量8900吨，比前年同期出口量减少1640吨。主要原因，是受配额限制和上级规定1984年议价塘鱼出口不得超过牌价任务出口量的20%的限制。罐头厂主要加工鲮鱼，目前鲮鱼罐头积压，1984年议价鲮鱼只要货120,009担，比1983年减少64.26%。广州市场的消费也有限，特别是在其他农副产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消费需求的面广了，对塘鱼的需求量不会增长太快。

如何在原有商品流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

市场,扩大消费呢?首先,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商业部门的职能与作用。水产供销部门做好水产品的推销工作,是促进和引导生产的关键。因此在塘鱼生产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供销部门首先要做好推销工作。广州市水产部门近几年来进行了经营体制的改革,建立了以国营水产货栈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流通体制。在首先办好国营水产货栈的同时,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开放市区农贸市场,允许农民进城卖鱼,允许长途贩运。改变了原来水产部门独家经营、独占市场的经营观念,树立了多家经商、共同占有市场的经营观念。在市场上开展竞争,在竞争中促使官商作风的改变,使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做活买卖。所有这些,为这几年顺德塘鱼生产起了很大的刺激、推动作用。如何更好地改革广州水产经营体制,发挥广州市作为水产品流通基地和转口基地的作用,是疏通流通渠道的重要内容。

其次,要大力抓塘鱼加工环节。长期以来,由于重生产、轻流通思想,对流通环节投资少,设施陈旧落后,这和当前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增加投资,建造冷库。大力开展水产品加工。如加工鱼丸、鱼滑、鱼腐、鱼干和爆鱼肚等,既可以增加水产品品种,变低级鱼为较高档的产品,从而刺激需求,同时还可以为消费者节约家务劳动时间,可见水产品加工是大有前途的。

另外,扩大销路不要局限在广州市场。从大范围看塘鱼不是多了,仍是少了。广东省很多地区的塘鱼生产没有多大发展,吃鱼仍较困难。如番禺县无法解决本身的水产品需要,邻近的顺德县就可以提供给他,让番禺发展自己优势的产

品。这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顺德县塘鱼专业户,1983年的亩产达1363.9斤,比全县平均亩产高出一倍多。因此,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必须是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应尽量限制或停止非主产区继续挖鱼塘的做法,让主产区的塘鱼按合理流向来补充,而非主产区则可以集中力量发挥自己的优势作物。此外,南鱼北运也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出路。问题是,与此相应的储存、急冻、冷藏、运输等一系列经济、技术设施要迅速赶上,才能配套起来。

要改进流通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而如何达到如此改进流通的目的?关键还是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让价值规律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可以全部取消塘鱼派购任务,让塘鱼生产全部由市场调节。这在现在已是可能的了。一是现在市场水产品供应丰富,价格稳中有降,并且比较合理。取消牌价供应不会引起市场的混乱。二是牌价的收购和销售已造成严重的购销价格倒挂。先从广州市看,国家财政每年要补贴牌价鱼710万元,其中零售冰鲜鱼每担补7.24元,塘鱼4.53元,咸鱼6元。实际上群众有鱼票买不到鱼吃,得不到多少实惠。相反,财政补贴却掩盖了流通环节的经营好坏情况。这些现象可通过取消派购,实行全部的议购议销来克服。三是塘鱼全部议购议销,生产者可得到更多利益。牌价对生产者无利可图,只是保本生产,而议价收购可使生产者有较大顺差,刺激塘鱼生产的发展。四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对原来居民定量供应部分,实行一定的补贴。这些补贴,可在减少购销环节、节约流通费用,取消对生产者的饲料牌价供应等方面取得,不会因此而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



广州东方宾馆提高利用外资 经济效益的调查

蓝桂良

广州东方宾馆建筑面积达九万多平方米。东楼于一九六一年开业，西楼于一九七三年开业。现有正式职工二千六百六十多人。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引进外资二千二百万元，一九八〇年采取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资一千万港元，另用三百四十万元人民币（下同）。一九八〇年大规模地改造宾馆的全部客房和部分餐厅后，盈利逐年大幅度增加。一九八〇年，在边改造边营业的情况下，盈利一千一百五十万元，除了实现当年引进外资、当年还清二千二百万元外，还向国家上缴四百四十三万元。一九八一年盈利一千五百二十一万元；一九八二年增加到一千六百五十九万元；一九八三年营业额达五千三百七十八万元，盈利近一千八百万元，营业额和实现利润都名列全国各大宾馆的前茅。一九八三年与引进外资前的一九七九年相比，营业额增加四点二三倍，实现利润增加四倍。去年赚取外汇一千八百八十二万美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二点五四倍。东方宾馆提高利用外资经济效益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正确选择外资渠道

利用外资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方式，各有其特点、利弊和适应性。渠道和方式不同，利率不同，条件不同，期限不同，直接关系到外资的投资项目成本高低、负债能力、偿还能力、经济效益、企业成败。因此，提高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首先要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正确地择优选择引进外资的渠道和方式。

东方宾馆在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灵活多样地选择银行贷款、合作经营、补偿贸易等三种渠道引进外资。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开始，他们采取银行贷款方式，从香港

引进二千二百万港元改造客房和部分餐厅。采取补偿贸易方式，由香港景星旅游公司按照七五折计算房租，包租西楼七至九层客房为条件，借款一千万港元。采取合作经营方式，一九七九年与香港东太和公司合作营办“康乐中心”即电子游戏机，合作期为三年。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营业到一九八二年合作期满止，共收入七十四万多元，按东方宾馆得六成分成，从中得利三十多万元。一九八一年，他们同样采取合作经营方式，与法国巴黎茉莉雅集团合作营办“东方茉莉雅美容中心”，由外商负责设备和维修的全部费用以及提供理发化妆品，按东方宾馆占百分之七十四分成，该中心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正式营业到一九八二年，东方宾馆就从中收入近十四万元。东方宾馆择优选择外资渠道说明，利用外资的渠道和方式选择得当，是显著地提高利用外资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目的，坚持平等互利，权利、义务、收益平等，确保双方正当权益，中外双方有利可图，这是东方宾馆能够通过三种渠道和方式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经验。

选准合理投资方向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需求，选准合理投资方向，就一个企业来说，应当是抓两个重点：一是对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性的项目；二是本企业的技术改造。东方宾馆的主要做法是：

首先，分析宾客的动机和心理，在开展服务工作中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住东方宾馆的宾客多是商人、旅游者、学者。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的需求，要能够满足宾客的不同需求，对他们就要有一种强大的形象吸引力，才能扩大客源，提高服务质量，取得经济效益。

其次，对宾馆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性分析。一九八〇年前，东方宾馆尽管是广州市最高级的宾馆之一，但服务设施同外国先进酒店相比相差很远，有的外国住客说“落后二、三十年”。在一九七三年扩建西楼后，仍然没有空调设备，客房可谓“夏暖冬凉”。夏天，房间温度有时高达三十五度左右；冬天，客房很冷，有的外宾都不愿进房，这样的住宿设施对宾客没有多少吸引力。后来，他们对宾馆进行几方面的综合性投资分析，算了几笔账：

一是住房账。改造一间客房，包括安装中央空调、电脑电话、中央音响、闭路电视、烟感防火等五大系统和地毯、墙纸等，需要七千四百元。但改造后，房价从每天二十元增加到五十元计算，一天增加收入三十元，每月开房二十四天计算，则每间房每月可增加房租七百二十元，每年增加八千六百四十元。就是说，不到一年，就已收回改造房费。改造后客人愿住，开房率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是饮食账。餐厅不改造，设备落后，生意冷淡，收入少（改造前，每年营业额只有二百万元左右）。餐厅设备改造后，宾客感到豪华满意，收入大增。营业额每年可达二千万以上。

三是“玩”账。过去，宾客对宾馆提意见，说晚上除了吃饭、工作外，就是睡觉。经过他们算细账，增设了音乐茶座、舞厅（只准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进入）、咖啡座、酒吧等，使住客在闲暇时间有娱乐休息的场所。

四是交通账。宾馆专门成立车队，客人出门有车接送，既使宾客感到满意，又增加收入。第一批购买了一〇三辆小车，八个月内便收回成本。

五是通讯账。没有电脑电话，客人打电话很不方便，等的时间很长，更不能直通香港。设有电脑电话后，客人可直通香港，简单、方便。这对住客来说是一种吸引力。

通过这些算账和利弊对比，摸清“家底”，结合宾馆特点，才确定外资投向的决策，避免了投资的盲目性。

宾馆是服务性企业。服务是一种通过运用设施和劳务支出来获得价值的特殊商品。现代宾馆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宾客住宾馆，以付出一定的费用来换取各种各样的物质消耗和服务。住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是一种消费过程，是

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因此，优越的物质条件，完善舒适的服务设施，不但是办好宾馆，提高优质服务，吸引来客，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一种先导性投资，它能引起、带动、扩大其他项目的投资，起着投资的“醇酶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世界上已出现生活多样化，把消费资料从生存需要阶段向享受和发展阶段转化的时候，物质条件和其他服务设施不好，没有必要的先进的劳动手段，其他方面再好，也很难甚至不可能提供质量好、品种多的服务项目，就不能招徕更多的宾客。因此，东方宾馆在经营决策和经营战略上以宾客为轴心，围绕宾客的不同需求，把利用外资来不断完善服务设施作为先导性投资，以投资引起投资，从而使宾馆经营项目逐步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在投资方向上，着重从舒适满足、多能方便两方面入手。他们在舒适满足方面主要是：

客房服务设施尽量做到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既保持中国的民族特色，又力争达到国际水平，让客人把宾馆当作“家外之家”，生活过得满足、愉快、欢乐、有美的享受。他们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在引进外资的三千二百多万港元中，另加三百四十万元人民币，本着既有民族化、现代化，又实现少花钱、多办事，立足自力更生的原则，重点对宾馆一千一百八十二间客房（概称一千二百间）分三批大规模地全面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及改装部分餐厅。对于客房，除床具、墙壁、卫生间等进行改装和更新外，主要是新建了五套先进设备系统：一是当时美国最新的物理控制和中央空调系统，房间温度自动调节，能保持各层楼气压和温度；二是美国贝尔系统的电脑电话系统，具有六十八个服务项目，三是闭路电视系统，每个客房都有彩色电视机，还有两个频道能昼夜接收宾馆播放的闭路电视节目；四是音响系统，可同时昼夜播放两套音乐节目；五是烟感防火系统，任何一个房间的烟雾达到刺眼程度，房门前的警灯就会自动启亮，服务台的警铃就会发出警报。

现在，全宾馆近有一千二百间客房中，“有总统”套间一间、五套间一间、四套间三间、三套间二间、二套间八十三间、双人间七百九十三间、单人间二百九十五间，床位二千一百张。客房改造后，使宾馆逐步接近洲际酒店水平，对宾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开房率也大大提高。从一九七八

年的百分之六十多，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九八。接待人数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十三万人次，上升到一九八三年五十六万九千七百多人次。这就为进一步开发其他经营项目投资创造了条件。

在**多能方便**方面，坚持“宾客第一”的原则，不断开发经营项目。东方宾馆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广开门路，全面发展，努力把宾馆办成住、吃、用、玩、买，样样齐全，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新型旅游企业，以适应和满足多种不同要求，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在**吃**的方面，他们参考国际旅馆的要求；大量开发和延伸具有特色的经营项目，尽量使宾客不出东方宾馆就能吃到全国各地有名的菜肴，以及一些外国的名菜，逐步做到“食在东方”。他们把全馆各具特色的三个大餐厅：翠园宫餐厅、花园餐厅、八楼餐厅改造成为经营不同项目的四十八个大小不一、特色各异的小餐厅，座位有三千五百个。有如翠园宫餐厅以广东菜为主；八楼餐厅以具有全国各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名菜为主，包括唐朝宫廷名菜御膳；按西欧古典方式布置的花园餐厅则具有中西菜相结合，精制全国各地和六国（法、英、德、苏、葡、意）名菜，宾客可以随意地挑选鲜鱼、活虾，现买现做现吃；在东楼二楼“俱乐部”的海底餐厅，可以吃到法国名菜焗田螺等各种风味；春晖餐厅则以广东小吃为主，从早上六点营业，一直到凌晨三点。最近两年，常常是每天住宿只有二千人左右，而就餐人数高达四千人左右，有时一天餐厅营业额达十二万元以上。

在**用**的方面，着重做好通讯和交通工作，尽量为宾客提供方便。在**玩**的方面，在不离开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设置多种多样的文娱活动场所，为宾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让住客按照个人生活爱好选择自己憩息的去处。今明两年，他们将与香港紫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在大金钟水库地段兴建规模大、式样新、项目众多的大型现代化游乐中心。在**买**的方面，他们先后投资四十四万元，把东楼一层改装成二十七间专柜商店，千方百计地为宾客提供选购商品的场所。从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的四年间，商场营业收入达二千四百零六万元，获得利润四百八十四万七千元。

近几年来，在把不断完善服务设施作为先导

性投资的基础上，大力开发经营项目，实行住、吃、用、玩、买多功能相结合，不断改变经营结构，所以，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各种经营项目的营业收入比例发生显著变化：原来住房收入与其他项目收入的比例是六比四，现在已变为：住房占四，饮食占三，用、玩、买占三。这种四三三的比例，表明了东方宾馆的经营管理工作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准。

努力提高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

利用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衡量和提高利用外资经济效益，必须着重把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结合起来，既要企业盈利性效益来衡量，又要从社会综合性经济效益来考察；既要着眼于企业经营的盈亏，又要把握社会经济的效益。

如何努力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东方宾馆的主要做法是：

提高资金的有效使用，是利用外资成功的关键。投资是发展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没有资金，固然不能扩大再生产；有了资金，如果使用效率不高，也不能充分发挥投资的应有作用。而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劳动者是一个非常因素。所以，只有把资金和其使用效率很好地结合起来，尽量发挥劳动者的生产（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资金周转，减少劳动时间的非生产性浪费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非生产性消耗，才能提高投资的效率，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利用外资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

东方宾馆在利用外资中，十分注意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一九七九年底，东方宾馆决定引进外资二千二百万港元对客房进行大规模改造后，很多外商主动找上门来想做生意。有的提出，与东方宾馆合作改建；有的说，要全部承包；有的则想同东方宾馆合作经营；……。这些做法，从有利方面来看，比较省事，但是不符合自力更生原则，宾馆会受人支配，失去主动权。为了充分发挥外资作用，他们在尚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考虑近效与远功的关系，不急于求成，而是采取招标办法，先请香港锦泰公司、中发公司、中港公司、隆辉公司四家有技术的专业公司分别在东、西两楼改造七间客房“样板房”，让四家公司各显神通，互相竞争。结果，外商改造的二十八间的

“样板房”的式样多种，各有特色，有中国式的，也有欧美式、日本式的，虽然各有利弊，但改造价格都较高，平均每间房要用四万多港元，有的高达七万港元。按此标准，最多只能改造一半客房，餐厅无法改建。这样改造是一种下策。宾馆党委决定，在改造时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自己能做到的自己做；二是国内有的材料坚决不进口；三是房间家具能翻新的就不重做。他们广取外商“样板房”之长，请来省内十六个大小施工单位，实行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自己动手先改造两间“样板房”（东、西楼各一间），从科学的有节奏的施工中求高速度、高质量和良好的经济效益。结果，自己改造的“样板房”质量比外商做的还好，而且每间房的改造费只用了一万八千港元和二千元人民币，做到既好又省。随后，他们就自己动手改造全馆近一千二百间住房，总共才花了二千二百多万港元和三百四十万元人民币，改造费比外商便宜一半以上。

利用外资不仅可以弥补国内部分建设资金不足，又往往带进了一些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快民族经济发展。一九八〇年，东方宾馆利用一部分外资，新建了中央空调等五大系统后，就充分利用引进的先进技术，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壮大自己的技术力量，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例如，他们用五十六万美元，引进具有六十八项功能的世界先进的美国贝尔系统的电脑电话后，电话使用率比原来提高十二倍。到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仅使用一年，就收回电话费一百四十多万元，服务费四十多万元，一年收入外汇近二百万元。除了赚回成本（投资）外，还盈利一百二十万元。更重要的是，他们采取请进来和派出去的办法，即请贝尔系统的专家来东方宾馆讲授电脑电话的技术理论知识，派人到贝尔公司跟班学习设备维修技术和编制软件技能等，不断培养和提高技术队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一九八二年，他们不但已经自己可以负责维修、保养这台电脑电话和编制软件，而且贝尔公司还同意由东方宾馆负责给广州人民大厦安装一台贝尔系统的电脑电话。这样，既学到了技术，又赚了钱，为国家节约五万美元的安装费。

用好留成外汇，这是提高利用外资经济效益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用好留成外汇，可以加速资金周转，把外汇搞活；外汇资金留着不用，

或存放在国外生息，而去向别人借债，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浪费和损失。如何用好留成外汇？就是要用在对企业经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开发项目投资上。这样，才能使留成外汇产生更大作用。东方宾馆就十分重视把留成外汇用于开发性经营项目。一九八一年，他们利用一九八〇年所取得的部分留成外汇改造翠园宫餐厅；一九八二年改造八楼餐厅；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又利用部分留成外汇约六十五万元（不含另用人民币）修建“康乐中心”，等等。这些开发性的经营项目投资，都有较高的资金利润率，为宾馆提高利用外资效益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断改革经营管理体制

一是改革领导体制，实行分权而治，分级管理，实现管理结构合理化。围绕满足宾客需求和提供优质服务，明确组织结构和功能，确定各职位的权力范围和工作指标，实行职责、权限结合，形成总经理——部门经理（主任）——主管——班组长——服务人员的直线指挥系统。因而指挥灵活，决断及时，节约劳动，效率显著。一九八一年改革前，宾馆领导层次臃肿，责任不明，工作效率较低。一九八一年九月起，开始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后，在组织结构上，首先改革领导体制。政企分开，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和部门经理负责制。在宾馆一层，把过去正副经理九人，改为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二人；总经理对宾馆的经营管理实行统一指挥，全盘负责，明确规定总经理的八项职责和五项权限；副总经理的四项职责和权限。根据业务需要，改行政事业体制为企业体制，将原来十三个行政科室改为二十二个经营管理部，实行部门经理（主任）负责制，并明确规定其职责、权限、职能范围。每个部门正副经理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不受资历、年龄限制，量才录用，能者上任，设一至三人。现在，全宾馆有部门经理（主任）一级领导五十五人，有的二十多岁就担任部门副经理。由于实行“能人当家”、“能人治馆”，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办事效率比过去大大提高，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如接待总统一级的贵宾，过去很忙乱，办事效率低，现在由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召集有关部门的经理

一布置，半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二是扩大三权——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在人权上，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各部门实行定员、定额、定岗包干负责的“三定”管理体制。对于不足人员，在指标范围内，自行招工，择优录取（包括临时工）；对于干部、职工有提拔、晋级、降职降级、调离、直到辞退和开除的奖罚权。这里，一方面，宾馆有招人的权利，劳动者也有被招的一定权利；另一方面，对不符合需要的人，宾馆有辞退的权利，个人也有要求辞职的权利。总之，双方都有互相选择的权利，一改过去统分统配的做法。在财权上，除将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由过去上交百分之八十，改为同大修理基金一起，全归宾馆支配外，实行税后利润“五五分成”，即上交百分之五十，宾馆留百分之五十自行使用。在留成利润中，再生产发展基金占百分之六十，集体福利基金占百分之二十，奖励基金占百分之十二，后备基金占百分之八。另外，有一段时间，宾馆还从全部营业额中提取百分之二点二（商场为百分之一）的金额用作职工的奖励，取消过去的奖金制度。这样，宾馆从过去只能支配五百元以内的财权，扩大到能支配八百万元的权限，这就能充分发挥资金的潜能作用。在经营管理权上，除各部门之间采取签订“工作协作合约”的形式进行工作外，为扩大经营范围，组织客源，宾馆可根据客源情况向下浮动房价（向上浮动需报上级批准）；根据需要与发展情况，有权增设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

三是实行科学的管理，严格按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进行各项工作。提高企业利用外资经济效益，必须有与企业本身特点相结合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建立一套切实可行，奖罚严明，责、权、利相结合的规章制度，使企业按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开展各项工作。东方宾馆的科学管

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有一套严格的科学的规章制度。为了保证服务工作高水准，经营管理工作井井有条，他们总结过去二十年在经营管理上的经验和教训，借鉴国外酒店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结合宾馆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围绕节约劳动和提高劳动价值，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制订了一整套从宾馆、部门到班组的用智力、用科学的管理制度，层层分解，层层落实，工作有定时，行动有定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创造更多的劳动财富。

二是重视培养精干的服务队伍，充分、有效、持久地开发和综合利用劳动力资源。他们主要从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两方面入手。在思想教育上，经常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把重点放在青年职工身上，教育职工发扬为国献身精神，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多作贡献；教育职工对自己的物质需求不能超越社会生活水平；教育职工分清什么是幸福和享乐，树立正确的幸福观，等等。在业务上，主要是分四个层次——总经理、部门经理和主管、班组长、服务员，按照不同的要求，采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教育，不断提高全馆职工思想水平和专业素质。这是合理地开发劳动力的潜在资源，节约劳动，提高劳动价值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投资。

三是采取科学的报表制度，根据数理统计指导经营活动。总经理用数据进行指挥，部门经理用数据控制和检查经营活动，服务人员用数据来评比自己的工作。一切按数据说话。有效地保证利用外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丘逢甲学术讨论会论点简介

广东省纪念丘逢甲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广州市和梅县市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广东历史学会、广东中国文学学会、广东教育学会和梅县地区、蕉岭县联合举办的。来自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及广东的学者、专家、研究人员和丘逢甲的亲属共一百一十三人出席了讨论会，并提交论文四十一篇。

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同志对丘逢甲在文学、教育事业和抗日保台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丘逢甲从抗日保台到支持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丘逢甲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教育家和著名的诗人。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国家处于瓜分豆剖危境的时候，丘逢甲先生为救亡图存、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为唤醒民众、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努力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言行，对一百多年来我国人民为独立、统一、富强、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会者认为，丘逢甲诗作洋溢着爱国思乡，渴望祖国统一的炽热爱国主义激情。这不仅在当时震撼着沉闷的诗坛，为“诗界革命”吹送了一股充满爱国情感的新风，而且对当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极有裨益。其诗作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一、以振兴国家和民族作为收复台湾的后盾，把谋求祖国的富强、统一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二、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罪恶，呼吁人民群众认清前

途形势，救亡图存。三、暴露清廷的昏聩，探索振兴国家的途径。四、思想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断前进，从赞助变法维新转而倾向和支持辛亥革命。

同志们认为，丘逢甲在创办新学的过程中，敢于冲破封建顽固势力设置的种种障碍，不避时忌，开风气之先，积极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热心于培养人才，积极引导青年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

与会者对丘逢甲思想的转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大约在一九〇六年前后，丘逢甲在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推动下，基本上完成了由维新爱国绅士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转变。促使丘逢甲思想转变的因素是：一、强烈的爱国爱乡思想。二、对下层人民苦难的了解和同情。三、革命党人的帮助和推动。有的同志则认为，丘逢甲在一九〇八年对革命党人还不够了解，也不希望用激烈的手段推翻清廷。只是到一九〇九年，他在咨议局争取立宪的运动中，才越来越看清了清廷顽固保守，已失尽民心，必然灭亡。新的政权将会出现。他希望新政权能使其实现收复台湾的夙愿。故其思想也转向革命。还有的同志认为丘逢甲是维新派、立宪派，并没向革命派转化。其理由是：一、丘逢甲对清廷存在幻想，不主张推翻它。希望通过改良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二、丘逢甲敌视“民变”，恐惧“兵变”，害怕革命引起内乱。三、丘逢甲常来往于官僚士大夫之中，与开明官僚和维新派人士过从较密。

(史斌)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辩证法

马 中 柱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纲领性文件。正如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一样，《决定》这部“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中也充满了辩证法，特别是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体制的辩证法。掌握这个辩证法，对于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体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生产关系，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条条到块块、从国家机构到基层企业，从企业到生产者个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因素都既是同一的，又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同一存在于它们的差别之中，它们的差别又存在于它们的同一之中，这是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经济体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在经济体制上所形成的那种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就是由于割裂了同一和差别的辩证关系，搞了形而上学。中央的《决定》在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割裂以后，在经济体制中恢复了同一和差别的辩证法，增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的辩证法，使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在同一性中包含差别性。原有经济体制模式，片面强调一些经济关系的同一性，抹杀其差别性。例如，在管理体制上政企不分，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把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机构直接管理企业混为一谈，这样就使企业失去了自主权，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窒息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进取精神。在价格体系上，同类产品的质量差价不能拉开，压抑了企业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积极性。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抹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把工资拉平，把经过社会主义达到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能有程度的差别和先后的差别，如果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先富裕起来，就看作是“暴发户”、“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只要同一、不要差别的形而上学的固定观念，把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方面和因素片面

化和畸形化了。正如黑格尔所说：“由于他们死抓住这个以差别为自己对立面的呆板的同一，所以他们看不到自己这样做时就是把同一变成了片面的规定性，而片面的规定性是没有真理可言的。”^①过去的经济体制由于坚持否认差别的“呆板的同一”，无论企业和个人都只有统一性，没有独立性，就不能不扼杀企业的活力和生产者的主动精神。

按照辩证法，任何同一性自身都包含着差别性。恩格斯指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②不包含差别的同一是抽象的同一，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列宁认为：“辩证的东西 = ‘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③也是要求人们从同一中看到差别和对立。中央的《决定》揭示了经济体制各方面、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辩证法，就是在形而上学固定观念只看到同一而否认差别的地方，指明了差别，并按照实际情况把差别“拉开”，使有差别的东西互相竞争、互相激励、互相推进，发挥其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作用。

例如，在行政机构和企业之间，明确划分各自的职责范围，既能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作用，使各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又能发挥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合和竞争，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

再如：为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允许在企业内部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达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激励每个工作人员积极向上，努力工作，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就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勤奋致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二）经济体制的辩证法，使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在其差别性中又包含了同一性。原有的经济体制模式，则把另一些经济关系的差别和对立片面地加以强调，而否认它们之间的同一。例如，在所有制的体制上，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和个体经济形式完全对立起来。在管理体制上，把集权和分权、条条和块块完全对立起来；在计划体制上，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计划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完全对立起来；在价格体系上把统一价格和自由价格、价格稳定和价格浮动完全对立起来；在企业之间的关系上把协作和竞争完全对立起来；在企业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中，把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组织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完全对立起来；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把增加消费和发展生产完全对立起来；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把中国和外国完全对立起来；如此等等。甚至把对立的一方奉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萌芽”；而把对立的另一方斥之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企图在这两者之间，挖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表现着辩证法的本质。^④“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⑤《决定》正是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从形而上学的固定对立中指出同一，指出了联系和转化。长期以来，我们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所以千方百计限制商品生产的发展，打击商品生产者，使我国本来就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更形落后。中央的

《决定》把这种僵硬的对立打破了。《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计划的制定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商品生产的发展由计划来指导。所以《决定》说：“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在生产和消费上，过去也是把它们看作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次中央的《决定》明确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它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是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开拓广阔的市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又决定生产。”这样，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推动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中央的《决定》不仅把经济体制中的计划和商品、生产和消费这些传统的固定对立观念同一起来了，而且也使计划的统一性和灵活性、统一价格和自由价格、厂长负责制和工人群众当家做主、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等等原来认为不能统一的对立面获得了同一。列宁说：“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⑥《决定》使经济体制各方面的同一和差别（或对立）互相联系、互相贯通，也就是要把它们“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和处理。这就使经济体制内部获得了“‘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生活”的源泉和动力，也就使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二

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⑦体现活生生的辩证法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而经济体制的辩证法，又为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克服原有经济体制模式造成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济体制的辩证法，要求根据我国生产力的要求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经济形式和管理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决定》要求我们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推动生产力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这样，我们在改革中采取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组织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只能根据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来确定，而不能采用什么固定的模式。这就能够纠正在经济体制问题上照搬照套的主观主义态度。过去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对一些经济形式、计划、政策、措施，等等，不做科学论证，不看经济效果，只要贴上了“社会主义”标签，就只能套用，不能变更；一当贴上了“资本主义”标签，就只能贬斥，不能采用。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又只算“政治账”，不算

“经济账”，根本不受生产力发展情形的检验，这就不能不助长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主观随意性。列宁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⑧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整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一切经济体制好坏和经济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就会导致经济体制中的辩证法更加完备，各种经济计划、决策更加符合实际，并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不断满足。

经济体制的辩证法，能够发挥经济关系中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认识和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过度集中统一，政企职责不分，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使企业丧失了自主权，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而国家机构就成了千百万个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一切企业的经济活动都要由国家机构作出决策和规定。正如《决定》指出的：“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复杂，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所以，国家机构要去直接经营管理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不能不超出他们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限度，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样，在计划体制中，过去由于只强调计划的统一性，不讲灵活性，没有看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际情况，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并且单纯用行政命令加以实施，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同实际脱节，产生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⑨这说明任何人的认识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现实条件。按照中央《决定》改革后的经济体制，由于政企职责分明，简政放权，企业有了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经营方式、安排产供销活动、支配自留资金以及人事、工资奖励等各项必要的权力，同时由于建立起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体制，政府机构“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这样，就能够克服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现象，就能使国家机关和基层企业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经济情况，解决经济的管理和计划问题。

经济体制的辩证法，使我们能够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所反馈的信息，及时修正和补充原来的经济计划和决策，使之逐渐与经济规律相一致。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⑩过去的经济体制不重视经济杠杆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机关的经济计划和重大经济决策一般是靠行政命令来加以实施的，加之单位之间互相分割，所以即使是瞎指挥也得不到及时纠正。改革后的经济体制，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既有差别，又互相联结，通过价格、税收和信贷体系就能评价各种生产经营活动的效果，通过在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和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就能够

及时发现国家机构的决策和计划是否正确，暴露企业经营管理的优缺点。这样，经济计划和决策在实施中产生的问题，就能够通过各种信息灵敏地反映到计划和决策者的头脑中来，而且由于各项工作的责、权、利三者是结合的，也就有人关心对信息的汇集和处理，及时地修正和补充原来的计划和决策，使之臻于完善和正确。

三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它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我们党也利用了自己在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中组织和管理经济的经验，以及解放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各自的特定环境中都起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也不无裨益之处。但是，这些经验在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上，不是偏重在同和统的状态，就是突出地表现为彼此分割和排斥的状态。当时对我国经济体制影响较大的苏联模式，就是国家集中统一过多，对企业管得太死，政企职责不分，搞单一的公有制，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我国当时还处在改造旧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的过渡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因素、各种形式、各种规律还没有具体的了解。正象恩格斯讲到十七、八世纪的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时指出：“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⑩我们当时确实要有一个时间来取得经验，并且研究经济体制各方面、各层次和各种因素的性质、功能和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确切地知道它们是什么，然后才能去把握它们的联系和变化，把握它们的辩证法。所以，当时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在处理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容易把同一和差别分割开来，并由此产生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弊端，也是有其“重大的历史根据”的。

原有经济体制中的模式形成起来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党对经济管理的各种体制积累的经验逐渐增多，到了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已初步发现我们的经济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苏联为借鉴，总结了我国自己的经验，强调了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生产单位以及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这说明当时已开始对经济体制中的形而上学采取了批判态度。列宁认为，“辩证法 = ‘对自身的破坏’。”^⑪也就是要求看到同中之异，正面中之反面，肯定中之否定。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看到了

“同”中有“异”，在管理权限上看到了“统”中有“分”，就是在经济体制上进行了辩证法的探索。特别是陈云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和发展的根据，是活生生的辩证法。后来国务院还根据“八大”精神，于一九五七年发布了关于改革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等三个规定草案。但由于随即进入“大跃进”时期，整个经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急躁冒进，搞瞎指挥，刮“共产风”，使经济形式走向单一化，把“大锅饭”、“铁饭碗”的现象进一步强化，以致改革方案都未能实施。从“大跃进”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经济体制还经过几次改革，但变来变去没有跳出行政管理的框子。中央《决定》在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时指出：“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这说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是使原有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得以长期存在下来的主要原因。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放下了包袱，解放了思想，能够以科学的批判态度对待旧的经济体制模式。同时，我们党又有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于各种经济因素和各种经济关系有了具体的认识，特别是经过这几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这就有了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加以比较和借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能够把原来对经济体制各个侧面的认识（包括片面的认识）加以辩证的综合，把经济体制中各种关系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加以认识和解决，使它们的同一性和差别性互相包含，而不是彼此割裂。在《决定》中，冲破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原有经济体制模式里面的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经过改革后的经济体制将会充满辩证法，充满生机和活力。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P140

②、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538、562

③、④、⑤、⑥、⑦、⑫ 《列宁全集》第38卷P97、235、111、408、410、336

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60年版）P131

⑩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240

再论“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

刘景泉

我省哲学界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年。至今，对于“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大体上仍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的概括和表述；另一种是认为“两变”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我则认为“两变”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的、科学的回答。

（一）不能把“两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

张江明同志在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学术研究》发表的《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以下简称《再探讨》）一文中，虽然说“毛泽东同志是从哲学基本问题来回答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可是，他仍然认为“‘两变’确实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它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而分成了两大阵营，……等等。这就说明，问题和回答是不同的，问题可以是一个，答案可以是多个，反之亦然。毛泽东的关于由物质到精神和由精神到物质（简称“两变”），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对哲学基本问题全面的、正确的回答。如果把毛泽东的“两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势必会认为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是根据十九世纪哲学史上争论的内容，而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期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不是清楚地说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已经过时、应当修改和发展吗？

由于张江明同志坚持“两变”是哲学基本问题

的概括和表述，因而在《再探讨》一文中把唯物论和认识论看成是一个东西。在他看来“两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两变”既阐明认识论，又阐明唯物论，因而唯物论与认识论是一回事。他甚至引用这样的论述作为根据：“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唯物论和认识论看成是一个东西。”

张江明同志强调认识论和唯物论的关联是正确的，但这两者并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并列的概念。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理论。根据认识理论不同的观点，划分为各家各派的认识论。有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有唯心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又分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庸俗唯物论认识论等等，唯心主义认识论中又可分为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如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和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如黑格尔的认识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不仅不是把唯物论与认识论看成一回事，而且揭示了在认识论中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列宁正是把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立起来，作为该书第一、二、三章的总标题。列宁还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①可见，认识论和唯物论并不是一回事，正象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并不是一回事那样。如果认为认识论和唯物主义是一回事，那势必否认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存在，势必认为列宁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对立起来是多余的。张江明同志关于“认识论是不能离开唯物论的”看法也是含混不清和不准确的。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唯心主义认识论不正是“离开”（应当说反对）唯物主义吗？！事实上，唯心主

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用“不能”就可以抹煞的。

和以上问题相联系的，由于张江明同志没有区分辩证唯物主义与其他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因而就把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混淆起来，或者说把旧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文章中出现前后不一致的自相矛盾。例如他一再强调“唯物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同社会实践有直接联系的。”决不能“把唯物论和社会实践割裂开来。”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费尔巴哈唯物论“离开社会实践来讲认识”。不能笼统地说，唯物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论和社会实践不会割裂的。众所周知，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根本区别的显著特点之一，旧的唯物论决不具备和社会实践直接联系的品格。

还要顺便提到，把“两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那就无形中把“两变”和哲学基本问题看成是一回事。按照这样思路推演下去，对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有不同回答，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流派了。于是乎，旧唯物论的哲学基本问题也是“两变”，唯心主义的哲学基本问题也是“两变”，那岂不是说各种哲学流派都变成“两变”的学派了吗？

从上述可知，决不能把“两变”看成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更不要说是最精辟的概括和表述），而只能看成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回答，然而科学的、全面的回答。有些理由我在《关于“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拙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中已作了阐述，在此恕不赘述了。

（二）“两变”不仅仅是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

刘歌德同志在《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中反复论证，认为毛泽东的“两变”命题，讲的是认识论中的唯物论，讲的是反映论，不是讲的一般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论”。然后他想由此证明“两变”只是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而没有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可是，遗

憾得很，这是无法证明他所要证明的结论的。因为他的前提（把所谓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和本体论中的唯物论绝对对立起来）就难以成立，结论自然就不可靠，而且在这里，他倒是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认为“两变”只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命题，没有回答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说“两变”讲的是认识论中的唯物论。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能在精神还是物质何者为本原的意义上理解唯物论与唯心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②即使退一步而言，“两变”如果不回答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那能配称为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呢？我们知道，认识论首先要回答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物质和精神是认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③

刘歌德同志多少感觉到他说的“两变”没有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有点难以自圆其说，便又提出所谓广义认识论与狭义认识论的区别，说什么哲学基本问题是广义的认识论，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是狭义的认识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三章“讲的是广义认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两篇著作“讲的是狭义的认识论”。按照这样区分，那就等于说，这些著作的区别在于：毛泽东的两篇著作只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列宁的那本著作才全面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这种分析不仅没有根据，而且有意无意把毛泽东和列宁的这些著作对立起来了。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直接引用了列宁关于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的论述，并结合我国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而且也吸收了列宁关于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的论述，更加全面地论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可见，列宁和毛泽东讲的认识论，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完全不存在什么“广义”、“狭义”之分。如果要按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话，那只是在于批判的具体对象不同，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而不是在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有什么不同。难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一、二、三章和毛泽东的《实践论》，都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为总的概括。

张江明同志强调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联，刘歌德同志则强调这两者的区别，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各有偏颇之处，没有很好揭示这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我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以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或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为对象，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既是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原的学说（理论）；认识论是研究认识的源泉、规律、真理的理论。世界上万千的现象，其本原是什么？是物质，还是精神？这是本体论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我们的认识的源泉是什么？是物质，还是精神？这是认识论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可见，本体论与认识论是从不同角度研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历史上思维水平稍高的哲学家都是无法回避而且必定要回答这些问题的。例如，古希腊的泰利士说万物本原是水，阿克西曼尼说是气，赫拉克利特说是火，柏拉图说是理念，德谟克利特说是原子。难怪亚里士多德这样说：“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④与本体论密切相关，认识论首先要探讨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精神自生的，还是来源于物质世界？例如柏拉图的本体论是“理念论”，他的认识论也是“理念论”，认为认识是对理念的回忆，是理念所派生的；而德谟克利特的本体论是原子论，他的认识论实质上也是原子论，认为只有原子和虚空才是“按照真理”存在的。仅此一斑，可窥全貌。列宁正是总结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丰富材料，沿着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认为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列宁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⑤可是，刘歌德同志认为毛泽东的“两变”讲的是认识论中的唯物论，不是讲的一般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论，这就把本体论与认识论绝对对立起来了。张江明同志看到“两变”既和认识论有关，又和本体论有关，这是很好的意见。可是他没有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弄清本体论与认识论和哲学基本问题如何发生关系，因而得出“两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这样的错误结论。正确的理解恐怕应当是这样：无论是本体论

还是认识论，都不能超越物质和精神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它们从不同侧面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是辩证的统一，它实质上反映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固然不行，但是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不行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认识论只是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而本体论只是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如果是这样，本体论和认识论就不可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会变成两种不同的理论。毛泽东的“两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然而它也全面回答了本体论的根本问题——存在和思维、物质和精神关系的问题。

刘歌德同志把“两变”原理局限于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这不仅不符合毛泽东著作原意，也不符合哲学史事实。在哲学史上，有这样的哲学家，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可是对第一方面却作出否定的回答。例如，黑格尔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承认精神可以向物质转化；但他绝对不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不承认物质可以向精神转化，相反，他把物质看成是观念的异化。列宁一方面肯定黑格尔观念转化为物质的思想，指出“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另一方面又尖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指出“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的转化——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转化。马克思纠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错误（或弱点？）。”^⑥如果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仅仅看成是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那岂不是说，象黑格尔那样的辩证唯心主义者也懂得物质变精神，或者认为黑格尔连精神转化为物质也不懂。这两种必然的逻辑结论，既不符合哲学史事实，也不符合列宁的分析。可见，应当把物质变精神（即从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与精神变物质（即从主观精神转化为物质），看成是两个既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命题，前者正确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后者正确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这样，才能把认识论与哲学基本问题统一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变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全面的、科学的回答

只要我们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分析，把有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那就不难发现“两变”的理论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的回答。

第一，按照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的解释，“两变”是指从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又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物质，即物质——精神——物质的能动认识过程。他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可是，“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为了说明这个结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毛泽东否定了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答案，然后作出辩证唯物主义回答：“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为了使广大干部群众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又通俗地解释了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指出“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请问：这种“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由存在到思想”不正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原理的具体体现又是什么呢？不是用辩证唯物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又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从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的“两变”公式即物质——精神——物质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郑重地指出：“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

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⑦请问：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怎么没有回答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呢？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两变”的理论不仅唯物地而且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

第二，毛泽东的“两变”理论，直接师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只要进行一点历史考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可以看到全面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

可以有把握地说：毛泽东关于“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的论断，是直接师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这一论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⑧毛泽东关于“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论断，是直接师承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论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⑨马克思所说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的唯物主义命题是批判黑格尔把观念、思维看成独立的主体、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提出来的。它不是正确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又是什么呢？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又是什么呢？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话，说的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它不仅一般地回答了意识、理论可以认识、反映客观世界，而且站在辩证唯物主义高度，阐明了理论与群众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物质的关系，可以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的“两变”与恩格斯、列宁有关论述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尖锐地批判了杜林及其祖宗的唯心主义路线，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列宁完全忠实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⑩毛泽东所说的“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由存在到思想”与恩格斯、列

宁所说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不仅精神实质完全一致，甚至用语也非常相似。那么，这种唯物主义路线，怎么可能没有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呢？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它回答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两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625页）毛泽东这段话再清楚不过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既正确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又在更高的基础上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

在实践上，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计划、方案、方针、政策等等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就可以看到它也经过从物质——精神——物质的过程，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这个过程，既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又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

第二方面。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变”不仅正确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即能否认识、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而且正确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即精神、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就是正确解决了思想如何才能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 ①《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4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 ③《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6页
- 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962年商务版第126页
- ⑤《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8页，重点号是引者加的
- ⑥《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314页
- ⑦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3页，重点号是引者加的
-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 ⑩《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页



《红楼梦》标点一得

周林生 苏海

《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描写晴雯维护人格尊严、反对主子抄检的一段文字历来脍炙人口。但这里有处地方人们总是感到很不通顺。原文是这样的：

“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端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此据庚辰本）

新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是这样标点的：

“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

这样的标点令人百思不解：箱子既已“朝天”，又如何能“往地下尽情一倒”？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则这样标点：

“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

把“朝天”二字删掉，如此一来，虽然文理上通顺了，但作者所描写的人物的神韵却大打折扣了。

其实，只要细细玩味，不必删改，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段标点得文通理顺的：

“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端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

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剖析

史贻逵 吴 晖

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学术界过去和近几年来都曾有过热烈的讨论，至今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在总体上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大家没有异议。分歧主要是集中在对矛盾两个基本属性，即同一性与斗争性能否各自单独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两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完全平列，等等。本文拟就上述有关问题试作一些分析，以表明我们的基本看法。

同一性与斗争性有机结合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

从总体上看，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这种看法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在谈到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种发展观根本对立时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①在这里，列宁指出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列宁所讲的“对立面的统一”是指整个矛盾关系，或者是同一性与斗争性两者的结合体，而不是单单指矛盾的同一性或斗争性，因为列宁在紧接着上面那句话后面的括号中，已作了注明，即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两个对立面之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关联”的双重关系。总之，列宁在这段话里明确指出整个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或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同志在动力问题上说得更清楚，他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②也是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

为什么只有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呢？

首先，因为同一性与斗争性，作为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它们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即互相联结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统一之内，反过来说，它们的统一，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内，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内。”^③斗争性必须以同一性为前提，并且寓于同一性之中。矛盾双方之所以能够互相斗争，是由于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互相联结的性质，因而联成一个统一体，使双方在其中发生互相排斥作用，如果双方毫无联系，不

共处一个统一体之中，双方就没有共同的“场所”，就不可能进行斗争。因此斗争性离不开同一性。同时，同一性也不能离开斗争性，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础，因为矛盾双方的同一、统一，不是双方绝对等同和绝对均衡，而是对立的同一，一方支配另一方的统一。这种同一、统一，只有在双方斗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没有斗争，双方就不可建立和维持同一、统一。不仅同一的确立及其相对稳定的维持要靠斗争，而且同一性的变化和转化也要靠矛盾双方的斗争。没有斗争的推动，同一性就不会发生变化，以至最后发生转化。

正是因为同一性与斗争性作为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它们是互相依存不能分离的，因此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制约、交互作用的。既然同一性是斗争性存在的前提，它必然对斗争性起着制约作用。首先同一性制约斗争的性质和具体形式。由于同一性的性质不同，寓于其中的斗争性质和形式也有区别。例如在社会生活中，敌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人类征服自然方面，则表现为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等。一句话，同一性规定斗争性的性质和形式。同一性不仅制约着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也制约着斗争的程度、范围和结果。同一性处在相对稳定阶段和显著变动的不同阶段，矛盾双方斗争的程度、范围和结果也不一样，当处于相对稳定时，斗争被限制在原来统一体的范围内进行，斗争的程度以不打破统一体为限度，斗争的结果是基本上维持原来的统一体，而不是使统一体破裂和瓦解。而在显著变动阶段，斗争的程度和范围则要突破原来统一体的界限，斗争的结果是导致原来统一体的解体，新的统一体的产生。斗争性只有受同一性所制约，其性质、形式才能与同一性的性质相适应，斗争的程度、范围和结果才能与同一性发展的两个阶段相适应，这样的斗争才能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积极力量。如果斗争性脱离同一性的制约，它就会变为消极力量而阻碍和破坏事物的正常的发展。这方面的情况，在过去“四人帮”推行所谓“斗争哲学”时，表现得最突出。“四人帮”的所谓“斗争哲学”，无限夸大斗争性，完全抹煞同一性对它的制约作用，因此把斗争性歪曲为纯粹主观任意的东西。这种“斗争”当然只能对革命事业起干扰破坏作用，而不可能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不仅同一性制约着斗争性，同时，斗争性也制约着同一性。矛盾双方斗争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同一性发展的两个阶段和状态。事物发展的前期，由于斗争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因而使同一性与统一体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和状态，使事物得以进行量的积累，为质变准备条件。事物发展的后期，由于斗争已达到了使旧的同一瓦解的程度，因而使统一体进入显著变动的阶段，此时事物就发生根本的质变，由旧事物变为新事物。同一性只有受着斗争性的制约，才能使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两个不同阶段和由上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化，表现了量变到质变的正常发展过程。如果同一性不受斗争性所制约，它就会变为不能发生量变和质变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阻碍事物的发展。我们常说形而上学所理解的抽象的僵死的同一性，就是不包含斗争性和不受斗争性所制约的

同一性，这种同一观，是一切保守反动势力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变革的“哲学根据”，而一切主张打破旧秩序主张革命变革的进步人们，必然要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同一观，坚持辩证法具体的可以变动的同一性。

由此可见，同一性与斗争性作为矛盾两个基本属性，两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互相制约的。正是由于两者处于这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各自才能成为事物发展动力的一个组成因素，而只有这两个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现实的动力，单单斗争性或者单单同一性都不能成为现实的动力。学术界那种认为同一性或斗争性各自都可以单独成为动力的观点，即所谓“单因素动力论”，把动力两个密切联系的因素加以割裂，完全否认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因而抽象地肯定一方的作用，而否认另一方面的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片面当作全体，把可能性当作现实，因而是不全面的。

斗争性是构成动力的根本要素，同一性是非根本要素

我们上面已经谈了从总体上看动力的观点，如果分析到此为止，我们对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笼统的。为了对动力的问题有更加深刻和更加具体的认识，我们还必须深入去分析构成动力的矛盾的两个属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那么两者的地位和作用是否不分主次地平列的呢？当然不是。斗争性是其中的根本决定性因素，同一性则是非根本的辅助性的因素。

这种看法也不是我们的“独创”，而是经典作家的观点。在我们上面引过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第48页中所写的那段话中，就曾谈到两极的分离与对立（即矛盾的斗争性）与两极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即矛盾的同一性）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而在恩格斯和马克思合写的《费尔巴哈》一文中又指出：“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④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既说明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是不断改变的，也说明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促进工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改变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换句话说，即斗争性是同一性的改变和事物发展的决定力量。列宁从统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构成动力的角度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之后，又强调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或者说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一方面说明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出，事物矛盾新旧两方面的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从上可知，经典作家不仅从总体上指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又从构成动力的因素的区别上，进一步说明同一性与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指出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具有根本决定的意义。

经典作家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呢？完全符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对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有一个轮廓的了解。

具体事物的发展，就是其中所包含的矛盾的变化、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而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又以其同一性和统一体的变化和转化为标志。具体说来，又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同一性和统一体从初期量的变化到最后瓦解破裂；另一种是同一性和统一体虽然有变化，但最后没有根本解体，而其内容和形式都有所更新，从而使矛盾双方的统一状态发生新的变化。例如有机体中的生与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均属于第一种情况。而工业与农业、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则属于第二种情况。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是由斗争性所决定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事物中所包含的新旧矛盾双方的力量发生消长，以至达到一定程度，使矛盾旧方面和新的方面，由原来的支配与被支配地位发生根本的转化，从而使矛盾得到根本的解决，旧事物变为新事物。或者通过斗争，使矛盾双方所包含的新旧因素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使新的因素克服旧的因素，从而引起双方统一的内容和形式发生更新，使矛盾的同一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从而解决矛盾和促进具体事物的发展。假如不通过斗争，上面所讲的事物变化的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以上说的就是具体矛盾运动的基本过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具体事物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解决，或者是矛盾的同一性和统一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变化决定的，而力量对比的变化，虽然离不开矛盾的同一性，但最根本的是由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而不是由同一性所决定的。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一、斗争性是能动的因素，同一性是相对稳定的因素。所谓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性质。矛盾双方的斗争能够引起矛盾双方力量消长，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使矛盾同一性与统一体发生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使旧事物发展为新事物。而所谓矛盾的同一性，则是矛盾双方互相联结的性质，即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和具有共通纽带和桥梁。既然是这样，同一性就基本上使矛盾统一体趋向相对稳定，而不是能动地使统一体发生变化。因此同一性虽然也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但不是根本的决定的因素，只有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

二、斗争性与事物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同一性与发展只有间接的联系。由于斗争性具有能动的作用，因此它就可以直接引出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结果。而同一性不是能动因素，而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因此，它对事物发展只能起间接的作用，而不能起直接的作用。它对事物发展的作用是通过给斗争性提供前提、条件和促进斗争的展开才能实现的。如果不通过斗争，它就不能对事物发展起推动作用。所以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力量，同一性是非根本的力量。

三、斗争性与同一性相对比，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其作用在整个宇宙矛盾运动长河中是恒久的、无限的。所谓斗争性的无条件性，不能绝对化地理解为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条件，而应理解为它虽然需要一定条件，但它可以能动地使条件起变化，而最终突破条件对它的限制，从有条件的具体矛盾

运动，汇入无条件的宇宙运动的长河之中。由于斗争性可以能动地使同一性和统一体发生变化，最后使旧的统一体向新的统一体转化。因此斗争性的作用不只限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它的作用可以从一个统一体传导给另一个统一体，因而它的作用是恒久的、无限的。由于斗争性是无条件的，其作用是恒久的、无限的，所以是绝对的。而同一性则相反，由于同一性不是能动因素，因此它不能使自身所在的统一体发生变化和转化。它不能突破条件对它的限制，它的作用只能局限于一个统一体之中，而不能传递于宇宙矛盾新旧统一体生灭无限永恒交替的长河之中。它在整个宇宙事物矛盾绝对运动的洪流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暂时的。由于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因而是相对的。从斗争性的绝对性与同一性的相对性的关系，也可以说明斗争性与同一性对事物发展存在着根本与非根本决定作用的关系。

总之，由于斗争性是能动的绝对因素，它对事物的发展起直接的作用。而同一性则是相对稳定的相对因素，它对事物发展只起着间接作用。因此斗争性是构成动力的决定性的因素，它对事物的发展起着根本的作用。同一性则是辅助性的因素，对事物发展起着非根本的作用。

有一种看法，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既然都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它们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两者的作用应当是平列的，没有主次之分。他们说如果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那么同一性也应该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种看法我们暂且称它为“平列论”。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应当肯定它过去在理论的拨乱反正中反对“四人帮”的所谓“斗争哲学”上，所起的好的作用。而且这种观点就其承认同一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上，的确有合理因素。其不正确之处在于把同一性与斗争性完全平列起来，而否认斗争性的根本决定作用。这种“平列论”如果应用于实践，就可能导致本末倒置，把非根本的辅助性的因素，当成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处理事物的发展的问题上，就会把基点不是放在根本环节之上，而是放在非根本的环节上，因而不能很好地推动事物的发展。

持以上看法的同志，为了说明同一性和斗争性一样，也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举例说，我们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安定团结有利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统一战线对革命事业有利，这难道不是证明“团结”、“安定”、“统一战线”等也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吗？这种论证，从表面看来，好象可以成立，但实质上并不能证明他们的论点。谁也不能否认团结安定和统一战线对四化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的作用，问题在于这种作用是否根本决定作用。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等等，这些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显然是我们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没有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实现四化只是一句空话。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却不能直接引起我们事业的发展，它们只是为我们事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和有利的条件而已。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要靠奋斗（包括与阶级敌人斗，向自然界开战，与妨碍我们事业的思想行为作斗争等），靠我们努力工

作，等等，如果不努力奋斗，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取得新的胜利。团结、统一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表现其对事物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不通过斗争就不能起到这种作用。而且团结、统一等等是斗争的结果，同时，团结、统一中还包含着斗争，没有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这种团结和统一。这就证明那种以上述那些例子来说明同一性对事物发展起根本决定作用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还有一种所谓“轮流决定论”的看法，认为斗争性并不是在所有的事物发展中或者在事物发展过程的所有阶段中都是起根本决定作用的，只有在对抗性和敌我矛盾中才能起决定作用，在非对抗性和人民内部矛盾中，就不能起这种作用，而且只能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不能在量变阶段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如上所述，事物发展就是矛盾的解决，而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斗争，这是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不管在对抗性和敌我矛盾中，还是在非对抗性和人民内部矛盾中其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矛盾新旧方面或新旧因素的力量发生消长和对比发生变化，以至最后使新的方面或新的因素克服旧的方面或旧的因素，从而使矛盾得到根本的解决，使旧事物为新事物所代替。不通过斗争，矛盾就不能解决，事物就不能运动和发展。当然，由于矛盾性质和条件的不同，斗争的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不过这只是斗争的形式差异问题，而不是斗争有无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但有人认为只有对抗性矛盾才通过斗争去解决，而非对抗性和人民内部矛盾就不一定了，这类矛盾可以通过“结合”“调和”去解决。比如领导与群众，民主与集中，个人与集体，红与专等一类矛盾，不能通过一方消灭另一方去解决，而只能通过“结合”“调和”矛盾双方去解决。这种看法也是不妥当的。当然，我们应当承认，这类矛盾的解决方式，与必须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对抗性和敌我矛盾相比，有其特殊性，这类矛盾的确不需要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方法去解决。但这不等于说解决这类矛盾不需要通过斗争，只需要单纯使双方“结合”、“调和”就可以解决。其实，“结合”、“调和”只是表面形式，其实质则包含着斗争，而且“结合”、“调和”本身也是斗争的结果。同时，“结合”、“调和”只能暂时调整矛盾，而不能根本解决矛盾。以民主与集中的两个对立面来说，它们之间必须建立适当的关系，才能使每一方成为积极的因素。但是这种适当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呢？单纯靠“结合”和“调和”吗？显然不是。最根本的是要依靠斗争。只有通过斗争，克服民主脱离集中的倾向（如无政府主义等）或者集中脱离民主的倾向（如个人专断，官僚主义等等），才能使双方适当地结合起来。而且“结合”的内容和形式并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动的，“结合”也不是完满无缺的，结合中会经常包含和产生着一些妨碍“结合”的消极因素。因此，必须通过斗争不断克服这些妨碍和破坏结合的因素，随着条件的变化，不断把结合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变更，使这结合提高到一个新的状态和水平。解决民主与集中必须通过斗争，而解决其他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领导与群众，集体与个人，红与专，等等，也必须通过斗争。只有依靠斗争，才能不断克服双方经常产生的互相脱离的消极倾向，在新的水平和状态上实现新的统一或适当的“结合”，从而不断解

决双方的矛盾。可见，不仅在解决对抗性和敌我矛盾主要依靠斗争，而且解决非对抗性和人民内部矛盾时，也是根本依靠斗争的。

至于认为矛盾发展的质变阶段斗争性起决定作用，量变阶段斗争性不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所以不妥，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管是量变还是质变，都是矛盾双方力量消长的表现，都是由双方斗争所引起的。只不过是在量变阶段由于矛盾同一性或统一体呈相对稳定状态，限制住斗争性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使其被掩盖而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不太突出，而同一性却显得比较明显和突出，而在质变阶段，由于同一性或统一体正处于破裂状态，减少了对斗争性的限制，因而使斗争性暴露和表现得比较明显和比较激烈而已。两个阶段同一性的变化情况虽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由斗争性所推动的。因此不能以量变阶段，斗争性表现显著程度和质变阶段不同，而否认斗争性在量变阶段根本的决定作用。

※ ※ ※ ※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实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一个整体或系统。它是由事物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两个要素相结合而成的。动力问题，从总体上看，两要素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即两者相结合才能构成动力。而从它们在事物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两要素又有区别，斗争性是根本的决定的要素，同一性则是非根本的辅助性的要素。我们只有这样去观察它，既承认两要素之间的联系，又承认它们之间的区别，才是全面的正确的。如果只承认两要素之间的联系，而否认两者之间的区别，象“并列论”的观点那样，或者只承认两者的区别，而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象“单因素动力论”的观点那样，那都不是全面的和正确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P712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P372

③ 《自然辩证法》P48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49





为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出现新的技术革命

钟 坚

近几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的时代面临着这样一股来势迅猛的浪潮：一场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以电子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海洋工程和信息科学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这场蓬勃兴起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人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现阶段，还会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呢？本文就此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总是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也同样如此。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和规律，指出生产力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有多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和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律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起着促进作用。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新兴学科不断取得成就，人类知识的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据统计，人类的科学知识在十九世纪每五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纪每十年增加一倍，七十年代每五年增加一倍。目前，专家们估计每三年增加一倍。最近二十年出现的科学技术成果，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总和。现在全世界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约400—500万篇，登记专利35万种，出版科技期刊50,000种。知识的量在爆炸，知识的质

在深化。人类已经掌握了核聚变原理，已经能够应用量子化学的知识，已经认识到遗传物质的秘密。人们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获得的知识愈丰富，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就愈深化，用来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物质手段的种类和数量就愈多，效率就愈高；由于生产规模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积累的可能性就愈大。这就使生产和技术有着加速发展的趋势。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调整，还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这种调整是有限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关系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相适应的一面，又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相矛盾的一面。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不适应占主导地位，但仍然有相适应的一面。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就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对生产关系作一些局部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调整，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夺取高额利润的竞争，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

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必然引起生产发展和停滞两种趋势，但

帝国主义生产和技术的停滞趋势并不排除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垄断使竞争日益加剧，竞争的加剧，又会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垄断组织和非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竞争，迫使垄断资本不得不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以便保持垄断地位和获得高额利润。

进入七十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更加激烈，不断爆发了“利率战”、“关税战”、“汽车战”、“酿酒战”等等。二十多年前，美国汽车独霸世界市场。但日本从1967年引进机器人等技术后，到1980年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省油、价廉的日本汽车象潮水般涌向世界，令美国大为震惊。不久前，美国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大批日本汽车、电视机涌入美国市场，标题是“珍珠港事件又来了！”为此，美国汽车工业大声疾呼要采用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工业化条令，把机器人的投资增加了二十倍。

四、国家对科研领域的干预为技术革命提供了重要条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参与，把增加科研投资作为一项重大的决策。它们或者由国家出面建立各种科研机构，或者由国家支持私人垄断组织进行研究。

现在国际上“高技术”的发展，几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出现了一个高技术密集的工业区。如，美国把电脑工业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那里被称为“电子学革命的中心地带”，在全世界半导体产品销售额中，硅谷占了五分之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雄厚的技术力量对硅谷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也在苏格兰地区建立了英国的“硅谷”，集中了二百七十家电子工业公司。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各国科研投资不断增加，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1985年科研经费预算为490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14%。日本确立“技术立国”的方针，在1983年3月截止的1982年财政年度中，科技研究方面的支出共计283亿美元，仅次于美、苏而居世界第三位。

五、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技队伍的壮大是新技术革命产生不可缺少的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人员这一基本因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1982年，美国每万人口中有科技人员114

人，日本有369.9人。在专业人才方面，美国现有各种软件人员120万人，硬件人员30万人；日本现有软件人员90万人，硬件人员20万人。科技人员的增加是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增加了教育经费，发展教育事业。1979年，美国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522亿美元，日本为583.4亿美元。它们还注意把教育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美国硅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附近有两所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大学培养的人才和科研成果与企业的技术力量和生产相结合，很快应用于生产，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

六、能源危机是诱发和导致新技术革命的因素之一。

能源问题是最可能引起革命性变化的领域。前两次产业革命都直接同能源革命相联系。从七十年代初期起，西方世界就处于能源危机即“石油危机”之中。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构成中，石油平均高达50%以上。对国外进口能源的依赖，日本为86%，法国为76%，联邦德国为57%，美国为22%。石油危机冲击着西方工业化社会，特别是日本。日本不得不以大量投资、花大力气搞省能工艺，他们把这次新技术革命称为“去油污的改革”。节能成了日本改造老设备的动力，进而影响到整个工业的改造。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日本石油消费降低了17%，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汽车、电视机等以节能而畅销全球。在新的技术革命中，日本把新能源开发放在首位，而把研制新材料和向空间、海洋进军列为第二位。

此外，新技术革命的产生，还跟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运用种种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战争和军事竞赛的刺激有关系。

综上所述，当前世界科技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科研和生产为少数垄断资本家所控制，他们发展科学技术只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这种情况，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也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科技和生产的发展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和不稳定的，它改变不了帝国主义腐朽停滞的趋势。但对新技术革命的信息我们应该注意到，想一想应从中借鉴些什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控制论与社会科学的联姻

圭 人

前几年，学术界就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形成了所谓的“板块论”、“渗透论”、“胶体论”。意见难以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各家所用的均是经典辩证方法，都未能抓到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特别是这些意见不能清晰地告诉我们应当怎么行动。于是有人企求从控制论那里得到帮助。结果如顿开茅塞，争论不休的复杂问题顿然明朗化。从控制论来看，计划管理体制问题是一个经济控制论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控制系统，首先明确被控系统是什么，施控系统是什么。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计划→市场。计划是施控系统，市场是被控系统。控制论告诉我们，施控系统的设计及控制方式必须与被控制系统的结构、运行规律与控制目标相适应。不言自明，汽车与轮船的方向控制的施控装置与施控方式是不同的。原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在于以行政手段为基本传动渠道的指令性计划施控装置与商品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规律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改革的趋势就是从商品经济出发，按商品经济的结构、运行规律和控制目标的要求，改造计划控制装置及施控方式。O·兰格曾经谈到：“学会了用控制论语言来思想的人，不用详细分析具体问题也能解决问题，理解事情的基本环节元素之间的关系和实际，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用控制论语言进行思想的能力，丰富了经济研究和实际经济管理所必需的直觉。”《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的作者曾谈到这样一件事。十多年前，他们向一位化学界老教授谈起控制论。那位老教授认为一切被称为方法论的东西无非是事后诸葛亮，对科研无济于事。当时，老教授正在探索的确良合成的新工艺，实验多次失败而找不到原因。作者了解了他的试验经过后，发现老教授虽然在化学上有丰富的知识，然而有一些在搞控制论的人看来极为简单的原则却被忽视了。例如，为了控制，必须获得化

学反应过程的足够信息，并使信息系统构成一个负反馈体系。试验失败的关键是未能获取足够的信息，因而无法形成有效地控制。作者向老教授提出了改进意见，结果不到一个星期，试验成功了。老教授也由怀疑控制论转而对控制论产生浓厚兴趣。

控制论是一门研究由各种相关元素组成的系统的调节和控制的一般结构和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系统是由依因果关系链条（这种关系称耦合）连结在一起的因素的集合。因此，控制论也可以说是关于耦合运行系统的功能的科学。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在事物的联系中，相应地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例如，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的上升引起该类商品供给量的增加。这里，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前因后果。从控制论看，则把这种关系看作是控制与被控制的耦合关系。

控制论思想包含着下述重要的观点或原理：控制论要求如实地把它的对象看作是一个由多因素组合的有机系统，系统地而不是分割地从整体把握对象；任何一个现实的系统都是动态系统，其发展、变化存在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必然性，因此，就产生系统发展变化可能性的选择问题；为了使系统向着选定的目标变化，就需要给系统输入一定的信息，影响或调节系统的运行过程，因此，一个控制系统必然包含着最基本的两个子系统的关系——施控系统和被控系统的关系；控制是一种过程的连续行为，为了有效地控制被控系统沿着选定的目标运行，必须不断地从运动着的系统中提取反映系统运动状态的信息，并与目标值加以比较，形成控制信息，这就要求建立信息的反馈通道。所以，系统、目的、调节或控制、信息、反馈、施控系统与被控系统都是控制论的基本的重要的概念。控制论揭示了各种系统内部因果关系的结构、方式、系统的功能和

运动机制以及控制过程的一般规律。

在控制系统中，一般需解决五种基本类型的控制：一、系统的稳定控制。例如电视机需要在恒定电压下，才能有良好的工作。但在不同时刻电压是不一样的，为了得到恒定的工作电压，可以在电源输入端装上一个自动稳压器。二、系统的程序控制。如通过遗传信息实现的生物发育生长的控制。三、系统的跟踪（随动）控制，当被控量是一个不断变化而又无法预先给定的情况下，产生跟踪控制的任务。例如雷达天线跟踪飞机作不可预测的运动；在需求量变化不可预测情况下产品生产的控制。四、系统的最优化控制。例如经济中的以最优资源分布和利用达到最佳经济效果。五、系统内部的协调控制。许多系统都是由众多因素依一定法则和比例结合起来的，必须经常保持它们的协调。例如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的协调平衡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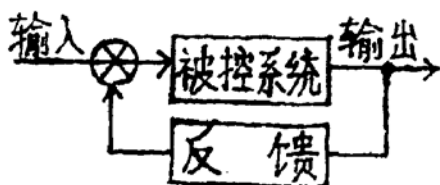
人类的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科学实验都是一种控制行为。但是，作为专门研究控制一般规律的科学，控制论只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论的诞生是以控制论创始人N·维纳的《控制论》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的。控制论的产生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九四二年以前是酝酿阶段，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是形成阶段，一九四八年以后是发展阶段。控制论形成后，沿着三个方向发展。一、向人类知识的最高层次哲学渗透，形成理论控制论或哲学控制论。控制论并不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冲突，相反，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现和发展。它是介于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的一般方法论，它为唯物辩证法在现代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一般的方法论模型。二、作为科学方法论自身的发展，它经历了经典控制论、现代控制论、大系统理论三个阶段。三、控制论向各门具体学科（如工程学、生物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语言学、自动控制工程学、史学、文学等）的渗透。控制论最初产生于通讯、神经生理学、动物学。但它一形成就马上显示其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属性，并向各门学科大规模渗透。这个过程，体现了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发展的辩证性质。

控制论诞生不久，很快就展示出它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的价值和广阔前景。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本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规律，以及

社会组织、管理工程的一般原则和规律的科学。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社会过程进行自觉而科学控制的要求的发展，越来越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从粗放的研究到精密的研究、从本质的抽象把握到系统的结构把握，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这样，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方法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经典辩证法水平上，而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吸收、融合当代科学方法论的成果，从而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现代的方法论武器。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引进控制论；而控制论的横向发展又必然使它涉足于社会科学。因此，控制论诞生不久，欧洲的一些学者就在控制论与社会科学之间“穿针引线”了。很快，就产生了一系列控制论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如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教育控制论、管理系统工程等等。为了推进控制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一九七五年，在罗马尼亚召开了第三届国际控制论和系统论会议，主题是经济控制论，会上优先探讨了整个经济管理的模式，在经济控制论方面，波兰的O·兰格、罗马尼亚前总理曼内斯库等，都曾作出杰出贡献。一九七八年，在瑞典阿姆斯特顿召开了第四届国际控制论和系统论会议，主题是社会控制论，中心是探讨对人类各种系统的管理。七十年代末，控制论开始被介绍给我国社会科学界，钱学森、王慧炯、金观涛、杨小凯等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作为控制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的富有启发性的新作，当推金观涛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杨小凯的《经济控制论初步》等。可以预料，随着当前我国正在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改革的深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控制论将会在我国社会科学和社会管理工程中获得广泛发展。

为什么从自然科学技术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控制论之树，可以移植到社会科学的园地上呢？这就需要讨论同构性原理。所谓同构，就是不同的物质可以在存在形态或运动形态上存在着结构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例如，弹性力学上的振动、流体力学上的流体动态、声学上的声学方程、电学上的电报方程，都可以用数学上的同一个方程——双曲型偏微分方程来描述。当我们撇开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物质形态，从系统的结构上分析问题，就发现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在耦合结

构及其运转方式上存在同构性或相似性。例如导弹是依据反馈原理进行跟踪控制而击中目标的。教学上，教师在课堂上提问、测验，及时从学生中提取教学效果的信息，调整教学过程。这两个系统都运用了反馈原理，在系统结构上是同构的，可以用下面的方框图表示：



同构或相似原理，在人类认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总是运用已知的知识认识未知的现象。但人们不是简单的运用已知的知识，而是把从许多现象的知识中，抽象出一般的东西，共同的东西，形成某种称为方法论的知识逻辑模型，然后用这个知识逻辑模型去认识新的事物。可以说：相似或同构原理是人类不断从已知到未知的认识的“桥梁”。

所以，科学的方法论，虽然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是它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相反，它只是对客观事物内部结构、相互关系以及运动规律的普遍的逻辑抽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控制论本身是仿生技术的产物，它发现了耦合运行系统的相似或同构的普遍性原理。这就使控制论在一切耦合关系领域得以凯运行进。

当然，控制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较之在自然科学技术上的应用，具有自己明显的特殊性。这不仅因为，社会系统所包括的因素较难

定量，较难预测，而且，更本质的特点在于社会系统中活动着的是一个具有千差万别目的性的有意识的人。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受着政治、经济、道德、精神等方面利益的支配和影响。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培育出来的控制论之树，它结出的种子撒落在社会科学的土壤上时，在资本主义难以生根发芽，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却得以开花结果，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在利益尖锐对抗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是难以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除了利益的对抗性，这就为社会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决定性条件。

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应用控制论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运用控制论的思想方法（即哲学意义上的控制论）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在我们的研究着重于把握社会各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过程方面时，这种方法具有特别明显的效果。而且，它并不需要太多特殊的专门知识（如数学等）。二是控制论的技术工程方法。这种方法，在我们对社会各个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分析，建立调节或控制过程的数学模型时，特别有用。不过，这个方面的应用，需要有相应的数学准备。有些同志一听到控制论，就以为必定是十分高深的理论，畏而却步。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全面。作为控制论思想，它如辩证法一样复杂，又象辩证法一样简单。对控制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玩味一下印度哲学家辩喜的一句话：“最伟大的东西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它和你自己存在一样简单。”

浅谈“黑箱”方法

泽 良

（一）

黑箱，一只密闭而不透明的箱子，好象魔术师的道具一样，神秘莫测。

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从事各种科学研究的时候，也经常碰到“黑箱”。人们所要认识、研究或控制的客体，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其内部的

结构一时还不能够或不允许被人们直接观测或把握到，这种客体就仿佛是一个既不透明且又密闭的黑色箱子，其复杂的结构和神妙的机理，珍藏其中，人们既无法打开它，也无法从外部直接探察其内部的结构和奥秘。因此，所谓“黑箱”，是指具有某种功能，但其内部结构无法直接观

测，只能从外部间接认识的系统。即某一客体，其内部构造和机理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外部观测和试验，去认识其功能和特性。事实上，许多客观事物，当人们还不可能或不允许深入解剖其内部细节，还不清楚其内部结构时，都可以看作“黑箱”。“黑箱”概念的存在是极其广泛的。因此艾什比在《控制论导论》中认为：“所有的事物，实际上都是黑箱。并且，我们从孩提时代起直到老态龙钟，一辈子都在跟黑箱打交道。”

“黑箱”的概念又是相对的。一方面，同一研究对象，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由于其经验、知识结构和认识目的的不同，可能是“黑箱”，也可能是“灰箱”或者“白箱”；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许多原来是“黑箱”的事物，逐渐转化为“灰箱”乃至“白箱”。

控制论的开拓者N·维纳和R·W·艾什比最早引入“黑箱”概念，来形象地表示这类研究客体。他们选用黑箱理论，研究人脑神经细胞系统的功能和行为，获得成功。后来又发展为控制论的基本方法之一。

(二)

“黑箱”概念的重要性和普遍意义，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探索、研究客观事物规律的科学方法——黑箱方法。

所谓黑箱方法，就是不打开“黑箱”，通过外部观测、分析“黑箱”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及其动态过程，用以研究“黑箱”的功能与特性，探索其构造和机理的科学方法。

使用黑箱方法来研究客体，一般分确立“黑箱”、考察“黑箱”和阐明“黑箱”等三个步骤。

确立“黑箱”。如上所述，“黑箱”的概念是相对的，这就有一个根据不同的认识主体而确立“黑箱”的问题。如作为生产工具的某机器，对于设计该机器的技师来说，是“白箱”。而对于一般生产者来说，却是“黑箱”。他只知道一定的输入值所引起的一定的输出值的关系，即只知道他所使用的机械系统、电器系统的传递函数。再如人脑具有学习、记忆和思维等功能，但实现这些功能的生理、生化及形态学的内部机制，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清楚。所以人脑对人本身来说还是一个“黑箱”。要研究人脑，就得采用黑箱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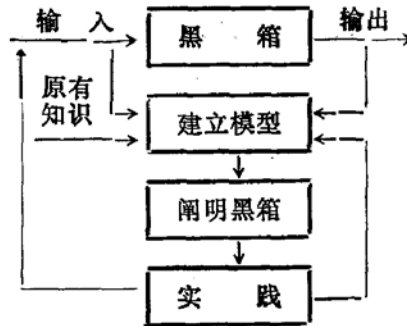
考察“黑箱”。确立“黑箱”的目的在于考察

“黑箱”。因为“黑箱”既不能打开，也不能直接观测，所以考察“黑箱”，就是考察对象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及其动态过程。一般采用方框图来作定性的描述：



所谓输入，是黑箱系统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认识主体人为地对系统的作用。输出则是黑箱系统对输入的反应和作用。通过输入和输出的对应关系和反应式，获得黑箱系统的功能特性和内部结构的大量信息，作为认识“黑箱”的根据。例如，研究人脑，采用黑箱方法，一般通过输入图象或声、光信号，然后从外部观测和分析脑电波的输出反应，从而研究人脑对视觉或听觉的信息传递、交换和处理的功能，得知人脑内部系统的结构细节。

阐明“黑箱”。如图所示，通过考察“黑箱”所掌握的数据和信息，以及原有对黑箱系统的认识，建立有关模型。并据此对黑箱系统的功能特性进行定性、定量和静态、动态的分析和评价，对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机理作出推测和假说。然后通过实践，检验其模型和认识的似真度。如此反复，就是人们认识“黑箱”的过程，即是使“黑箱”变成“灰箱”乃至“白箱”的过程。



在阐明“黑箱”过程中，还经常采用各种数学模型。如传递函数：

$$Y(s) = K(s)X(s)$$

和各种状态方程（包括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用以定量地描述“黑箱”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表示“黑箱”对信息的传递、变换和处理的功能。这种方法和理论在系统科学中已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系统辨识。

(三)

黑箱方法作为人类探索未知、认识新事物的

一种科学方法，已广泛的应用于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经济等不同领域。尤其是在以下几类系统中，运用黑箱方法特别重要，且效果显著。

其一，特大系统，即其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的系统。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在许多领域形成了一些特大系统，这些系统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因素众多，功能综合，人们很难用常规方法详细剖析系统的细微结构和发展状况，而应用黑箱方法，从其输入输出的相互关系及整体功能方面进行研究，则是一种现实的途径。例如，我国的人口系统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特大系统。人们在测算我国人口发展时，将其视为一个大“黑箱”，运用控制论和黑箱方法，抓住影响人口发展的主要因素，建立了我国人口发展的动态数学模型，对我国未来一百年内人口的发展作了多种测算，取得一定成果。

其二，不允许用现有手段打开的系统。这类系统，如果人们用现有手段打开它，就会严重干扰系统本身的功能和结构关系，从而变成不是原来所要研究的另一类系统。如人脑就是这类系统。只有当人脑还活着，而且还在工作的时候，才能表现出它的功能来。如果我们用现有的解剖手段，用手术刀一旦将人脑打开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只死脑，而死了的脑子就失去了一切功能，失去功能的脑子也就失去了机制。所以只有采用黑箱方法，通过观测人脑对输入信息的输出反应来研究人脑的功能和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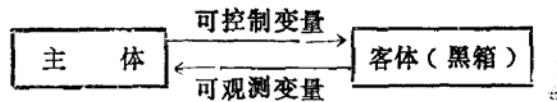
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控制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功能模拟方法，其理论基础就是黑箱理论。它暂时撇开被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而只从功能上模拟系统对环境影响的反应方式。作为控制论最高成就的人工智能，就是把人脑看成“黑箱”，不考虑其内部结构，运用电脑来模拟人脑的某些思维功能。

其三，用现有手段尚不能够直接打开的系统。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人们对有些研究客体，尚无法直接打开它，如在研究物质结构中，人们所面对的微观世界，就是这类典型的系统。在原子物理学中，著名的卢瑟福“散射实验”，实质上就是黑箱方法在微观世界研究中的应用。1911年，卢瑟福面对原子这一“黑箱”，用 α 射线轰击（输入）金属箔，观测粒子散射（输出）的特性，提出了原子结构的新模型。后来，人们面对基本粒子这一“黑箱”，又设计了类似的强子深度

的散射实验，通过分析、推理，提出了各种基本粒子的模型，用以探索所谓“夸克禁闭”的奥秘。

可见黑箱方法的应用十分广泛。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生命系统到有生命系统，从工程技术到社会领域，黑箱方法都得到了成功的应用。

（四）



黑箱方法的实质，反映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基本过程和途径。控制论把人们认识的对象看作“黑箱”。认识对象的“黑箱”属性，就是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因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认识活动，从根本上说都可以表示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反馈耦合，都可以用可控制变量和可观测变量来加以描述。对于一个客体，当认识的主体用一组可控制变量和可观测变量来描述时，这个客体系统就是一个“黑箱”。相应地，可控制变量即是输入值，可观测变量就是输出值。认识主体就是通过对“黑箱”的输入输出变量来认识“黑箱”，改造“黑箱”，从而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一个“黑箱”打开了，变成了“白箱”，又有新的“黑箱”出现，客观事物的“黑箱”总是一层套一层，永远不会完结，而人的认识能力也愈来愈高，永远没有止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如何用力智胜过自然界这一特大“黑箱”的过程。

可见“黑箱”概念不仅是对现实存在的某些事物的生动形象的比喻，而且具有其深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它当然也可以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往往都是些因素众多、结构复杂的特大系统，这些系统常常具有“黑箱”的性质，所以我们如果运用黑箱方法来加以研究，会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事实上，我们采用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建立某种理论体系，来分析某些社会现象、总结某些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已部分地运用了黑箱方法。因为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所谓理论，可以说是对输入和输出关系的解释，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也就是“黑箱”逐渐变成“白箱”的过程。

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

陈 胜 莽

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他坚持顺应历史潮流，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积极倡导对外开放。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本文的意向，拟在于探讨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一、“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

倡导“对外开放”、发展国际交往的开放主义，与主张闭关锁国、坚持闭目塞听的闭关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主张。孙中山在提出和坚持其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过程中，反复强调必须“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孙中山全集》卷2，页448。以下凡引此书只写《全集》卷、页数。）并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的闭关主义作了彻底的否定和尖锐的批判。

其一、闭关主义违背世界历史前进潮流。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正如孙中山指出：“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孙中山选集》精装本，页75。以下凡引此书只写《选集》页数。）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页255）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奔走于全球各地的西方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开拓市场，发财致富的历史事实，使孙中山早就强烈感受到“泰西各国体恤商情”，顺应潮流实行开放，对“外出经商”之民多加保护，致使“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选集》页7）然而，“游贾于四方”的乡人，投资于“南洋美洲之华商”，其际遇艰辛，呼喊无门的严峻现实，又使孙中山痛感清政府顽固推行闭关政策，“不能保商，而反剥损抑遏之”，不仅离乡背井之华商“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且因“过省有关，越境有卡，……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致使货物不流，财源不聚，“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选集》页7—8）因此，孙中山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对这种违反潮流的闭关主义给予否定，呼吁仿泰西之法，行保商之政。兴中会成立后，他更积极探索“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揖睦邻国，通商惠工”的

“良策”（《全集》卷1，页47）1904年在《向美国人民呼吁书》中，对所谓“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论调作了澄清，指出“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选集》页63—64）1912年，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更庄严宣告“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选集》页91）在他看来，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必须“以工商实业为竞点”。（《全集》卷1，页547）为此，他强调“使人民研究各种实业科学，尤为新共和国之行政入手方法”；（《全集》卷1，页561）因为发展实业乃时代潮流，“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全集》卷2，页492）“吾人正宜顺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若“犹持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事不合”。（《全集》卷2，页499）孙中山以借债筑路为例，指出“如不恃开放主义，则吾国人必无此财力，虽有政策，亦徒托空言”。正因此，他断言：现今世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全集》卷2，页530）欲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非改变从前之闭关主义不可”。（《全集》卷2，页448）

其二，闭关锁国是误国误民的国策。

闭关还是开放，是关系到如何治理和建设国家的重大国策问题。清朝推行的闭关政策，早已被中国开明进步的思想家斥为“受害不受益”的误国之策。孙中山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剖析。

孙中山指出，清朝虽“以闭关为事”，但并不能阻挡西方列强掠夺我国领土主权、强迫清朝开放通商口岸。例如：“上海租界及青岛，我无主权，是皆外人强我开放”，（《全集》卷2，页499）清廷无力阻挡的结果。经济上也一样，“从前我国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办，又不准外人来办”，但在侵略者的胁迫下，“又无力拒绝，终久仍归外人之手，如满洲之铁路，全归日俄之手，即此例也”。（《全集》卷2，页449）孙中山还指出：闭关政策造成“内外隔绝”，上下均不知外情，以致“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选集》页14）他揭露闭关政策“堵塞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使“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选集》页17—18）更有甚者，不仅“人民无知，……而且官僚自己也是绝对无知的”，八股仕进之徒，也“完全没有世界情况的知识，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国家的需要和希望。”（《全集》卷1，页103）似此封闭状态，不能不造成中华民族越来越孤立于世，落后于人，处处被动，一再挨打。正因此，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对外宣言书》中，就更集中地抨击清朝“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自闭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塞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全集》卷2，页9—10）

其三，闭关自守思想是愚昧落后的思想。

闭关还是开放，不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闭关自守思想是落后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障碍。

孙中山历来重视清除这种愚昧落后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辛亥革命前，他与留日学生“商定救国之方针”时，就十分强调要清除这种思想。他针对中国近代落伍的教训，对那些固守“中国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而反对改革的排外自大思想，以及借口中国要有“独立的学说”而拒绝“取法于人”的闭关论调，一一作了剖析和批判，论证要使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爱国志士必须首先树立“定要取法于人的思想改革”。民国建立后，他又一再强调：“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全集》卷2，页494）“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全集》卷2，页481）他在《孙文学说》中，集中地批判了那种“荒岛孤人”思想。他说：“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荒岛孤人思想是典型的闭关自守思想。其对中国富强危害之大，在于这种思想是一种极端愚昧守旧的落后思想。孙中山认为，只有彻底否定这种愚昧落后的闭关自守思想，实行开放主义，才能“致中国于富强之境”。（《选集》页187—188）

二、振兴中华，坚持原则，积极引进

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推行的闭关政策再也不能完全照样维持下去了；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们对闭关主义的批判也进一步开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开放主张。一种是屈从列强的压力，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主义开放；一种是谋求独立富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主义开放。孙中山在公开表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的同时，（《全集》卷1，页86）一面批判卖国主义的开放政策，一面阐发其爱国主义的开放主张。

其一，开放目的。

孙中山提倡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步武泰西，参行新法”的设想时，就渴望中国能在二十年内“驾欧洲而上之”。他组织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则被直截了当地称为“专为振兴中华”的兴中会。他在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时，更鲜明地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是要使中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把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为“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同上，页278—279）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到各地大力宣传他的开放主张时，又一再强调其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最强之国”，使中国人民“永远享真正自由文明幸福”。（《全集》卷2，页422、534）在《实业计划》中，他又指出，“利用外国资本及专门家发达工业以图全国民之福利”，帮助中国平民改变其“悲惨境遇”。（《选集》页348、369）在革命低潮时期，孙中山仍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继续强调要“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国父全集》，台北版，第五集，页168）以“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孙中山年谱》页170）把“曾感受世界

最进化之潮流”的中国，重建为“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国父全集》第六集，页284）晚年，他强调“以俄为师”，其目的还是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之中国”。（《选集》页995—996）以上事实表明，在孙中山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生涯中，尽管其提倡开放的具体内容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然而，其力图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崇高目的却是一而贯之的。

为了坚持这种爱国主义的开放目的，孙中山既无情地揭露西方列强强迫开放中国门户的侵略和掠夺实质，又深刻地揭露清政府和军阀屈从列强开放门户的卖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他痛斥清朝帝、后，“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等“日日媚外人”的罪恶行径；（《全集》卷1，页234）他痛斥军阀为了“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不惜拿国家利权换取外债的卑鄙行为；（《选集》页587）他还痛斥这些不平等条约，名为“通商条约”，实际上是出卖我们的“卖身契”；这种开放，甚至“把海关拨归外国人管理”，实际上是出卖我国“保护各种实业的门户”。（同上，页929、908）由此可见，西方列强旨在侵华的开放，清政府和军阀屈媚列强的开放，与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倡导的对外开放，出发点和归宿都根本不同，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其二，开放原则。

一、平等互利，维护主权。孙中山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和物质文明以革新中国，“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因为中国的新生“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既正视中外互助互利以发展经济的前景，又坚持以中国的新生和发展为前提，这就是孙中山制订平等互利、维护主权这一开放原则的依据。孙中山一再强调“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全集》卷2，页530）民国成立前夕，他就以埃及借债因“失主权”而亡国、美国借债因“不失主权”而兴盛为训，为“新政府借外债”提出了三条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全集》卷1，页568）同时，提出“新政府与各国通商”，应当坚持平等互利，“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同上，页561）民国建立初期，他本着“但能兴利，又无伤主权，借债自不妨事”的原则，大力提倡利用外资，发展实业。1921年，他谈到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计划时，还把能否维护主权提到事业存亡的高度，指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选集》页212）故“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国父全集》第三集，页208）此后，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外人“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的主张，（《选集》页595）更加完整地确立了“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同上，页601）的爱国主义开放原则。

二、取法乎上，取其善果。孙中山看到，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中国作为“后至之人”，要想迎头赶上，“后来居上”，必须“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同上，页165—166）不但要取法于

人，而且要“取法乎上”，他说，改革如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救中国，要从高上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全集》卷1，页279）

孙中山把引进先进的制度视为救国救民的万年大计。1916年当他看到美国实行“最新之地方自治制度”取得成效后，就表示要“把此最好之民权制度介绍于国民”。（《国父全集》第三集，页142）1921年，他看到美国形成多民族国家，“才有今日光华灿烂”，就把美国作为实现其“民族主义的好榜样”；同时，他看到“全世界中行使直接民权是以瑞士为第一，瑞士民权的发达”，已驾乎英美法之上，又把瑞士作为实现其民权主义的“一个极好底榜样”。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说：“现在俄国就是我们的好榜样”，因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选集》页507）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先进的外国作为“好榜样”，要把外国的先进制度引进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要取法乎上，就是要“适应世界之潮流，采择最新之理想”，以“立民国万年有道之基”。（《国父全集》第六集，页165）

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他指出，“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选集》页761）因此在引进学习时，也须取法乎上。1912年，他在研究了美国发展交通的计划后就说：“这是新发明的最好的办法。我们中华民国若是取法乎上，自应如此办法。”（《全集》卷2，页528）在《实业计划》中，他又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必重蹈“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应吸取其经验教训，走“最直捷之途径”。晚年，他谈到日本当年修路“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时指出：今天我们应当“不学日本不便利的旧东西，要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选集》页869、787）

孙中山通过对西方社会的细心考察，既充分肯定西方的物质文明，又看到西方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端；既积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也看到其流弊和不足。因而强调：“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实行开放，引进欧美文明，就“须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同上，页84—85）早在1905年春，他访问第二国际总部时，就声明：中国将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某种弊端。”（M·伯纳尔：《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随后，《民报》发刊词根据“欧美虽强，其民实困”的现状，又把如何避免“欧美社会之祸”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民国成立后，他更大声疾呼：应吸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教训，实行社会革命，“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选集》页98）否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直到晚年，他总结了欧美“已往所生流弊的经验”，还反复说明，既“要使中国象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又要“不受英国、美国现在的毛病，……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选集》页786、895）

孙中山看到欧美社会弊端，既不因噎废食，又力图防患于未然，显示了他的对外开放原则，富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列宁选集》

卷2, 页426)

三、结合实际, 取长补短。孙中山在倡导开放过程中, 坚持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多次指出, 中国并非一切不如外国, 并非一向不如外国; 外国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 样样都合乎世界潮流和中国需要。有在“一二百年之前以为是好的, ……现在亦觉得不好”者; 有“众口一辞”认为是“世界最好的”, 实际上“流弊亦不少”者; 还有“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 在中国未必是适当”者。(《选集》页486、722) 因此他强调: “考求外国之政治者, 不可徒读外国之古书, 尤不可徒震于外国博士之名”。强调“一味的盲从附和, 对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选集》页764) 在《孙文学说》中, 他分析了中外的长短, 指出“以中国之地位, 中国之富源, 处今日之时会”, 若要使中国短期内赶上欧美, 必须“用人所长, 补我所短。”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 他研究了美国宪法后, 发现这部被称为世界最好的三权宪法, “实有不充分之处”, 即从中国历史上的监察、考试制度中吸取精华, 加以补充, 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五权宪法”。对此, 孙中山曾非常自豪地说, 这是他游历欧美, “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后, 加以补救的结果, “足以济欧美政治法律之穷”。(《国父全集》第六集, 页149) 由此可见, 孙中山坚持结合实际, 取长补短的对外开放原则, 和盲目排外的闭关主义及盲目崇外的民族虚无主义, 划清了界线, 鲜明地表现了他面对现实, 尊重现实的精神。

其三, 开放内容。

孙中山提倡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 就其内容而言, 所谓“开放”, 主要是引进。

一、政治方面, 主要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库中引进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为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服务。

孙中山早年就非常留心“欧美时局之变迁”, 仰慕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华盛顿。从组织兴中会起, 就把创立美国式的“合众政府”作为奋斗目标。随后, 他又表示, 要“尽可能把欧化的司法制度引进我国”, 促进中国司法制度的“彻底改革”, (《中国之司法改革》, 《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904年, 他向美国人民呼吁: “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全集》卷1, 页255) 1911年, 他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 即“采美利坚、法兰西之美政, 以定政治方针。”(《国父全集》第三集, 页129) 南京临时政府夭折后, 仍一再强调, 要“为国民争回真共和, ……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同上, 页161) 晚年, 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 还强调“现在的潮流, 已经到了民权时代”, 必须“把全世界各国民权的情形考察清楚”, 尽管欧美民权政治流弊甚多, 已“不能完全仿效”, 但是还要继续“借鉴于欧美”, 把他们的“经验和学理, 拿来参考”, 以免“再蹈欧美的覆辙”。(《选集》页700)

二、经济方面, 主要是辛亥革命后, 提倡引进外资、外才和先进技术, 发展实业, 振兴经济。

实业救国问题, 是孙中山毕生为中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漫长道路上, 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 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认识。辛亥革命前, 他反对脱离政治变革的

“实业救国论”。早在《上李鸿章书》中，他就指出单纯引进“坚船利炮”，是“舍本而图末”；此后，他又一再指出，若不推翻清朝，将欧洲“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也无助于“中国的新生”；民国建立后，他从“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出发，则大力提倡“实业救国之道”。他当时认为：“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全集》卷2，页84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他又提出一个“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的宏大计划，并强调这是物质建设之“大方针”，发展国家经济之“大政策”，“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选集》页101、212、191）但是，就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晚年，现实又迫使他承认：革命未成功，改造中国“从实业上改造起，也是没有希望的”。（同上，页474）

怎样才能发展中国实业？这是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经大声疾呼的重大问题。他痛感“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同上，96）欲采用西法，培养人才“等又等不及”；（《国父全集》第三集，页108）至于科学技术，基础更薄。为此，他强烈呼吁：“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即：“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在他看来，将外国费了二百年功夫达到的物质文明成果“采来就用”，这是很“便宜”的事。（《全集》卷2，页532—538）

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外才和技术，重点在利用外资。为了创造投资环境，开辟吸引外资的渠道，他在1912年就提出过如下几种引进外资的方式：

（一）“以私人资格，组织公司，而以公司营业性质，与外国资本家直接交涉借债。”（《全集》卷2，页463）

（二）“招股修路，按照华洋合办公司办理”（同上，页464）或“与外人合办”兵工厂，“准外人入股。”（同上，页449）

（三）准许外人独资承办实业。一种是由“外人办理工商事业，乃订立一定之期限，届期由我收赎。”一种是修建铁路，采取批给外人承办的办法：“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四十年后收归国有。”（同上，页464）

（四）孙中山还希望引进侨资，号召华侨投资实业。他看到广大华侨不仅“热心回国经营实业”，而且他们在海外“感受世界最新之潮流，又得练习最新之科学工业常识”，若能回国为宗邦效力，则有利于“祖国实业前途之发达”。（《国父全集》第五集，页344）所以，他曾号召南洋华侨“联合湘鄂”，投资粤汉铁路。

孙中山还十分重视引进管理经验，在谈到利用外资必须将发展之权操之于我时，就强调“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为了取得这类管理知识，他提出两条途径：一是引进有关管理知识的书籍，使操权者“熟读此书，……举一反三，……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二是聘请顾问，传授经验。即“由国家所雇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选集》页212、218）

三、文化思想方面的引进和吸收，比较突出的有：

（一）进化论。孙中山早年就研读了进化论一类新书。并以进化论为武器，为其坚持顺应世界进化之潮流，创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立论。

（二）天赋人权论。孙中山充分肯定卢梭在《民约论》中阐发的天赋人权学说，并以此为武器，为其宣传民权，批判君权，推翻帝制，创建民主共和国立论。

（三）单税论。孙中山“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乔治之单税论”，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页218）他赞扬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主张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全集》卷2，页514）并根据这种理论制定实施平均地权的办法。民国成立后，他还试图在武汉、广东实施这套办法。

（四）其他。孙中山广泛阅读并积极引进西方“学者研究所得之著作”，主张将“各国所出新书，以中文翻译，廉价出售，以应中国公众之需。”（《选集》页161）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孙中山不断注意观察和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及其日益严重的新情况，不断注意探索和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案，因而他对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新潮流、新学说，也很虚心地进行考察和研究。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孙中山尽管存在不少误解乃至偏见，但他毕竟是对此较早注意的人，且给以高度评价。他把马克思称为“社会党的圣人”，指出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千百家中，马克思是“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其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其所著《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形成系统的学说，使“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同上，页807、809、810—811）然而，孙中山并不赞成“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强调“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即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选集》页841—842）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这是孙中山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他叛离他所属的阶级。他对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引进，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在先进中国人从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发展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三、敢于面对现实、勇于走向世界

从近代史上考察，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爱国主义的开放主张，从1840年鸦片战争那时起，就成为中国近代爱国者、革命者的共同愿望，成为几代先进的爱国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首倡“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洪仁玕也曾渴望学习西方富强之道，“与番人并雄”；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亦倡学习外国，变法图强，“借助外资”，开发富源。孙中山更以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鲜明旗帜，倡导开放，学习西方，革新政治，振兴经济，“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把反对闭关、提倡开放的思想潮流不断推向前进。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接受历史动力的推动，提出较其前人和同时代人更为完整和先进的主张，与他自身的条件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其一，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孙中山所面对的西方，既是一个侵略成性、弊端百出的西方；又是一个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西方。孙中山高明之处，首先就在于敢于正视这种现实，就在于他有鉴别、有批判地从西方吸收有益的东西，为改变祖国贫弱地位，朝“驾乎欧美之上”的宏伟目标前进。

其二，勇于走向世界，善于吸取国际经验。孙中山生长在与西方“通商先于各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中学到大学，又在檀香山、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又长期奔走海外。这，使他对于西方世界具有比较广泛和具体的了解，对于世界潮流具有比较敏锐和深刻的见解。这就促使他有可能在国外学习、生活和斗争中，不断吸取世界知识，不断总结国际经验，形成他那要振兴中华，“非改变从前之闭关主义不可”的对外开放主张。这些思想主张的提出，不仅表明了孙中山的勇气，而且在当时无疑具有启迪人们解放思想的进步意义。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不无缺陷，且确有幻想，特别是由于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仍然缺乏科学的分析，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也缺乏正确的估计，因而他苦心设计的种种方案，就不能不处处碰壁。他那种图谋“利国福民”的开放主张，终究成了泡影。这是近代中国所有爱国者都逃脱不了的悲剧结局。诚如孙中山所叹，“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选集》页995）然而，在近代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那种“万事不求人”的自我孤立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上所有国家联结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发展国际间的交往，成为世界各国实现近代化的必经之路。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主张，只是在旧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不可能得到实现。然而，这些思想主张，只是象蒙上尘垢的珍珠，被暂时掩盖了它的光彩。尘垢一旦扫除，条件一旦具备，它就会闪耀出夺目的光辉。随着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建设祖国、振兴民族的步伐日益迈开，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将会愈益显示其历史的价值。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陈善光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工人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标志的中国工人运动新高潮，是“中国有历史以来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运动”。^①它的发生和发展，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和探讨这种关系，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它最崇高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解放全人类，从而使无产阶级最后地得到解放。所以，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天然关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在自己的纲领和决议中明确地提出了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主张，把独立地领导工人运动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并努力影响、推动和领导了1922年1月至1928年2月的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潮。但幼年时期的党，理论准备不足，缺乏革命经验，在斗争中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策略，它在自己的决议中规定：“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斥的态度”，“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②所以，尽管中国工人阶级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斗争，但斗争很快遭到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武力镇压。“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除了湖南、广东，“重要的产业工人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③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捕被杀，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也被通缉，“中国职工运动从此进入于消沉时期了。”^④

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单靠工人阶级单枪匹马地战斗是难以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因而开始逐步调整工人运动的政策。1923年6月，党召开“三大”，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新方针，并明确宣告：“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视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⑤这意味着：党将在争取实现国共合作中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并把联合国民党，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当作目前工农运动的主要内容。这种认识无疑是比过去大大推进了一步。

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过去是长期脱离人民群众、忽视工农作用的。但国民党在广东有政府，有地盘；又与南方各地军阀关系密切；而且它还影响着一部分工人。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国民党的革命历史，认为如能争取它接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改造整个组织，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那么发动工农开展新的斗争，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和便利条件。因此，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做国民党的工作。早在1921年12月，马林和张太雷就在广西桂林与孙中山先生进行过长谈，建议国民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⑥1924年4月，达林访问孙中山时，也向他“说明了国民党与工人群众联合的必要性。”^⑦同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中，公开肯定了国民党的革命倾向，同时坦率诚恳地批评了它的错误。当陈炯明发动叛变、国民党陷于分裂、孙中山避居上海后，李大钊、陈独秀更是直接给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以积极的影响和帮助。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畅谈不厌，几乎忘食”。^⑧中共“三大”后，陈独秀、毛泽东负责党中央的日常事务，进一步加紧了做国民党的工作。

实践也一再向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提出问题：为什么革命几十年老是失败？为什么自己寄予厚望的部属也要置自己于死地？“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⑨失败的惨痛教训，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使他们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自己的革命方法不对，革命中依靠错了力量。他们也终于懂得了：“国民革命之运动，必待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⑩他们认识到，要继续革命，就要改辕更辙，另求新力量，另走新道路。因此，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终于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直接参与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接受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⑪确定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孙中山决心领导“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决定“对于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⑫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设立工人部，由“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廖仲恺^⑬兼任该部部长。这样，工人运动便跟孙中山的国民党开始发生了联系。在重新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队伍、统一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中，国共两党也就采取了合作的行动。

在广东，1924年2月，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由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张善铭、刘尔崧、沈厚堃、郭瘦七人为委员，由刘、沈、郭三人任秘书，领导广东民众开展国民革命运动。^⑭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刘尔崧、周其鉴和施卜在广州，王寒烬、梁复然在佛山，阮啸仙在顺德努力从事组织工人队伍、整顿工会组织的工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在教育厅召集了工人党员大会，做工人骨干的工作。广州市六百多名工人党员有一百七十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廖仲恺主持，他向与会者详细解释了国民党政纲上关于工人方面的规定，工人部秘书、共产党人冯菊坡则就准备建立统一

的工人组织问题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准备公布的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⑮

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5月1日，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于广州西瓜园太平戏院隆重开幕。大会由国民党中央召集，孙中山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中国工人以苏俄等国工人为学习榜样，同心协力，一往无前地向帝国主义宣战。他指出：工人既有了团体，就要为抬高工人的地位，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使中国摆脱做外国奴隶的地位而战斗，就要勇敢地担负起“把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抬高国家地位的责任”。他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⑯孙中山的这些讲话，对工人群众起了很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会后，全市有十七万工人参加了示威游行。这次工代会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设办事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刘尔崧当执行委员会主席，杨殷当顾问，孙律西任秘书。按照大会的决议，广州工代会于8月20日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工团军，由施卜任团长。广州工代会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迅速发展，如周恩来所说：“国民党亦力助广州市工人代表会为广州工会联合运动，及今工人代表会实已包有一百余之强大工会。”^⑰会员达十五万多人，占了广州有组织的工人的四分之三。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结果，带来了各工人团体的团结和合作，这就为广东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兴起作了重要准备。

在上海，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先从教育入手，在杨树浦、吴淞、南市西门内、上海大学、虹口、浦东等地联合办起了工人夜校，以提高工人的知识程度和政治觉悟，训练工人运动的骨干。^⑱在汉口、湖南，在北方以至全国，1924年后，工人运动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二）

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得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从工人运动由低潮开始转向和发展到高潮的历史事实中，都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

中国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是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的新警律，于7月15日举行的政治大罢工。这是“为民族争人格、争自由的运动”。^⑲社会各界纷纷支持和援助。共产党帮助组织了“各界联合反抗沙面苛例大会”，派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刘尔崧、施卜、孙律西等人在其中工作。国民党和革命政府对运动给予支持，为罢工者捐献资金，派人慰劳与宣传。^⑳为此，外国人言论，“大有责备广东政府在暗中鼓动的意思。”^㉑在国共合作支持下，罢工工人坚持斗争，迫使帝国主义于8月17日取消了新警律。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政治大罢工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中国民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所以，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

中国工人运动由低潮发展到高潮的标志，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这次斗争，跟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样紧密相关。

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共两党在上海合办了许多工人夜校，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1924年5月中共三届三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以后，党关于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次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②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得到胜利。”^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且强调了在民族革命中，工人运动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要防止限制产业工人参加国民党的绝对化倾向。党有了正确的工人运动路线，又加强了独立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加上国共合作所提供的条件，上海的工人阶级的反帝罢工斗争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和打伤了十三名工人。5月30日，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对抗议的群众进行大屠杀和大逮捕，打死群众十三人，重伤十五人，捕去一百五十多人，造成“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共中央号召和领导下，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斗争，从上海开始，顿时席卷了全国各大中城市，北京、武汉、广州、天津、南京、九江、芜湖、重庆、郑州、开封、宁波、青岛，直至最偏僻的村镇，到处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全国近五百个城镇千百万人民卷进了这个反帝怒潮。

在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对帝国主义打击最沉重的是省港大罢工。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得到国民革命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工人阶级反帝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中共广东区委即召开党、团大会报告了惨案情况，决定成立临时委员会来领导广东人民开展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斗争的电令到达广州。6月2日，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代会等单位发起数千人集会，罗亦农出席演讲，会后进行反帝游行。省港两地人民并准备进行“三罢”斗争。但6月6日，刘、杨在广州发动叛乱，斗争暂停。6月8日，共产党员中夏、云鹏和共青团员周文雍、蓝裕业等人赴香港进行罢工斗争的发动工作。临时委员会决定：省港罢工，势在必行。并指定黄平、中夏、杨殷、兆征、鲍安五人组织党团为指挥机关。同时派出两名工人代表随中夏、黄平返省“与政府商洽”。^④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印刷工人首先开始罢工，打响了省港罢工的第一炮。

在广州，“当时广州革命政府，亦于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以断然的手段驱逐杨、刘，扑灭广东内部的反革命势力，进而以政府的力量援助香港工人之抗英的罢工运动。”^⑤早在6月14日，“国民党已由老鲍（鲍罗廷）提议，决定援助香港罢工。”所以，当香港工人代表回广州与廖仲恺等国民党领导人洽商时，“极其顺利，二代表满意离省，开会报告，群情欢腾。”

香港罢工一爆发，中共广东区委“当即指定菊坡、尔崧、施卜、李森、伟民、延年六人组织党团，以李森为书记”，接待香港工人和组织广州工人罢工的斗争。冯菊坡、

刘尔崧、施卜发动沙面洋务工人二千多人于6月20日早开始正式罢工。同时，党团决定全国总工会属下组织——公开的“临时省港罢工委员会”来领导罢工斗争。

6月23日，国共合作在广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运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带头参加。参加集会游行的群众达五万多人。他们在东较场集会，通过了收回海关、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决议，随后于下午一时半开始示威游行。但游行队伍在沙基西桥遭到了英、法、葡军枪弹炮火的同时袭击，当场打死打伤二百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更加激怒了省港工人阶级，香港罢工工人纷纷回到广州参加斗争。为了更加有效地领导省港罢工，国共两党作出了巨大努力。在中夏、黄平、兆征先后回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罢工斗争的党团随之进行了扩大。并在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迅速筹备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会于6月26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召开。出席大会并作报告的“多为民校（即国民党）中要人，余为吾党（即共产党）同志”。大会决定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经过充分讨论，7月3日，临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干事局改组，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们同心协力，带领省港工人把反帝斗争推向了新的高度。

斗争中，共产党“与民校（国民党）亲密合作”，使许多问题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如罢工经费问题，6月19日香港罢工工人返省，共产党即通过“全总”捐出二万元，国民党出一万五千元，并动员商会等捐二万余元作为旅费。随后，国民政府决定以房捐四十万元和向各县集资，用以支持罢工斗争。海外广大侨胞也给罢工以有力的援助，捐款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又如斗争策略问题，国共两党领导人经过反复开会协商，把由工人提出的“单独对英”的口号^②变成了大罢工的统一策略，斗争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改为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英帝国主义。并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全面地封锁了香港，把香港变成了“臭港”，有效地惩罚了英帝国主义。事实证明，省港大罢工能坚持十六个月之久，完全是依靠了国共合作的力量。邓中夏说：“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③

（三）

国共合作使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而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事业。整个大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那些被压迫被剥削而迫切要求翻身解放的人民。

早在国共合作之初，工人阶级就充当了镇压商团叛乱、保卫国民革命的先锋。广州工代会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面劝告政府放弃对商团采取“优柔政策”，一面加紧组织、训练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团军，以作后用。工代会联络了三十多个团体，把双十庆祝节改为警告节，于十月十日在第一公园召开万余人示威大会，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等人出席演讲。大会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发出了“暂作政府后盾”，坚决消灭商团的通

电。当孙中山在群众影响下决心镇压商团时，工团军积极参加作战，冲锋在前，十五日一天，数十人为此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925年，当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部三万多人从东征前线窜回广州，发动旨在颠覆革命政府的叛乱时，广州工人阶级再次挺身而出。工人团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面积极参加揭露叛军罪行的政治宣传，一面采取有力措施配合国民革命军回师广州平叛：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共同罢工，制止了杨、刘军事上的运输；电报工人罢工，阻止了叛军消息的传递；海员工人则拒绝给叛军输送徒手新兵；兵工厂工人也实行罢工，停止给叛军制造子弹；农民也给革命军以有力的支援。叛军陷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仅几天就被平定了。②

省港工人阶级大罢工，也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了突出的贡献。正如团广州地委的报告所说：“这次罢工运动不但是助成东、南两路的总决斗”，而且帮助“扑灭革命政府下的一切反革命势力，肃清内部以稳固后方。”③ 在国共合作东征南讨的斗争开始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即派出委员长苏兆征到汕头组织罢工工人，派出顾问黄学增和工人程赓到南路组织农民进行配合。罢工委员会组织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迅速开到前线，“督促军队，宣传人民。”工人纠察队严密地封锁了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沿海港口，割断了陈炯明、邓本殷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联系。这一着很有效，“假使没有这路罢工运动，以断绝帝国主义的援助，东、南两路的总决斗，一定没有这么快的成功。”④

在北伐斗争中，工人阶级也成了重要的方面军。北伐前夕，工会组织已发展到六百九十多个，有一百二十四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这是北伐战争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北伐开始后，省港工人组织了三千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征。粤汉铁路工人组织铁路破坏队，拆毁铁路、炸毁铁桥，瘫痪了敌人的军事运输。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拒绝为军阀生产军火。“湘中之战，武汉之战，江西之胜，北伐军随处均得到工人有组织的援助。”⑤ “醴陵之役，平江之役，临湘之役，岳州之役等都是由于农民和工人的参战，以极少的伤亡而得很大胜利。”⑥ 在汉口和九江，四十多万工人奋起，英勇地与帝国主义斗争，于1927年1月初，先后收回了英国租界。在上海，工人阶级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终于直接从军阀手中解放了上海，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显而易见，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如果没有工人阶级这支重要的方面军，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从广东打到长江以至黄河流域，就根本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做到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几十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综上所述，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工人运动的新发展，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它们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国共合作，就没有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没有工人运动的新发展，也不会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

- ①刘少奇：《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1926年5月，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7期。
- ②《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英文译稿），载《“一大”前后》（一）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
- ③⑬⑭⑮按顺序见《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27、21、32至33、28、16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 ④⑰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
- 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1923年6月，载《六大以前》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
- ⑥参见《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出版。
- ⑦〔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
- ⑧李大钊：《狱中自述》。
- ⑨⑩⑫《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48、525、52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 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
- ⑬《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 ⑭《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通告》（第一号），1924年2月21日。
- ⑮《团粤区委报告（第十五号）》，1924年3月20日。
- ⑯《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45—8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 ⑰伍豪：《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1924年12月1日，载《农工旬刊》第九期。
- ⑱⑲陈独秀：《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1924年7月30日，载《向导》第七十六期。
- ⑳参见《刘尔崧给团中央的报告（第三号）》，1924年7月20日，载《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1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
- ㉑《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
- ㉒《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1925年7月。
- ㉓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135页，上海春耕书店1931年7月出版，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5月重印。
- ㉔省港罢工全面爆发后不久，驳载工会工人黄党，自贴街招于街头，倡言“单独对英”。见《团广州地委宣传部特别报告（第六号）》，1925年7月6日。
- ㉕参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广东时局宣言》，1925年6月18日，载《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
- ㉖⑳《团广州地委政治报告（第一号）》，1925年12月1日。
- 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1页。

从出土陶瓷看古代中菲关系

张维持 胡晓曼

向有“陶瓷之国”称誉的中国和“东方之珠”的菲律宾，是一水之隔的友好邻邦。我国的台湾省离菲律宾群岛的亚米屿只有七十八英里，我国的南沙群岛离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比台湾和亚米屿之间更近。自古以来，中菲两国人民就有着友好、密切的关系。根据目前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材料来看，远在我国新石器晚期和商周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古越族，已经驾舟航行在南海和太平洋之上，并与居住在菲律宾群岛等太平洋岛屿上的先民们产生了文化交往。中国的制陶技术亦在那时传到了东南亚一带。以后，历经我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宋元明时期，这种交往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海上贸易。以陶瓷为大宗的中国商货源源不断地沿着被后人称为“陶瓷之路”的海上航道运到菲律宾等东南亚诸国，甚至远达东非海岸和美洲太平洋沿岸。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菲律宾群岛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菲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本文试图依据这些考古材料探讨一下古代两国关系的渊源、兴起和发展等问题。

(一)

众所周知，远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陶器，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随着航海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相互交往，我国先进的制陶技术也就向外传播。考古材料表明，在菲律宾群岛及东南亚诸国，常发现类似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秦汉时期以前的陶器出土。经过对比，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关系。

例如，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东海岸发现的沙茨陶器，类型有罐子、甬、壶、尊、豆等。这些陶器从其表面的处理、装饰和形式看，与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相似。一般来说，文化相似的地方往往说明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发源地。因此，我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都普遍认为：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鲁、苏、浙、闽、粤沿海地区，包括台湾省，便有越人从海上迁移到菲律宾群岛。商周之际，是我国古代的一次政治大变动时期，因而又引起鲁、苏沿海的东夷（大越）向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迁移。以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等时期，东南沿海都有一部分越族先民泛舟到达菲律宾及南洋诸岛，并把我国的制陶术传播到这些地区，帮助当地的先民们发展了自己的制陶术。

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根据在巴拉望岛（位于南海和苏禄海之间）新近发掘的考古资料，亦提出了基本的外来影响达到这个区域是当公元前第一千纪——新石器晚期及金属时代早期，来自北印度支那及南中国的人民直接航行移入或者从南中国海盆地边缘地区迁移到此。^①这种观点与我国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

因此，菲律宾学者费·兰达·约卡诺在他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在早期亚洲贸易商人直接和我们的祖先发生接触当中，中国人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对丰富古代菲律宾人的文化，是有贡献的。在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方面，中国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是不能不强调过头的。虽然早在亚洲大陆新石器时代开始之时，中国的文化技能和工艺技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东南亚和印度支那邻邦传播”。^②

（二）

古代中非关系见于我国文献记载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从十世纪开始。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室利佛逝传》载，早在咸亨至开元年间（公元670~742），这个国家就经常派遣使者到中国来，后来曾派其王子到长安。笔者认为这才是最早的文献记载。

室利佛逝是梵文sri-bhuja的译音，是师利维贾亚帝国的古称，梵文读作sri-Vijaya。这个帝国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包括菲律宾、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马来亚、锡兰等。其文化属于印度文化系统。由此可证，《新唐书》中所说的“室利佛逝”，即指今天的菲律宾等南洋诸国，中菲两国政府的通使和贸易关系应从七世纪开始。

又据《全唐书》卷五五六韩愈《送郑尚书序》载：当时“其海外来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柳宗元亦说，到广州经商的国家，“由流求河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韩、柳二人所说，亦包括菲律宾在内。

由于唐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比较发达，有二、三十个国家的商船都群集于广州港。同时也有数量相当的中国船远航东南亚及西南亚。无论中国船或外国船，他们的载货都以陶瓷为大宗。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自唐以来，我国与菲律宾的关系日益密切，班丝兰省发现了唐代的钱币。整个群岛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的数量，为东南亚地区之冠。发现晚唐陶瓷的地点，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据富斯提供的较新资料，从巴武鄢——巴丹尼士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沿海航路所经地区，大约有十五处。器型以瓶类为主，釉色为黄绿色。类似的制品在沙捞越古物区也有出土，经西方研究中国陶瓷著名权威之一的波比先生鉴定，系唐代制品。^③

近年来，在非岛还出土有青瓷凤头壶及其残片，英人艾迪斯认为这种器物是唐代的，

或者是宋代仿唐式制品，可能来自华南尚未鉴别出来的某些窑的产品。笔者认为菲岛出土的风头壶应是唐代广州西村皇帝岗窑的外销制品。理由是：隋和初唐已出现青、白瓷风头壶、三彩风头壶，然宋以后却很少见到；菲岛出土的风头壶与广州瑞南路出土的一只唐代风头壶几乎一样；而广州西村皇帝岗窑又出土了许多风头壶残片。根据实物照片对比，三者器型、纹饰、装饰手法基本一致。当时广州是中国对外通商的门户，国际贸易的大港，风头壶作为外销商品运往菲律宾是很自然的。

由于唐代陶瓷在菲岛出土的地区分布位于沿海航路的范围，所以它们如实地反映着早年中西贸易商人活动过程的情形。虽然这一时期中国陶瓷对菲输出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它为宋元以后中国陶瓷大量外销菲岛奠定了基础。

(三)

宋、元时期，中菲两国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已很密切。宋代赵汝适在所著《诸蕃志》中谈到，宋代时，中国商船定期开往菲岛，向麻逸、三屿等国出售“瓷器、贷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购回“土产黄腊、吉贝、珍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等物。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谈到，在元代，中国商人继续同麻逸、三屿等国保持密切的陶瓷贸易，还同新兴的麻里噜、民多朗、苏禄等国开展贸易，并称道当地人民诚实可靠。华商在菲受到礼遇和保护，麻逸官员让他们进入市区进行自由贸易。麻逸商人以批发的形式向华商赊购陶瓷等物，用竹排贩销各岛。他们恪守信用，按时偿还贷价。这种友好、互利的贸易深受两国人民的欢迎。

当时，菲律宾已有商船直通广州，据《文献通考》记载，建立在今菲岛北部的麻逸国，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载土产至广州海岸贸易。

同时，政府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例如蒲端国（在今棉兰老岛）在宋真宗咸平六年至大中祥符五年（1008~1012年），曾五次遣使到中国访问，受到宋政府的友好接待，蒲端使还“多市汉物、金银归国。”这里所说的“汉物”，自然包括为菲人喜爱的陶瓷器在内。

有交往就有航路。宋、元时期的中菲航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泉州出发，经澎湖、流求、至麻逸；另一条是从泉州出发，经广州、占城、渤泥、至麻逸。前一条航线要横渡台湾海峡，风险较大。所以当时用于贸易的主要是后一条航线。虽然自南宋以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泉州，中外商人仍习于走这条航路。

考古材料表明，宋元时期的中国外销陶瓷遍布菲岛各个古物区，其中又以菲律宾沿海地区的港口和贸易城市出土为多。艾迪斯认为：“据估计，菲律宾过去十年中至少发掘了四万件瓷器（注：指中国外销瓷），我不善于计数，但我认为其总数一定会更多一些”。④ 四万这个数字是艾迪斯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宣读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十年是指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如果要把五八年之前和六八年之后发掘的数字算上，其总数又何止四万？若是再加上那些陶瓷碎片，这个数目就大得令人惊叹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参加东洋陶瓷研究会的各国学者们曾参观过位于马尼拉东

南的大拉格那湖西侧向南行驶八十余公里的庇那格巴雅兰村的中世纪墓地。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这样描述到:“仅一小地区,在一百座以上的中世纪墓的人骨头部旁边,发现有菲律宾陶器,脚下随葬着十世纪至十四~十五世纪(宋、元、明初)的中国陶瓷,有时也有泰国、越南的陶瓷。这不只是一件,而是由五、六件以上的大壶、小壶、碟、碗等各种器物组合起来的。即使是中国陶瓷,也有各种各样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青花瓷。”据说仅在庇那格巴雅兰村,到处有随葬中国陶瓷的墓地。就现在所知道的,合计面积达八点五公顷,范围非常广阔,中国陶瓷极其丰富。⑤

象这样的墓地在菲律宾群岛各岛屿海岸地带,已经发现的遗址超过了一百多处。属于宋元时期的陶瓷遗址主要集中在菲岛中部及北部,尤其是宿务岛、马里拉湾及内湖一带。

宿务岛一向是人口稠密的货物集散地。菲律宾的陶瓷专家称之为古瓷和工艺品的富源,这里虽然未经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未中断勘探、试掘。菲律宾陶瓷专家拜耶先生曾为马尼拉博物馆搜集了一千二百件完整瓷器,二吨碎瓷片。其中有很多宋元时期的青白瓷器和早期的青花瓷器。

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内湖发掘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遗址。到一九六八年四月,一年之中就出土了几千件宋、元时期的瓷器,在遗址外缘还有些明代的材料。这些器物中,包括“许多早期青花瓷,许多锈斑白瓷、釉里红器二十七件,枢府窑式瓷器,有同样惊人数目和花样的五彩水注,几个高质量的青白瓷俑,以及铅釉瓷器,德化早期白瓷,许多浅黄、灰或黑釉瓷器,以及浙江青瓷。”⑥ 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与近年来在福建省德化窑出土的瓷器相比较,有不少是相同的,这完全证明了菲岛所出瓷器相当一部分是德化窑的产品。这又为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圣巴赫的塔耶巴曾发现一个窑藏,出土一批十二、三世纪的陶瓷:龙泉碗、尊、青白瓷瓶、碗、盒,以及福建德化窑白瓷军持。⑦

在其他一些遗址中还出土了元代景德镇青白釉带铁斑的小件瓷器。但在国内这类瓷器出土甚少,景德镇古窑址中也未发现它的标本。这可能是专为销往菲律宾的外销瓷器。在菲岛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在景德镇湖田窑址中均有发现,说明这类青花瓷是景德镇湖田窑烧制而销往菲岛的。

宋、元两代正是我国瓷窑兴起的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瓷器生产的发展,沿海瓷窑体系迅速建立起来,地方民窑亦如雨后春笋遍布南方各省。不同窑系的青瓷、白瓷、黑瓷、影青,白地黑花、釉里红,各种变化莫测的结晶釉和窑变都自成特色,这些不同体系的瓷器运销海外,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菲律宾大量出土的宋、元陶瓷,正是这一时期中菲友好贸易关系的最好见证。

(四)

明代是我国海外贸易的极盛时代,也是中菲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在

明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年），菲岛上许多新兴的古国同明政府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吕宋、合猫里、冯嘉施兰、苏禄、古麻刺朗等国先后十三次遣使访问我国，有多次是由国王或首领亲率使团来访的。其中如苏禄岛上的三个国王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各率家属共三百四十余人来到北京。每次使团来访，都受到明政府的友好接待，当他们回去之时，回赐一些值钱的礼物，包括珍贵的瓷器。明政府也在永乐三年、永乐十五年 and 永乐末年四次遣使访问吕宋、古麻刺朗和苏禄，同样受到他们的隆重接待。

至于贸易往来，更为频繁。明末闽广农民远赴海外的人大量增加，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特别多。《东西洋考》中称：吕宋“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明史》亦称：“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亦称：“成化八年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此岁人民，往往入蕃商贩，由是吕宋诸番以时萃焉”。我国史籍中常载有：“民贩东西二洋”，东洋包括现今的菲律宾群岛。中国大批移民带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特别是制瓷业，对于菲律宾的开发很有贡献。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一艘由爪哇巴达姆港驶返荷兰的荷兰商船克尔德兰号，载着六万九千零五十七件各种中国瓷器，总价值达荷币六万九千零四十五点一佛罗林。而其中一部分是销往菲律宾马尼拉等地的。

从上面几条记载来看，当时中国商人主要在吕宋岛活动。因此，考古发现吕宋岛沿海地区的中国陶瓷特别多。一九五八年，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在八打雁的卡拉达岸所发掘出来的大批明初的陶瓷，成为中国陶瓷在菲岛贸易范围最有力的证据。考古工作者科学地打开了一千三百多座古墓，获得四千多件陶瓷器。内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贸易陶瓷来自中国，而且大部分属于明初的制品。

从器形上看，卡拉达岸出土的这批陶瓷器百分之九十属于瓷碗和瓷碟一类，其余的器形包括瓶子、军持、杯、碗盖等，惟数目甚少却品质较碗、碟一类的要优。⑥

吕宋岛上最重要的港口是吕宋港（马里拉），各段航线均通向吕宋港，以它为航运的起讫点。它是客运、货运的枢纽，也是菲律宾的政治、经济中心。每年三月，大约有三十到四十艘船只从中国开来，在马里拉港抛锚，然后把精美的陶瓷器和丝织品等货物转装小船运到“巴利昂”（唐人街），在那里卖给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

巴利昂是马尼拉商业生活的神经中枢。每天早晨城门一开，居民们就川流不息地到巴利昂去采购物品。巴利昂有几百家店铺出售来自中国的产品，还有各行各业的熟练的工匠。西班牙多明戈·德·萨拉萨尔主教在一五九〇年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提到：“巴利昂装饰了这个城市，所以我毫不迟疑地向陛下断言：‘在西班牙或这一带地区，没有一个我们所知的城市能象这里一般有过许多值得看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全部商务……各种行业和手工艺品的工匠……’。”可以想象，多明戈主教在巴利昂一定看到了许多精美的中国陶瓷器和当时陶瓷贸易的繁荣情景。⑦

事实上，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菲律宾大学在考察海峡区时，就曾试掘了巴利昂遗

址。出土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时期青瓷，黑瓷，褐釉瓷和青花瓷。这说明，在十三世纪时，这里就有中国商人在此进行陶瓷贸易或居住，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人占领马尼拉才开始荒废。

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占菲律宾中部和北部地区后，中国商人不畏艰险，继续同南部独立的古国及北部的占领区进行贸易，中国的陶瓷器仍然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值得注意的是，考古材料表明，在今天的菲岛沿海地区古文物遗址里，对于西班牙人治菲后输入菲岛的明代中晚期的陶瓷器，要比西班牙人治菲前的明初的陶瓷器难以发现。而在菲岛中那些未经西班牙人直接统治的山区，以及菲岛南部一些孤立的地区——棉兰老岛、苏洛岛、巴佬湾，曾广泛地发现明代中晚期的青花陶瓷器。类型以碗碟数量居多，以陶瓮为特色。

这种情况，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治菲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1. 西班牙治菲后，迅速基督教化。沿海各地区，尤其是中部和北部，菲人用陶瓷的陪葬风俗多被停止。但这种习俗在山区的土著当中仍然流行。

2. 西班牙治菲后，贸易陶瓷在菲律宾人礼仪活动中失去了原先的重要作用，一般只充当沿海居民家庭中的日常用具，因此陶瓷器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破碎，随意被当作废物而处理掉。

3. 西班牙殖民者对待菲律宾历史文物的态度是野蛮的，不是随意破坏，就是大肆掠夺。使得陶瓷一类文物只能由深山中较未开化而又强悍的少数民族保存较多。

4. 从十六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人沟通了菲律宾至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航路，中国商人到菲岛同西班牙人进行陶瓷、丝绸等物品的贸易，西班牙人将中国的货物从马尼拉装载上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分销西班牙所属的美洲殖民地。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中国陶瓷对菲岛本土的销售。这种现象直到十九世纪初大帆船贸易衰落时才有所好转。

① 罗拔·霍士：《公元前一千纪的菲律宾》，载《早期东南亚》，史密夫及华生编著，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② 费·兰达·约卡诺：《史前时代的菲律宾》，奎逊市，一九七五年版。

③ 富斯：《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一九八一年六月出版。

④⑥ 艾迪斯：《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见同上书。

⑤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九章：东南亚的中国陶瓷，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

⑦⑧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第74、54页。

⑨ 格雷戈里奥·爱夫·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第十章：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军事技术的运用及人们对其作用的认识

许锡挥

坦克集群、航空母舰编队和战略空军的运用，给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上了自己特有的烙印。了解这三大军事技术运用的具体情况以及战争决策者对其作用的认识，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

坦克集群——陆战方式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军事家对于坦克的运用问题，进行过热烈的争辩。这个争辩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后交由实践作结论。

英国是坦克的发源地，有最早的坦克作战实践。富勒在1922年写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伟大战争中的坦克》一书中，提出了“机械化战争”的思想。由于英国最高军事机构主要关心海空军的建设，对陆上作战方式的变化缺乏敏感，所以，没有深入研究未来战争中坦克的运用问题。对此，丘吉尔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也表示了自责。

在德国，鲁登道夫的“闪电战”理论提出了突然性攻击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的问题；古德里安更具体指明，为达到“闪电战”的要求，应运用强大的坦克集群作为快速突击的主力。古德里安认为，坦克的三个要素是装甲、运动、火力，其中最主要的是火力，但它不是静止火力，而是运动火力，装甲是为运动火力服务的，它的作用在于保证这个运动火力胜利完成第一波攻击。他明确指出，坦克的主要作用不是支援步兵作战，而是独立完成突破任务。因此，他主张建立大型坦克军团。但是，德军中的许多老将领都反对或者怀疑由“少壮派”古德里安等人提出的关于坦克集群作战的新观点。希特勒的心情则是矛盾的，这

个战争狂人一方面希望坦克集群确有这样大的威力，以便实现“闪电战”计划，另一方面又总是怀疑这玩意。因此，他决定让“少壮派”们去大胆地试验，可又时时干涉他们的“过分行”。

在法国，戴高乐曾为坦克的地位大声疾呼。他提出，当战争来临时，要使用“奇袭和突破力量”，“内燃机可以将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任何的速度、经过任何距离送到任何地点去。……内燃机装甲化以后所具有的威力和打击力量，使得战争的步调随着它的行动而改变。”^①他极力主张建立能起“攻城锤作用”的装甲师，并认为它是“决定胜负的兵力”。但是，这种意见遭到大批著名元帅、将军的反对。贝当认为：“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还是以要塞加固的连绵防线”。^②有一个将军竟说：“德国人是天生的侵略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人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③由于法国军事统帅部被顽固的保守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以至到战争爆发前夕，还未认真研究过坦克部队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在苏联，围绕着坦克的运用问题，也展开过争论。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苏联军事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广泛地探讨了未来战争的各种战略战术问题，其中包括了坦克的作用。三十年代中期，建立了机械化军。可是后来把它们解散了，改编为独立的坦克旅。直到德军入侵前夕，苏军统帅部鉴于西欧战场的教训，才急忙恢复机械化军的编制。在重组机械化军和建立强大的坦克兵团的工作中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例如，当时负责武器装备事务的国防人民副委员库利克元帅就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扩大步兵编制，并赞成仍然使用马匹牵引大炮，还提出：“坦克部队应主要用

以直接支援步兵，以连、营为单位使用。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军，目前还不宜开始。”④斯大林不同意库利克等人的观点，他认为：“战争的胜利将属于握有更多的坦克和部队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一方。”⑤不过，苏联关于如何运用坦克的成熟理论，还是在后来的战争期间才确立的。

关于坦克的作用和运用问题，到大战爆发时还是各持己见。无情的战火把争辩不休的理论交给了实践去检验，请看战争实践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吧！

首先将坦克集群用作突击主力的是德国人。在进攻波兰时，他们投入了二千辆坦克，并在其中一段突破地带编成了特别强大的坦克突击集群，又在各个主要行动方向的第一梯队里配备了坦克师。战争一开始，由一千多架飞机掩护下的这些坦克集群，作为各个集团军群的前锋，很快便突入了波军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波兰薄弱的兵力无法抵抗这种进攻，几天之内就全线崩溃。德国人以实践表明了坦克集群的重要价值。

在进攻西欧前夕，德军统帅部决定将集中使用坦克的作战方式向前推进一步，建立了一个更强大的坦克集群，它包括两个坦克军和一个摩托化军。这个坦克集群被规定用于主要突击方向。当战幕拉开，德军以坦克大集群在优势空军的强力掩护下，向荷兰、比利时的北部和中部快速突入，又出奇不意地用三个坦克军攻击法国防守薄弱的阿登地区。结果，德军用一次战略性进攻，就基本消灭了对方陆军主力，从而达到了战略目标。

在突袭苏联的军事行动中，德军统帅部受到波兰战役和西欧战役的鼓舞，更加大胆地将大量坦克集中起来，决定将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全部编入坦克集群，每个集群有二至三个军。德军进攻部队的3700多辆坦克只分成四个集群，配置在三个集团军群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战争的第一天，它们在强大航空兵的支援下，在各个主要方向上都楔入了苏军的防御纵深。苏军遭到了严重挫折，德军达到了相当一部分战略目的。

战史家都清楚，德军坦克集群在苏联的最初攻势，没有取得象在波兰和西欧那样巨大的战果。其原因何在？各家说法不一，但有两个情况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苏军的抵抗比较顽强，许多被德军坦克集群分割、合围的部队突出了重围。在某些战场上，德军坦克集群冲过之后，苏军步兵立即

在德军坦克前锋和后续部队之间恢复战线，造成了德军的混乱；第二，苏联幅员广阔，德军长途突进，战线拉长，坦克集中的优势逐渐消失，并出现了燃料供应困难，加以大片草原和冰雪、泥泞使坦克行动受阻。结果是，德军坦克集群的第一次打击虽然达到了相当一部分战略目的，但未能取得基本歼灭或瓦解苏军主力的主要战略目的。

战争初期过去后，坦克攻势的突然性已大大降低，但它的快速性和冲撞性仍然十分有效，因此，在各次双方都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战役里，坦克集群在实施大纵深突破的行动中还是主要的依靠力量。在这方面，德国和苏联具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

德军不仅在它处于优势的时候充分利用坦克集群实施各种突击，而且在它转居劣势之后，仍然如此。当它已失去坦克数量优势时，仍然大量集中坦克于主要突击方向以力争局部的优势。如在1944年底西欧战场的阿登地区战役中，德军虽然大势已去，但它在对方防线最薄弱部分集中了七个坦克师实施突击，曾使美、英部队遭到惨重损失。在苏联战场也有类似战例。

苏军对于坦克集群的运用方式是随着它的坦克数量的增长而变化的。1942年底以前，由于坦克数量不多，只能集中到较低程度，主要是编入诸兵种合成兵团。这些小规模的坦克集群的作战方式，往往是选择适当时机向德军优势坦克大集群或摩托化兵团的侧后方实施突袭，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开始采用集中大量坦克的作战方式，如1942年11月19日发起的该城总反攻和后来的库尔斯克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都是苏军采用集中大量坦克作战的战例。1945年总攻柏林时，苏军将6000多辆坦克分成两个集群，从两个方向发起进攻，于东南郊会师后，这股铁流便以压倒优势冲入市区。

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坦克集群的作战方式时，原德军装甲部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人都认为，他们首先创造的那种方式是正确的，波兰、西欧战役以及对苏作战初期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他们的胜利很大程度应归功于大型坦克集群的快速行动，而他们失败的教训之一，正是大本营的统帅们经常限制这种作战方式的运用。曼施坦因把他们的失败称为“失去的胜利”。许多英、美、法的军事家和战史家也

抱有相似的观点。苏联的一些军事家和战史家则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德国人过高地估计了坦克单一兵种的独立作用，又认为，德国人虽然正确地强调了航空兵对坦克集群的支援，但却严重忽视了炮兵的作用，炮兵力量的不足，使德军在坦克部队受到阻滞时往往无法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苏军统帅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时，承认坦克的突出地位，但强调诸兵种合同战斗，认为无论那一兵种都不能独立完成所有的战斗任务。

尽管人们对坦克的作用有各种评价，但坦克集群广泛用于战争这件事，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是谁也不能否定的。“机械化战争的真正速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表现了出来。”^⑥从军事哲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快速性和运动性深刻地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战场概念，固定不变的防线不存在了，僵持不动的事物成了瞬息万变的東西，军事家的旧头脑也要更换了。

航空母舰会战——制空就是制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使用航空母舰作战的是日本人。1937年他们进攻上海时，出动了“凤翔”、“龙骧”、“神威”、“能登吕”四艘航空母舰，舰载飞机250多架，当时支援日军行动的飞机，大部分是从这些母舰上起飞的。1938年5月攻占厦门、同年十月进攻广州也出动了航空母舰。有个别日本海军航空队军官已提出舰载飞机编队出击的作战方式，但日本军事机构决策人还不知道这件事的意义。

1940年11月，英国航空母舰“光辉”号在巡洋舰、驱逐舰的掩护下，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出发，突袭意大利塔兰托港，重创敌舰五艘，取得了出色的战果。但是，当时也没有人认识到这种作战方式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航空母舰大编队去完成战略打击任务的创举。但是，这个作战计划的制订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正在实施一种新的海战方式。在袭击珍珠港之前，日本海军将领中确实有人考虑过新的作战方式，如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次郎和年青海军中佐源田等。他们私下议论未来的日美战争时曾说过：“作战方式已经变化了”，“制海，这是一

定要做到的，但内容不同了。过去是靠战列舰，而战列舰的优劣又取决于它的主炮口径。可是，现在航空兵的发展日新月异。制空先于制海，不制空必不能制海。”^⑦可是，日本海军首脑们大多数仍然惯守传统的海战观念，主要考虑怎样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进行决战。山本五十六虽有一些新的思想，并且大胆地提出使用航空母舰编队去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但他主要还是考虑这次行动的“出奇不意”，而不是考虑改革作战方式。

日本航空母舰编队奇袭珍珠港的成功，标志着海战史上以战列舰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历史的一页虽然由日本人揭开，却是美国人把它写完的。美国人自认为：“我们在珍珠港损失的战列舰使得美国海军战斗整整进步了十年！”^⑧日本人也承认：“敌人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毕竟比我们海军首脑从胜利中总结经验来得快。”^⑨日本人依靠航空母舰集群行动袭击珍珠港，但他们选择的攻击目标主要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由于偶然的原因，美国的几艘航空母舰当时不在港内，这就给日本留下了严重的后果。既然日本人提醒了美国人认识航空母舰的新作用，而又没有消灭美国的航空母舰，那么，文章就由美国人来做。

正是从珍珠港逃脱了毁灭命运的四艘美国航空母舰“企业”、“约克城”、“大黄蜂”、“列克星敦”后来成为太平洋地区特混舰队的核心。在美国海军暂居劣势的条件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主张使用他们手中唯一可以使用的力量——航空母舰去突击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据点。这些行动的规模小，实际战果甚微，但为后来的航空母舰编队行动创造了经验。

海战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交锋是珊瑚海战，真正的航空母舰大会战则是中途岛海战。从军事科学的角度来看，中途岛海战的深刻意义是正式确立了航空母舰的中心地位。这次战役双方胜败得失的关键都在航空母舰上。美军能以劣势兵力（3艘航空母舰，230架飞机，22艘其他军舰）打败日军优势兵力（8艘航空母舰，4艘水上飞机母舰，620架飞机，100多艘其他舰船），原因是他们充分发挥了航空母舰的作用，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形成局部的空中优势，使日军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制空权，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军事家们认为，美国人使他们的劣势航空母舰编队在技术上

和战术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而日本人的航空母舰编队虽居优势，终因配置不当和行动失误而无法发挥作用。

美国人充分认识了航空母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从1942年起便大力发展这个舰种。1943年下半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增加到12艘，拥有900架舰载飞机，全部配备给尼米兹统帅的两支特混舰队，在中太平洋方向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还改进了它的舰载飞机，如用格鲁曼F6F恶妇式战斗机取代了旧式的野猫式战斗机，它是头一批比日本新型零式战斗机略胜一筹的舰载战斗机。舰载轰炸机、鱼雷机也有新的型号投入使用。后来，许多飞机装上了雷达，这就使美国海军航空兵在技术上大大超过了日本方面。

1944年10月的菲律宾莱特湾海战，是美国投入航空母舰最多的一次，参战的第三和第七舰队是以34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拥有舰载飞机1280架，配合行动的各种舰艇共200多艘。在这次战役中，为了夺取制空——制海权，美海军舰载飞机不仅攻击了日军的航空母舰，而且轰炸了海域周围的日军岸基航空兵机场。

美军在一系列登陆战中，也充分使用了航空母舰，以确保海战场和陆战场的制空权，如琉璜岛登陆战和冲绳岛登陆战就是例证。

航空母舰不仅起到延伸舰艇火力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将战略打击同时伸向海洋和陆地，快速而广阔地推移战场的空间。本来，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已表明了这一点。以后，美军进迫日本本土的行动，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海军空战”(“The Navy air war”)这个名词的出现，确实改变了海战的方式，“导致海战发生了象军舰上采用蒸汽和装甲那样的重大变革。”^⑩关于这次战争中人们运用航空母舰编队这一作战方式的经验，综合交战双方的成功和失败的战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条：第一，确定航空母舰的核心地位，树立制空权就是制海权的观念；第二，承认战列舰和水面炮战已退居次要地位，但不能认为战列舰已无所作为，应运用它的强大火力（特别是对空火力）支援航空母舰的行动；第三，在战斗中应力求集中优势的母舰和母舰航空兵群，组成各舰种合成的特混舰队，以形成技术优势，并达到主要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巧妙结合。看来，这几条经验是符合军事辩证法的。

战略轰炸——前后方界限的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略为提出过将空军用作独立打击力量的思想，但后来为人熟知的只是意大利的杜黑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出动大批飞机在中国战场作战。但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空军每次出动的规模最高未超过百架水平，它打击的范围和所造成的破坏也有限，不属于战略轰炸性质。

德国人进攻波兰和西欧的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时，充分发挥了空军威力。但其行动主要仍是配合地面部队进攻，也不属于战略轰炸。

德国人曾企图用空袭瓦解英国。在1940年8—10月的“不列颠之战”中，德方集结的作战飞机共2669架（其中轰炸机1361架）。可是，由于他们没有远程战略轰炸机和远程护航战斗机，空袭的范围只能集中在英国本土十分之一的地区，虽投下了36,844吨炸弹，但既未能摧毁英国空军基地和航空工业，也没有封锁住英国的海上交通，更无法瓦解英国的整个经济潜力。相反，德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损失飞机1700多架。这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了战略轰炸尝试。

德国人进攻苏联时也曾实施过一些大规模的空军密集突击，1941年6月22日这一天，就出动飞机4900多架，此后，一次出动空袭一个城市的轰炸机达到一千架水平。但幅员广阔的苏联国土，迫使德国空军力量不断分散。当苏联工业迅速转移到德国轰炸机航程范围以外之后，德国空军的攻击力量便日趋减弱了。显然，在这里也谈不上什么战略轰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真正的战略轰炸，是由美国和英国空军在1942年以后实施的。它们拥有大批远程战略轰炸机，又配备了新的导航设备。

1942年5月30日，英国出动一千架飞机猛袭科隆，九十分钟内，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区被变成废墟。随后，德国的其他城市如埃森、杜塞尔多夫、美因兹、卡塞尔等相继被袭。当年6月，美军第八航空队成立，大批“空中堡垒”从美国源源到达苏格兰基地。美英空军联合的战略打击力量形成了。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美英空军的任务是：“逐渐毁灭和破坏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并打击德国人的士气，使其达到尼

以使武装抵抗能力受到严重减弱的程度。”^①此后，美英空军联合行动，开始对德国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战略打击，直到战争结束。据统计，英国空军对德国的投弹量，1943年全年是136,000吨，美国空军约150,000吨。1944年又大幅度增加。它们使用的兵力数字是，1945年战争结束前夕，英国战略空军第一线轰炸机有1609架，美国驻西欧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有2085架，美国驻意大利第十五航空队的轰炸机有1200架。战争期间，美英空军对德国的总投弹量约2700,000吨，轰炸机共出动144万多架次。这些数字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至于战略轰炸的方式，美英空军曾作过多种尝试。起初，英国空军侧重进行面积轰炸，美国空军主要实施精密轰炸，后来，两种方式都被共同使用。他们还实施过“昼夜连续打击”战术，即出动成百上千架飞机，对一个目标区集中反复轰炸。英国空军还采用了“轰炸机流”的方式，即轰炸机群没有一定的编队，每机之间的距离在视线以外，几乎与单机飞行相似，但这千百架“单机”在高度、速度和时间上都密切配合，通常形成一条7—8公里宽而又十分漫长的“机流”，一波一波地冲入目标区上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只需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密集编队一个半小时的投弹量。德国人认为，汉堡的被毁灭是美、英空军运用上述两种方式，发挥了技术和战术成就的典型。^②为了深入打击德国远后方的目标，美国空军创造了著名的“穿梭式轰炸”战术，即以英国和北非的基地为两点，轰炸机队从英国起飞先袭击德国南部的航空工业，然后向南飞越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降落在阿尔及利亚，补充燃料和弹药后，又起飞向北，途中轰炸法国西海岸的德军潜艇基地，最后返回英国。1944年5月以后，美国空军曾以地中海基地和苏联机场为两点，用这种方式袭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工业区。

美英空军对德国工业体系和经济潜力进行战略打击的计划，是吸收了许多经济专家、科学技术专家、情报专家参与制订的。美国的战略服务处有一个专门的经济目标队驻在伦敦。专家们详细分析研究了德国的工业分布，确定重点，从而制定逐个摧毁的程序。当时选择了十项经济目标，其中以战斗机工厂、轴承工厂、综合燃料工厂和钢厂等为主要打击对象。因为这些工厂被摧毁，会立即导致整个军事工业的瘫痪。美英军方

曾请一些国际交通专家和情报专家协助制订了摧毁德国交通设施的计划，将整个目标分为九个区，然后重点空袭每个区的枢纽，以便把全部交通切断。为了摧毁德国的水力发电枢纽，英国的专家们特别设计了一种圆柱形炸弹，投放这种炸弹时，速度、高度、距离都经过精密计算，使它恰好在水平面以下对堤坝最致命的部位爆炸，收到极大效果。

当然，美英空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是以巨大的代价换取的。整个对德轰炸过程中，美英空军共损失飞机一万多架，飞行员八百多名。因而曾有人对战略轰炸是否值得进行提出了疑问，但结果，还是决定继续坚持下去。P—51远程战斗机投入护航之后，美英空军开始夺得制空权，加上雷达的作用，它们的战略轰炸逐步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这是1944年4月至1945年5月的事。

在亚洲战场，到1944年10月底，塞班岛基地建成后，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才真正开始。B—29轰炸机的作战方式，一般是出动数十架至一、二百架，有时采取大编队的日间精密轰炸，有时以一机或数机为一组，各组互相配合，实施夜间“地毯式轰炸”。它们起初使用普通炸弹，后来针对日本城市竹木结构房屋居多的特点，改用大量燃烧弹。1945年上半年，美国空军实施“火攻”，每架B—29轰炸机满载6吨以上的燃烧弹，94个日本城市受到这种空袭。3月10日，B—29机群334架空袭东京，投下约2,000吨燃烧弹，造成了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城市火灾。据东京警视厅统计，这次灾害超过1923年大地震。

关于美英空军战略轰炸的得失，战后曾有专门的调查团进行研究，美、英、德、日等国的专家根据各方的第一手材料，作了各种分析。^③苏联军事家也对此作了评价。从战后三十多年来各方所发表的意见来看，美、英的某些军事领导人和历史学家对它的效果估计高了一些，而苏联人则似乎评价过低，德国人和日本人根据亲身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我们对各种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大概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看法。

人们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战略轰炸已经使战争的空间概念发生变化，前后方的界限开始消失。据战略轰炸调查团的统计，大战期间，德国战斗人员伤亡人数约300万，而后方城市因受空袭而伤亡的平民人数达650万；太平洋战争中，

日本战斗人员伤亡778550人，因受空袭伤亡的平民达803000人。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关节点。

夸大和缩小对德战略轰炸效果的人，各执一个时期的材料，前者侧重1944年7月以后，而后者却强调在此以前的事实。我认为，要对战略轰炸的实际效果作出客观评价，必须深入分析整个历史过程中影响它的各种因素及其发展变化。1944年7月以前，美、英空军未能取得显著战果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夺得制空权和目标选择不准确。后来收到较大效果的主要原因是逐步夺取了制空权，又正确地选择了合成燃料工业和燃料仓库以及铁路、运河枢纽为重点摧毁目标。美、英军事当局低估了德国人对抗轰炸的能力。德国人所采取的分散和隐蔽重要工业的方法是很有成效的，例如，他们曾将27个飞机工厂分散为729个，隐藏在山洞、隧道、废矿井以及森林、果园、农村里，对这些工厂，从空中和地面都很难侦察到，要摧毁它们就更难了。对照日本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在考察战略轰炸的效果时，如果忽略了对抗手段的作用，就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日本所受到的战略轰炸的打击力量，远不及德国，但它的相对灾害却超过德国。据战略轰炸调查团统计，轰炸使日本炼油工业产量下降83%，飞机发动机工业产量下降75%，电子设备产量下降70%。这一事实与德国军事工业产量在遭受猛烈轰炸的情况下仍然上升，形成鲜明对照。这里的关键在于，日本几乎没有对抗美国B-29轰炸机的能力，而且城市设施和自然条件方面也难以削弱轰炸效果。可见，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是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孤立地提出“战略轰炸对战争胜败能否起决定作用？”这是形而上学的。

至于战略轰炸能否摧毁对方国民士气的问题，也争论了三十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领袖们曾希望依靠对大城市的面积轰炸来达到摧毁德、日两国国民士气的目的。这些轰炸确实把某些德国城市变成“充满哭叫声的恐怖的活地狱”，^⑭给日本人带来了“人间惨祸”。^⑮但是，根据各方材料，德、日两国的国民虽因大规模空袭而产生了一定的悲观失败情绪，却没有因此瓦解士气。相反，轰炸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受害居

民的仇恨。用德国人的话来说，“这种疯狂的火焰，似乎已经把人民熔成了一个整体”。^⑯论及对敌占区的轰炸，问题就更多了。美、英空军对法国某些城市的空袭，曾伤害了许多法国居民并引起了地下抵抗运动战士的抗议。总之，战略轰炸的心理效果也是不能孤立评价的，它受到不同的战争性质、国家制度、国民组织和民族性格的影响，涉及一系列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因而，它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更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军事技术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但它的历史的这一篇章是值得人们回味的。

- ①②③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一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9、17页。
- ④⑤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八章，莫斯科新闻通讯社1971年版。
- ⑥爱德华·特勒：《技术：力量的不均衡》，载于《八十年代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80年版。
- ⑦渊田美津雄：《袭击珍珠港》，商务印书馆1979年北京版，第12页。
- ⑧哈里·豪·兰森：《情报工作和国家安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 ⑨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中途岛海战》，商务印书馆1979年北京版，第59页。
- ⑩N·米勒：《海军空战》，海洋出版社1982年北京版，第1页。
- ⑪A·维里尔：《轰炸攻势》，1968年伦敦版，第330页。
- ⑫⑬⑭阿道夫·格兰特：《开始和终结——德国空军的兴衰（1938—1945）》，军事译粹社1976年台北版。
- ⑮伯纳德·布洛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略空军力量》，1957年2月4日，圣莫尼卡，兰德公司出版，1866号研究备忘录。
- ⑯早乙女胜元：《东京大空袭》，岩波书店1971年东京版。



东吴首任的交州刺史步骖

何维鼎

赤壁战后，急于开拓疆土的东吴十分看重岭南地区。公元210年（汉献帝建安15年），孙权作出一个大胆的决策，让他的助手、淮阴人步骖遥领交州刺史。为什么说是“遥领”？这就得从东汉末年轻南地区的局势谈起。

西汉以后，岭南七郡隶属于交州，州治设在苍梧郡的广信县（今广东省封开县）。东汉朝廷委派的最末一任交州刺史、南阳人张津，是曹操的拥护者。此人终日“鼓琴，烧香，读邪道书”，在同染指岭南的荆州牧刘表的交战中连年败阵，最后惨死在自己的部将手中。于是刘表乘虚而入，硬派他的文吏赖恭为交州刺史、武将吴巨为苍梧郡太守，统领五千荆州兵，到广信县走马上任。可是这两个同僚文武不和，骄悍的吴巨把“先辈仁谨，不晓时事”的赖恭撵走，独自在苍梧郡为所欲为。

东汉朝廷不甘心退出岭南，就加意笼络当地土著势力的头面人物士燮，赐给玺书，要他“董督七郡”，同吴巨相抗衡。这士燮原籍苍梧郡，任交阯郡太守，是个政客兼学者。他收养了一批避乱南渡的中原士大夫，政治资本雄厚，在郡内“威尊无上”。他的弟弟士壹、士贲、士武分别是合

浦、九真、南海三郡太守。这样一来，“四士”就同吴巨对峙着，谁也“董督”不了谁。

对交州这个微妙的形势，东吴是有所考虑的。早在赤壁开战前夕，孙权的重要谋士鲁肃就曾对诸葛亮说过，“（吴）巨是凡人……行将为人所并。”可见，他们认为攻破交州不是不可能的事。

孙权所提拔的步骖，是个躬耕的儒生。他早年种瓜度日，“昼勤四体，夜诵经书”，同一班吴中名士结伴为友，时人称做“英俊”。后来他得到地方官推举，成了茂（秀）才，先在孙权身边做佐吏，干出点成绩，继而出任鄱阳郡太守。刚到职，就擢升为交州刺史，不久又追加“使持节、征南中郎将”。不过，孙权授给他的，除了“武射吏千人”（或说“武吏四百人”）以外，就只有一个暂时挂上的、等待着他亲自去落实的空官衔（“遥领”）。要是他无法在交州开创一番事业，这刺史的官称就没有意义了。

步骖接到命令，就率领这支临时凑合的小部队从鄱阳郡转入湘南，正打算渡灵渠（今广西兴安县境）下漓江，却意外地在湘桂界上受到旧刺史赖恭一班人的热情接待。那赖恭被逐之后，对

吴巨耿耿于怀，总想伺机报复，自然寄希望于南下的东吴人；而同赖老夫子的邂逅相逢，也使步骛获得作为制订策略的第一手材料。这同往后的事态发展很有关系。

吴巨心下狐疑，也特地派员去刺探口风。步骛运用巧妙的手法稳住了吴巨，使东吴的船队得以在广信县停靠。

独据苍梧郡多年的吴巨为什么会容许步骛入境呢？原来刘表死后，他失去后台靠山，眼下北有赖恭为敌，南有士氏作对，自己夹在中间，处境孤立得很；况且那个小船队也断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因此一开始，吴巨便决定对步骛实行拉拢。

步骛乘虚而入。他用分化手段诱杀了吴巨和他的一个主要干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散了荆州兵，夺得交州的腹地苍梧郡。接着，他想方设法扩充军队，建成一支拥有二万人的庞大舰队，大张旗鼓地日夜在江边操练起来。

步骛的威势惊动了以士燮为首的士氏家族。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取稳妥的策略：宣布士家兄弟三人（其时南海郡太守士武已经过世）愿意“奉承节度”，承认步骛交州刺史的地位。显然，这个决定在当时是个明智的选择。步骛当即奉命加给士燮一个左将军的称号，让他们安心留在原来各郡继续供职。

破一个，降一个，后顾之忧解除了，步骛于是统领大军沿江东下，向目的地南海郡进发。

东吴舰队驶到高要峡，同拦路截击的吴巨残部钱博等人指挥的荆州水军展开一场近身战。对方到底士气不振，一败涂地，钱博逃命高凉去了（后来他走投无路，主动出降，受任高凉西部都尉）。这样，步骛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昔日赵佗的王都番禺县城（今广州市）。

这一年来，步骛靠一个微不足道的队伍起家，充分地利用了交州各种派系错综复杂的矛盾，不断瓦解敌手、壮大自己，终于把“遥领”变成实受，为东吴初步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战略后方，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东吴首任交州刺史，步骛认真做了一番有益的工作，努力从政治上巩固刚取得的军事胜利。

步骛跋山涉水，对南海郡的地理环境进行细心的考察，“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藪之殷阜”，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斯（指番禺县城）诚海岛膏

腴之地，宜为都邑。”于是，他着手重建南越国灭亡时毁坏了的赵佗城。事隔三百年，他的属官姚文式参照《汉书》的记载，好不容易才寻访到旧城的遗址。接着大兴土木，“辟番山（一说在今北京路、文德路一带）之北以广之”，计划修筑一个较秦汉时更具规模的番禺城。

公元217年（建安22年），新城大体落成。步骛就下令把交州州治从广信县迁到番禺县，“绥和百越，遂用宁集”。这个政治重心重新东移的措施以及日后由它所导致的广州行政区的首次设置，对后来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对粤东海道和滨海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注）。

步骛任内，实际上由他经手处理的东吴和士氏家族的关系，也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士燮颇为恭顺，年年派使者去建业，进贡大批杂香、细布、龙眼、椰子、百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牛和野象，还专门送儿子士廙去做人质（实任武昌太守），士壹也献上江东奇缺的战马几百匹。投桃报李，孙权时常修书慰勉他们，升士燮为卫将军、士壹为偏将军（二人并为侯），“诸子在南海者，皆拜中郎将”。

东吴绥抚士氏家族，另外还取得一些好处——使它的政治影响一度伸延到刘备的大后方：由于士燮秘密策反，益州永昌郡豪族雍闿袭杀该郡太守，宣告归附东吴。步骛闻讯，马上“承制遣使宣恩抚纳”，就让雍闿充当永昌郡太守（因这一功，步骛受封广信侯）。随后，孙权又委任被刘备夺去地盘的刘闿（刘璋子）为益州刺史，驻守交、益边界。东吴插在西蜀的这两颗钉子，弄得一直觊觎交州的刘备自顾不暇。

公元220年，步骛的十载刺史任期结束，奉调“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岭南各族人民的大批“北渡”，对兵源不足的孙权来说，这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同刘备周旋去了。二十多年后，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出任东吴丞相，“犹海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始终保持他在交州时的风度。

（注）：东吴首置的广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高凉）四郡（相当于今日两广大部），治番禺。这个建制到南齐末的二百四十年间基本不变。南梁以后，广州的辖境才大为缩小，后来就成了广东省内的一个府了。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来新夏

屈大均原名绍隆，或作邵龙，以出生地自号翁山，一号冷君。广东番禺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生，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年六十七岁。近人涂宗涛氏曾据《翁山诗外》撰《屈翁山生日考》一文，考订翁山生日为明崇祯三年九月初五日(1630年10月10日)，全文载广东《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

撰者为明诸生。清兵围广州时，削发为僧，法号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时年二十一岁。他一生不仕清朝，时释时儒，为清廷所嫉。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上谕中曾“指斥”屈大均等的隐遁行为说：“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缙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耶，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殪其冥漠不灵之魄。”(《史忠正公集》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

撰者性好游历，曾北游京师，周览辽东，西涉山陕，与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毛奇龄等都有往还。他是清初的岭南名诗人，王士禛曾称道他的诗作说：“翁山之诗，尤工于山林边塞，一代才也。”(《池北偶谈》卷十一《粤诗》)

清初的另一诗人杜濬(于皇)在所著《变雅堂文集》卷一有《复屈翁山书》，盛推屈氏风骨，称许他是鲁仲连之流，“有骨有识，足以继武古人。”

屈大均的生平，除自撰《生圻自志》(《翁山文外》八)外，《清史稿》卷四八九、《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八、《文献征存录》卷十及《清代学者象传》卷一都有他的传记，可供参读。

他所著的《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是清人笔记中的名著。它介绍了广东地方山川、物产、风俗、气候各方面的情况极为详备。清初学者潘来(次耕)为《新语》所写序言中曾说：“考方輿、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语》一书。”可见翁山不仅从文献记载中搜辑，而且又经实地考核验证，然后写录，其可信程度自较一般耳食者为高。

潘来又评论这部书的价值说：“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摘词者可以资华润。视《华阳国志》、《岭南异物志》、《桂海虞衡》、《入蜀记》诸书，不啻兼有其美。”

这段话乍读似感对《新语》扬之甚高，然循读一过，又感到次耕确非虚谀。钮琇所撰《觚觚》卷八有《著书三家》一则称赞《新语》说：“著书之家，海内寥寥。近惟《日知录》、

《正字通》、《广东新语》三书，可以垂世。”钮氏以《正字通》相比，似拟于不伦，但却可见《新语》的初时所重，固不独次耕的称誉。

书前有自序，设为问答之词，叙述书宗旨和缘由。翁山自称其书的始作是：“予尝游四方，阅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头绪，因途次之而成书也。”

翁山复自述其书之所以名《新语》的缘由说：“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

这说明撰者系以厚今薄古的意趣，作《广东通志》的补篇。《广东新语》和翁山其他著述《翁山易外》、《有明四朝成仁录》、《翁山文外》和《诗外》，合称《屈沱五书》。

《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列二十八语，即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官、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等二十八类。各以类相归，辑录有关资料，虽间有诡异玄怪之说，但大部分可供参证。其涉及方面之广，内容采录之富，诚为地方风土著述中的上品。其记事之后常系以叙事诗，语核意深，可称诗史。

《广东新语》不仅可供地方史研究之用，而其所记多偏于社会经济，对研究清初社会经济状况有足资取材之处。其于农业，尤重经济作物和特产，对莞香、蒲葵、甘蔗、龙眼、荔枝等的种植和经营都详其原委，如记顺德陈村情况说：“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又尝担负诸种花木分贩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枝、龙眼、橄榄之属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博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卷二《地语·陈村》）

又记经济作物的普遍生产说：“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卷二二《鳞语·养鱼种》）

书中对手工业的记载，如石湾陶业、佛山冶业等都借时谚所谓“石湾缸瓦胜于天下”和“佛山之冶遍天下”等来说明器物精良，遐迩畅销。（卷十六《器语》）

名产和特产往往引起贪吏的虎视，千方百计地勒取垄断以谋私利，陷民于水火。如记香柚之被勒取说：“有香柚者出增城，小而尖长，甚芬郁，入口融化。……近为贪令所苦。每出教，取至万枚，需金以代，今树亦且尽矣。柑亦橘之类，以皮厚而粗点及近蒂起馒头尖者为良。产四会者光滑名鱼冻柑者，小民供亿亦苦，柑户至洗树不能应。”（卷二五《木语·橘柚》）

广东地处滨海，物产阜丰，因之商业繁盛。广州便是一座“天下商贾聚焉”的名城，而濠畔街更是中外贸易的中心点，其繁华景象是：“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卷十七《官语·濠畔朱楼》）

由于贸易繁兴，利之所趋，地方官吏多利用搜刮所得插手其间，商人则凭借其多金

而濶入官场，遂出现官商一体的怪现象。《新语》即痛陈其事说：“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腴民以自封，既得重赏，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而废居，易以其奇矣。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民之贾，虽极其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偏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官与贾亦复无别，无官不贾，而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于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卷九《事语·贪吏》）

《新语》尚记述地主阶级强占增生沙田及抢夺农民禾稼的霸行说：“粤之田，其濒海者，或数年，或数十年，辄有浮生。势豪家名为‘承餉’，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为己物者，往往而有，是谓‘占沙’。秋稼将登，则统率打手，驾大船，列开张旗以往，多所杀伤，是谓‘抢割’。斯二者，大为民害。”（卷二《地语·沙田》）

至于民间习俗亦有所记，如：“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车，女子率自持一伞以自蔽。”（卷十二《诗语·讴歌》）此虽似记村俗，实则反映等级森严的阶级关系。

群众反抗斗争也多有记述，如卷七记群众斗争的组织形式说：“粤中多盗，其为山盗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资本，有谋力，分物平均，为徒众所悦服，故曰‘都’。每一营立，远近无赖者踵至，曰‘签花红’。骁勇者曰花红头目，自六老以至十老，自先锋一以至先锋十，悉以十人为一曹，十人满则更一名号以相统。”（《人语·盗》）“凡贼有大总、二总至于五总。亦曰满总、尾总。分哨为哨总。禽总，演禽者也。书总，掌书记者也。旗总，职志者也。纪纲诸事曰长干。众贼曰散班。其上有甲头。合数群有都总。凡大总死，谋所以立，建所授皇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而张则立之矣。”（《人语·永安诸盗》）

《新语》记明中叶广东地区黄萧养领导的农民起义事迹颇详。如记其起事及声势说：“黄盗名萧养，初为盗下狱。……越狱纠集战船数百艘，直犯广州。海寇之雄，莫过萧养。”（卷七《人语·黄盗》）

诸如上述各种史料，都有裨于研史者参证。《广东新语》一书在清人笔记中当称上乘。是书有康熙庚辰（三十九年）木天阁刊本。

训诂学渊源论略

潘 允 中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展的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盛况空前，影响广远的时代。孔丘、孟轲以外，还有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杨朱、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等等。他们都对自己的一套，反复说明、解释。虽然不是都有他们的系统性；但在众说纷纭中，也各有其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后来秦汉之间出现的训诂学著作的源头。

第一个特点是声义相训，比较通行。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也者，理也”。（均见《礼记》）“知（智）者，无有不知也”。（《孟·尽上》）“信”也是孔丘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信，古读为申，《释名》：“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违也。”儒家“信”的义训，颇通行于春秋左传时期。这里试举襄公二十七左传记事为例。那年有一次鲁、齐、楚、晋、曹、许等国将盟于宋地。楚人藏战甲于衣中，提防有事变发生，且有袭晋之意。楚国当大宰的伯州犁不同意，说：“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因请释甲。楚国的令尹子木却是赞成袭晋的，他说：“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于是对人说：“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孔子“仁、义、礼、知（智）、信”的学说，至孟轲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且进一步认为这些好品德，是人们内在的、先天就具有的。他提出“性善论”。《孟子·告子章句上》，几乎全是解说他这个论点的。试一读之，自会理解，这里就不细讲了。

反对派，以赵人荀况为首，他以为人生而有欲（这和孟轲在《告子》篇上所说“食色，性也”同理），有欲必争夺，这就是“性恶论”的根据。性恶论形式上说是凡人人性皆恶，实际上却分王公大人、大夫、士为第一类，庶人（民）为第二类。第一类的人属知礼类。荀子认为，人性原来是恶的，因为学礼与为礼而知礼义，恶变为善了，这种行为善的人，可用礼乐来对待。第二类的众庶百姓属不知礼类，因为他们不学礼、不为礼，所以始终是性恶的。这种行为不善的人，必用刑法来制服。荀子又分人为圣人、中庸、元恶三种。圣人能自动矫正本性，制作礼义；中庸能受教化、知礼义；元恶不受教

化、不知礼义。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学礼义，应归入庶人类；庶人的子孙，如果学礼义，应归入卿相士大夫类。不学礼义便是性恶，所以性恶的是庶人。孟子用统治阶级的理义来证明人性善，荀子用统治阶级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恶。不管性善论也好，性恶论也好，归根到底，只是说，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恶。

第二个特点是引用《诗》、《书》来证明己言己文，成为通行之例。这个首先倡自孔丘、孟轲，然后遍及诸子百家，目的是表示：“有《诗》为证”。当然，那并不一定是准确的训诂，那时也还没有训诂的名称。此类用例不少，光是《左传》一书就有百次以上，这里只举他书中较重要的例子如下：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这几句话概括了学《诗》的好处，当然很正确。同篇，孔子又“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是指不仅要诵其诗，还要懂得周南、召南的乐曲和舞，否则就象一个人面对着墙壁，对最近之地也一无所见罢。但孔丘解《诗》有时也会断章取义，随意附会的。例如《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一句，见于《诗经·鲁颂·駉》篇第四章。原诗赞扬牧马人善于养马，把群马饲养得又肥壮，又高大，是因为他“思无疆”（想得广远），这是一章；二章说“思无期”，意思差不多；三章说牧人“思无斁”，是思想不厌倦；最后一章才说“思无邪”，意谓牧者长期饲养，思想没有私心杂念。单拿这句来作为对整个《诗经》的评价，显然是不对的。可是，因为这是孔子圣人讲的，虽是断章取义，还是传诵千古。现在该把它纠正过来了吧！

孔门弟子更是经常引证《诗经》来说明问题的。《论语·泰伯》篇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按引诗见《小雅·小旻》篇，原诗本来意义是指周幽王的臣下讥讽王的暴虐，自己万分谨慎戒惧。曾子因病引证自己也是这样活过来的。

孟子曾驳斥高叟解释《小雅·小弁》篇为怨诗的机械论点，理由是：“《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公孙丑问他：“《诗经·邶风·凯风》篇何以不认为有怨恨之情？”回答说：“‘凯风’亲之过小者也。”

荀子虽然反对孔、孟法先王的错误，但他仍然引证经过孔子删订的《诗经》。如《王制》篇引《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引诗见《周颂·天作》篇）《富国》篇也引证《诗·大雅·棫朴》篇：“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万方。”同篇又引证《诗·大雅·抑》篇：“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来证明荀子自己言论的正确，因为前面他反复说了大篇养民、富民、治国的大道理，他相信人民是“无言不仇，无德不报”的。

在引经典以证成己言的做法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荀子的弟子，那位“喜刑名法术之掌，而其归本于黄、老”的韩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末尾，有“太史公曰”的赞语：

“老子所贵道〔德〕，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对于韩非的思想观点，最好看看他的《解老》和《喻老》两文，这里只谈《解老》。《解老》就是他对《老子》一书的解释。照理韩非该用道家思想来解说的，然而不然。在《解老》里是夹杂着一些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他对《老子》引文的解释，和汉魏以来的注解多不同，这就和道家思想大有出入了，跟后人的《老子注》也有所不同。该文从第三节以下论仁、论义、论礼，都属利用儒家思想去解《老》，跟韩非的思想体系本来不合，但在“工人数变业”一节说：“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这倒说得很合理，却跟他原来的“法与时转则治”的主张不同。下面便是《解老篇》的要点摘录：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思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有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三十八章文。以下同。）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谓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一本作礼），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

“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文）

韩非的这些说解，在先秦时代，还算是第一次出现的训诂作品，类似后代的注疏之作。

当然，类似这样的，但不够完全的训诂，还是有的。例如墨子就在他撰（也许是其弟子所传录）的《兼爱》三篇中一再引证《太誓》、《禹誓》等古籍，来阐发其言论主张。并且还载书出游，解答读书问题。据墨子《贵义》篇记：“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藏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以上所说，可以约略知道春秋战国期间，由于诸子百家的争辩，促使训诂由萌芽而发展了。不仅如此，连语法研究也第一次提出来了。如《公羊传》僖公十六年：

〔经〕陨石于宋五。六鹤退飞过宋都。

〔传〕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礧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鷁？六鷁退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鷁，徐而察之则退飞。

这段《传》文，已能说明人们感觉的先后次序，井然不紊。可见两千多年前我国学者已经从懂得训诂开始，接着也初步懂得语法上的语序的重要作用了。

从以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里的各种有关语言解释中，已经告诉我们：训诂的三类方法：一曰形训；二曰音训；三曰义训。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形训就是按字形来释义。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又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篆文正作正，乏作𠄎）。《国语·周语上》：“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粦〔美貌〕。”《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说文》私指禾名，公私之“私”作厶，公作公。）

音训也叫声训。这个已经讲过。即“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也者，理也。”（以上均《礼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

义训就是解释字（词）或语句的意义。先秦也有不少例子出现。如《国语·周语下》：“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郑司农云：广当为光）。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这是对所引《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从“基命”起的最早的训诂，其所释义，是义训的典型。


以今语释古语之例多见于《左传》。如僖公二十八年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杜预注：“尚书虞、夏书也。取纳以言，观其志也。明试以功，考其事也。车服以庸，报其劳也。赋，犹‘取’也。庸，‘功’也。”

以今语释古语，还见于《周礼·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郑玄注：“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则今之醉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谓旧醖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酿接夏而成。”

训诂还以通语释方言，这也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菟’。”

盛行于春秋战国的《诗经》也有解释字义使古书训诂准确化的作用。如《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墐户”一句，毛传：“向，北出牖也。墐，涂也。庶人革户。”证以后出的《说文·宀部》：“宀，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而宀，交覆深屋也，象形。”这正是实写古代咱们祖先的生活情况。一到农历十月，黄河流域的民房，就要把北边的窗子堵塞起来，把户门用泥土涂厚一些。以免寒气侵入。

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流亡经过卫国时，“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杜预注：“块。土块也。”此事亦见于《国语·晋语四》：“（重耳）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重耳之舅）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司马迁毕竟是通晓春秋战国时的语言文字的，他在《史记·晋世家》里就写得更明白了：“重耳过卫，卫文公不

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原来“块”是盛土的筐子，意谓野人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只是把食物盛在装土的器具上给重耳。那“块”字篆文正作，这是农民的常用器具嘛，重耳是公子，当然不懂，竟误会为对他无礼；幸而赵衰、咎犯知礼善说，而终于彼此高兴圆场。

以上只是讲了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的语言文字之训诂，已层见迭出，其中似以儒家为多，然并不限于儒家。就是儒家也好，他们派别很多。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据《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弟子除颜回早卒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哂、颜何），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梁任公：仲良氏无考。孟子称：‘陈良，楚产，悦周公仲尼之道。’仲良岂陈良之字欤？）有孙氏之儒（指荀况，荀子书自称‘孙卿’或‘孙卿子’）有乐正氏之儒（曾子弟子有乐正子春）。自墨子之死也，有伯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子、墨子俱学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当时齐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有《慎子》二十五篇）、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这样看来，秦汉之际，特别是在西汉之初，因应大一统的形势，出现一本分类罗列，加以“雅言”解释的字典——《尔雅》，真是水到渠成了。此书自不可能是个人的和一时的著作，而是百家性的陆续编补而成的字典。《尔雅》早在东汉时已有了几种注本，但后来都亡佚了。现存完整的《尔雅》注本，以东晋郭璞（公元276—324年）的《尔雅注》为最早。到现在为止，为郭注作疏的，要算清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最为详瞻。

《尔雅》出来以后，在三国魏明帝时，有博士张揖撰《广雅》上中下三卷。唐以来析为十卷。篇目依据《尔雅》，但力求增广其所未备，故名《广雅》。清人王念孙有《广雅疏证》，订讹补缺，由音求义，极为精审。

《尔雅》出来以后，到了公元前一世纪末年，又有杨雄编撰了一本名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为《方言》。此书十三卷，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不单是记录下来许多地区的方言，而且能够就时间观念即异求同，条分缕析，极便于今人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参考。现有经时人周祖谟校检的《方言校笺及通检》，极便使用。

此外，东汉末年三国吴国刘熙著过一本著名的探求字（词）来源的《释名》。此书有二十七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来的撰著此书的理由和目的。他在序言里说：“名之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释名》用同音字或音近字作释义的主要手段。用跟某字音同或音近的字解释某字的意义叫做声训。声训并不是刘熙创始的。这在上文早就一再提到了，但刘熙在这书中使用得更广泛、更深入，这总算是他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

从哲学和文论的传统认识 《文心雕龙》的唯物主义性质

韩 湖 初

关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是属唯物还是属唯心的性质，目前正在深入探讨研究之中。本文拟从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两个传统再作一些探讨。

一

《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还有美学思想）深受《易传》的影响，这一点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易传》的哲学思想，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唯物的。因为，在《易传》那里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只有万物在其中生存的世界，它是不断地运动着、变化着的，这一运动变化又是不可穷尽的；它既没有第一原因，也没有最后的终结，其变化的动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而不是什么精神力量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曾经称赞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人们把世界描绘成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画面，《易传》所描绘的世界也正是这样一幅画面。^②

《易传》的唯物思想在两汉得到了发展。当西汉的董仲舒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宣扬“天人感应”说，把“天”（自然）说成具有意志的人格神时，《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就明确提出“天道自然”的思想。如说：“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列星朗，阴阳化，非有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泰族训》）又说：“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原道训》）到了东汉，为了进一步加强思想统治，统治阶级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一步发展为诬纬迷信之说，唯心主义神学烟雾弥漫，而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继承了“天道自然”的思想，同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反复申述“自然”，如说：“自然无为，天之道也”（《论衡·初稟篇》）；“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生，此则无为也”（《论衡·自然篇》）；“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人君无事，四时自然”（《论衡·寒温篇》），等等，很明显，王充的“天道自然”思想与《易传》、《淮南子》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文心雕龙》的宇宙观正是继承自《易传》到王充的“天道自然”思想而来的：

（一）《原道篇》关于宇宙构成和发展的论述显然是承袭《易传》的“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说。刘勰又认为：整个宇宙是始终在不断运动、更新和发展的。如《物色篇》把自然界的变化描述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丽辞篇》把天地如何运动说明为“宛转相承”、“日月往来”，《时序篇》还把文学的不断发展形容为“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等等。可以看出，刘勰不但认为天地万物是变化着和发展着的，而且还认为这一发展是多样的和无穷的；

（二）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是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阴阳）的对立法则乃是天地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论说篇》云：“阴阳莫贰，鬼神靡遁”；《书记篇》云：“式者，则也。阴阳盈虚，五行消息，变化不常，而稽之有则也”，都是这个意思。《文心雕龙》一书运用了质与文、情与采、华与实、正与奇、变与通、雅与俗、奇与偶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去探讨和说明文学的规律，这正是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在文学理论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三）在刘勰（还有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看来，整个宇宙万物如此存在和发展变化乃是自然而然之事（故又称“自然之道”）。《原道篇》首段一言“此盖道之文也”、二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三言“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反复强调事物之有质必有文乃自然而然之事，也正是这个意思。

（四）关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和文学的产生发展，刘勰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与人类具有思维器官（即《原道篇》所说的“有心之器”）分不开的。荀子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为天君”（《天论》），又说“心有征知”（《正名》），已经认识到“心”（实质是大脑）的思维功能。刘勰的上述认识显然是继承荀子而来。在刘勰的认识中，人类的精神活动尽管具有高超的和永恒的意义，但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它是不能离开人体而独立存在的。《序志篇》一方面说“宇宙绵邈”之中“拔萃出类”唯“智术”，但另一方面又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便是此意。《养气篇》说用脑过度，会弄到“神疲而气衰”；《体性篇》说：“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把人体生理上的物质运动（“血气”）说成是创作风格的物质基础，这些认识我们都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显然同范缜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一致。关于文学的产生，刘勰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精神活动（即思维）的能力，在外界的作用下，出于抒情的需要，文学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便是这个意思。这一认识乃是“天道自然”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同时，它又是与刘勰对先秦以来的“心物交感”说的继承分不开的（下章将谈到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刘勰还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又是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和外交活动等因素的作用分不开的。如果说，《通变篇》是侧重文学的自身的继承和创新看文学的发展变化，那么《时序篇》便是从上述角度看问题，并把从原始时代至晋宋文学如何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和外交活动的影响作了具体的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述大部分基本上符合实际的，贯穿其中的基本观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还为今人所乐于引用，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主要倾向

是唯物的。刘勰当时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

有不少论者反复强调《文心雕龙》的总论与分论、体系与方法、思想原则与具体论点之间的矛盾。诚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矛盾的存在，问题是它显然被夸大了。从上分析可知，《文心雕龙》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其核心是“天道自然”思想。它同样贯穿于文学起源论、发展论、文质论、通变论、风格论、声律论等等之中，总的来说是不矛盾的，充分显示它确是体大虑周之作。又如，有些论者揪住“神理”、“河图”和“洛书”的问题不放，从而坐实《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唯心的或者是心物二元的。姑且不说这些问题在全书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和次要的问题，即使就问题的本身而论，只要从“天道自然”的哲学思想传统来考察，问题也就不难解决。其实，所谓“神理”，意即神妙之理而非神秘莫测之理。它是我国古代的数理哲学，即《周易》用以说明事物的对立统一法则的易数之理。^③ 我们的祖先正是运用这种数理哲学去说明天地万物变化的多样性和无穷性的。它与“自然之道”互训。^④ 换言之，天地万物的变化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又是遵循对立统一的法则并具有多样性和无穷性。《文心雕龙》的写作正是与这个古代的数理哲学的指导分不开的。^⑤ “河图”、“洛书”的问题，如果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礼记·礼运》正义引《申侯握河纪》云：“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可见“河图”与八卦是二而一的东西。孔安国也认为河图就是八卦。^⑥ 又《尚书·顾命》云：“河图陈于东序。”范注云：“案河图与大玉夷玉天球并陈，意者天球如浑天仪之类，河图如舆地图之类，虽历代相传，不必真是神秘之宝器。”^⑦ 范文澜先生推测河图是一种古代的自然科学仪器，这并非瞎猜。鉴于八卦是用阳爻一与阴爻一去演算《周易》的数理哲学，据上引《礼记》和孔安国之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河图（还有洛书）很可能是我国古代用图形和数字相结合来阐明易数原理的自然科学仪器，它历代相传。古人觉得它所演算的数理很神妙，鉴于当时认识水平不高，故多少被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这是我们无须否认的。即使这样，我们也要看到：不少思想家对此也是认为从来如此、一切皆自然而然的。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说：“河出图，洛出书，……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笔墨而为图书乎？天道自然，故图书自成。”王充正是这样认识的。《正纬篇》云。“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龙马出而大《易》兴，神龟现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即“神通”、“天命”与“神理”，和自然之道都是同一个东西。从《易传》——王充（两汉儒家经古文学派）——《文心雕龙》，其天道自然的思想一脉相传。现在有些论者把“神理”理解为神秘的精神力量，有的论著还把它类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是不符合上述哲学思想传统的实际的。事实上在《文心雕龙》全书除了少数地方理解不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神秘的精神力量或“绝对理念”如何起作用、如何“外化”的论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切都是“自然如此”的思想。

二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⑧在研究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时，我们不应该脱离刘勰赖以建立其理论体系的，早在他以前许多代人的思维中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我想，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刘勰能建立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文学艺术的朴素的唯物观点。《礼记·乐记》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又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里已经明确地阐述了以下几点思想：（一）乐离不开音，音离不开声，艺术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手段；（二）有声不等于有乐，只有当声有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当它既有一定差异矛盾（变），又有一定的统一性（“方”），才能产生乐；（三）“心”（思维器官）在艺术的产生和创作中具有重大作用，艺术（乐）乃是环境作用于人的头脑（“心”）的产物，是“心”感于“物”而动的结果；（四）艺术（乐）的变化发展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人们也就可以通过艺术考察社会政治生活的状况：“审音以知政”，这些观点不但具有明显的唯物性质（尽管它们是朴素的），而且已经是初具规模，互相联系的。还应指出，《礼记·乐记》的这些观点在先秦并非一家之言，在荀子那里亦有类似阐述。如果我们把《文心雕龙》与《礼记·乐记》的上述观点予以对照，就不难看出二者的继承关系。如对“心”在艺术活动中的作用，刘勰是继承了《乐记》的观点予以发挥的，《乐记》和荀子的这些朴素的唯物观点在两汉得到了重大发展。如《汉书·艺文志》总结汉乐府的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显然是把《乐记》的观点创造性地运用于对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分析。《毛诗序》受《礼记·乐记》的影响更是明显，有不少句子还原文照抄，后汉郑玄在《诗谱序》中把《诗经》分为“有颂声兴焉”的“盛世”之作、“陵迟”之后“政教尤衰，周室大坏”的“刺怨相寻”之作，不是孤立地去分析，而是联系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去考察，显然，刘勰所写的《时序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去展开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认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最大成就是形成和建立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这项工作首先由陆机在吸取了前人成果上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而由刘勰和钟嵘继续完成。陆机的《文赋》尽管偏重在写作技巧上论述问题，为此他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甚至还被扣上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的帽子，但是，只要我们细察《文赋》，特别是其序言，就不难发现：他对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述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的，他在序言中

说：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陆机在认识上和创作上所坚持的路线是“物→意（情）→辞”的路线。他认为：作文的主要矛盾，一是辞不达意，二是意不称物。前者主要是写作上技巧的问题，后者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由此陆机认为，解决写作上的矛盾，不但对客观对象要先有一个认识，而且必须熟练地掌握写作技巧，做到辞能达意，这可以说是《文赋》的总纲，它象一根红线贯穿整篇《文赋》之中。他论述写作过程是先说作者如何感四时观万物，然后慨然投笔。论到构思时先说如何“收视返听，耽思旁讯”，在写作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等等，都是“物——意（情）——辞”的唯物路线的具体体现。应该指出：陆机对创作的酝酿和谋篇布局、考辞造义等等写作中种种问题的探讨都是在这—总纲指导下进行的。由此可见，陆机的《文赋》已经创造性地把先秦的“心物交感”说运用于阐述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刘勰正是在继承陆机的这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其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清人章学诚云：“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昌论文心。”^⑨这是很有见地的。除上引《明诗篇》“人禀七情”云云，《物色篇》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等等，都清楚地表明：刘勰的文学理论是继承先秦《礼记·乐记》以来的“心物交感”说的。王元化同志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指出：“刘勰在《物色篇》中采取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说法。从‘物’、‘情’、‘辞’三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去阐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文学主张，肯定了外境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了创作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看法”，这一阐述很有见解，相当精辟。但继而又说这种见解“为陆机钟嵘等人所未发”，并在前此引陆机所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引钟嵘《诗品序》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说这些“都是标明诗人缘景生情的名句”^⑩这就未免低估了陆、钟所说的意义，而且割裂了陆、钟、刘三人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也就导致低估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及其意义。事实上王元化同志所引陆、钟的名句，都不是偶然冒出一时佳句，而是与他们立论（陆机偏重创作论，钟嵘偏重批评论）于先秦以来的“心物交感”说的基础分不开的。除了我们上述所引之外，《文赋》中“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呈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僂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园，期穷形而尽相”等等，都是没有离开主客体两方面去论述的。尽管对其中有些字义尚有不同解释，但基本上已经包含了刘勰所说的“写气图貌”一段话的意思，只不过刘勰更明确地分别从主客体两个不同角度说得更好。至于说到钟嵘，他的文学理论的唯

物倾向更是明显。他在《诗品序》中不但说到“物”之感人从而产生诗，而且还进一步具体论述了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斗争（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等等）如何作用于诗人的心灵，使之“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一论述显然要比刘勰说得更为深刻，是对先秦“心物交感”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因为它已经接触到诗歌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斗争的关系问题了。钟嵘不但说了“气”如何感人，还说诗人“应如何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详尽写物，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正是分别从主客体两方面去论述问题的，如果我们不是把陆、刘、钟三人的文学理论孤立地去考察，而是把他们三者看成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文学理论整体，那么，我国古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体系之唯物主义性质便是显而易见的了。换言之，三者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无论在创作论、批评论、发展论、风格论等等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这一理论体系的总纲就是《文赋》序言所说的“物——意（情）——辞”，三者在这一总纲之下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它的出现，在先秦已有萌芽，在两汉得到初步发展，到魏晋而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而非出于偶然。

①拙稿《略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于1983年7月寄交同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现接通知已收入《文心雕龙学刊》第三辑。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概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23页。关于《易传》对世界的描写，如：《序卦序》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继）之以‘屯’。屯者，盈也，万物之始生也；”《系辞下》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生生之谓易”；《彖下传》解释《恒》卦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等等，都是肯定世界的物质性、运动性和对立统一法则的。

③参看刘蔚华：《谈易数之谜》，载《中国哲学》第6辑（三联书店出版）。

④⑤参看拙稿：《〈文心雕龙〉“太极”辨析》，载《学术研究》1983年第4期。

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正纬篇》注〔三〕〔四〕，见该书第一卷第35—36页

⑦同⑥注〔十四〕，见该书第一卷38页。

⑧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85页。

⑨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⑩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72页。

海南岛教育发展的战略和战术

林 尤 照

新的技术革命对海南的挑战，与海南在开发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除了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外，资金不足、科技落后、人才奇缺是海南经济起飞、社会发展的三大障碍，其中尤以人才问题最为严重。因此，教育改革与人才开发是加速建设海南的极其重要一环，也是海南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挑战的一项根本对策。

海南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挑战的教育对策，从根本上说来，就是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从海南的实际出发，确定教育改革的具体战略战术，以建设一个既有持续稳定、又有应变能力的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海南实际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一、在战略上实现“四个转变”

四个转变，即开发战略转变、教育制度转变、教育结构转变和教育思想转变。

开发战略转变，就是海南的开发必须由只重视自然资源、基本建设等“硬件”的开发，轻视智力资源、文化教育等“软件”的开发，转变为“硬件”开发与“软件”开发同步进行，“软硬兼施”。“硬件”开发与“软件”开发，是海南经济起飞的两张翅膀，是海南社会进步的两条腿。要从领导思想到民众意识，从开发决策到开发投资，来一个彻底的转变，真正确立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重点地位。这是海南的教育对策的根本前提。

教育制度转变，就是由封闭式传统的学校一次教育制度，转变为开放式社会终身教育制度。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校班级教育，其特点是封闭集中、标准同步，一次完成。这与新的技术革命的要求是很不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是个开放性的社会，教育也必须是开放式的，函授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周末大学、假期大学，以及各种职工业余大学同时并举是现代教育的趋势，也是海南教育的薄弱环节之一。目前，海南在这方面刚刚起步。我们应该抓住这势头，放手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大力拓宽办学的路子，使全体人民都受到多渠道、多形式、多规格的教育。

教育结构转变，就是由单一化、畸形性的教育结构，转变为多层次、最优化的教育结构。海南的教育结构，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形成一个纵向结构，它在数量与规模上基本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结构，但是其中学前教育嫩弱，初等教育尚未普及，中等教育相当空虚；由于基础不牢，在人才成长各个阶段中造成恶性循环，高等教育也就难于保证高质量，这就更加深了这个恶性循环。海南的教育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又各自组成不同层次的横向结构。在中等教育这个层次里，职业教育不受重

视，发展乏力，步履维艰，与普通教育不成比例。在高等教育这个层次中，专科与本科比例也不协调。据海南一九八三年专门人才普查的统计，海南共有专门人才56,480人，其中大学本科生5689人，占10.08%，专科生9775人，占17%，中专生82887人，占58%。按有关专家的分析认为，大学生与中专生的比例1：3较为合理。显然，海南的人才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从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两个方面，调整好海南的教育结构，真正做到多层次、合比例、不拘一格出人才，使人才结构趋于合理，发挥出最大的人才结构效益。

教育思想转变，就是由面向升学、应试争分的教育思想，转变为面向社会、育人成才的教育思想，使整个教育以及广大师生、家长都从层层加码的考试重压下解放出来，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教育充满生机，人才辈出。

二、在战术上进行三个突破

根据海南的教育状况，为实现上述战略上四个转变，应在战术上进行三个突破，即进行三个改革：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和改革教学。

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突破僵硬、低效、臃肿的管理条块、机构和制度，创立灵活、高效、精简的管理体系，是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把教育工作搞活的关键。管理是一门科学，与教育、科学一起构成现代经济社会三大支柱。我国的教育管理如同经济管理一样，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管理出质量，管理出人才。在现有条件下，基本上不要增加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要管理搞上去了，教育完全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当然，从更大规模上发展教育，追加投资仍是十分急迫的）教育管理体制最核心的问题，是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改革学校的人事制度。应该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干部任期制；实行人才流动，促进人才交流；实行工作岗位责任制，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有利于挖掘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潜力（特别是要挖掘高等学校和重点中小学的办学潜力），有利于发挥各个方面的办学积极性。

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突破全日制普通中学单一化的模式，大力发展中等专业职业教育，是促进教育面向经济，适应经济改革的迫切要求。根据海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管理结构的情况，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海南的确需要一批高级科技专家和管理专家，作为海南科技力量和管理队伍的带头人。但是，最急需而且需要量最大的还是初级、中级专业人才。就以农业战线而论，海南农村有312个区、2312个乡，倘若每个区建立一个有10名中级农业技术员的农技推广站（还不包括农机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等），每个乡平均有5名初、中级农业技术员，这就需要初、中级农业技术员一万五千名，加上千百个专业户、重点户以及区乡管理干部、农村机电、财贸、交通、文教卫生和区乡企业所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整个农业战线所需要的初级、中级技术人员将是一个庞大的数量。这就迫切需要一方面继续创办一

批农业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把一批农村普通高中改为农业中学，培养大批既有普通高中基本文化水平，又掌握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懂得生产经营管理知识的农业后备军。在工业、财贸、交通、旅游等部门，也都急需大量具有中等文化程度、懂得适用技术的初级、中级专门人才和劳动大军。因此，只有海南的中等教育实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职业教育大繁荣之日，才是海南经济大起飞之时。

改革教学，突破传统的教学论和教学法，建立一个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环境，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来没有表现得象今天这样突出和尖锐。由于传统教学的束缚，以往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书生型的多，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少。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有知识的，有适应能力和富于创新的一代人”。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常说，“时间就是金钱”，而现在则说，“主意就是金钱(Idea is money)”；过去衡量一国的强弱是视资本的多少，现在却看人才的多寡，人才便是资本。这种观念上的变迁，既预示着软件等知识密集的产品将是未来市场角逐的主要战场，也说明创新精神的重要，勇于开拓，主意巧妙，机会利用得当，便能后来居上，甚至可以做到首先发明的是你，而最终发财的是我。海南是较落后的地区，各方面起步较晚。但不是不能赶超。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使他们成为一代富有创新精神的开拓者、赶超者是教学改革立足点。上述三个领域的改革，前两者是属于宏观的改革，后者是属于微观的改革。以此三个领域作为突破口，带动、促进整个教育改革，这应成为我们的战术决策。

三、建立一支素质良好的教师队伍

决定学校教育质量方向的是教师。教师的政治素质、思想修养、学问造诣和教学艺术水平如何，对人才的培养关系极大。新的技术革命对教育的挑战也突出的表现在对我们教师队伍的素质的挑战上。海南的教师队伍，特别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存在着两个最突出的问题：一是人心不稳，二是水平不高。所谓人心不稳，就是一调二转：要求调动，要求转行。在山区的要求调到平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要求调到汉区，在农村的要求调到县城，在各县的要求调到海口，在外县的要求调回本县，在本岛的要求调到大陆。中青年教师要求转行，师范毕业生也要求转行。据有关方面材料，“文革”前分配到海南的大专毕业生一万四千多人，已经离开海南的约一万一千人。在这么严重的人才外流中，中小学教师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琼海、定安的教师队伍中，“文革”前从大陆分配来的大专毕业生188人，已调离海南的108人，占79.2%，现有的80人中，又有20人正在申请调动，占现有人数的66%。陵水县中学教师中“文革”前的大专毕业生，从1979年至1988年就有62人调走，现全县仅有本科毕业生22人。白沙县的中学教师原有“文革”前的本科毕业生47人，1979年来调走了41人，剩下6人中又有3人正在申请调动到大陆去。据悉，从前年海南机构改革以来，汉区中小学教师调走和转行的就有825人之多。

海南中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水平不高的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据统计，海南现有高中教师2,023人，本科毕业的592人，占29.2%；初中教师7,027人，专科以上毕业的1,941人，占27.6%；小学教师26,401人，中师以上毕业的8408人，占31.9%。有些县中学政治、地理、历史、化学和英语等学科连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都没有。从教学工作看，中小学教师队伍总的情况是，胜任教学工作的占1/3，经过训练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占1/3，完全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占1/3。

海南以如此人心不稳定、水平不高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维持目前较低的教育质量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更何论面对新的技术革命之挑战。因此，采取强有力之措施，扭转海南教师队伍如此严重的被动局面，加强教师队伍之建设，已经成了我们一项刻不容缓之任务。要建设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最主要的是抓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改革师范教育两件事。

尊重知识，尊师敬道，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在教师队伍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广大教师说，他们目前并不要求特殊的待遇，只希望社会对他们一视同仁。社会上的确存在着歧视教师的风气，现行的某些做法也有对教师不公之处，应该加以革除。如中小学教师对职称问题反映就十分强烈。同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搞工的是工程师，搞农的是农艺师，搞医的是主治医师，搞科研的是助理研究员，搞高教的是讲师，唯独中小学教师没有职称，这不是对他们不公吗？与社会地位相联系的是经济地位。广大教师工作是比较清苦的，在生活福利、医疗保健、夫妻分居、家庭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后顾之忧，影响他们工作积极性，损害他们的健康，妨碍他们学习提高。在海南，中学毕业生同各地一样不愿报考师范院校。这样，师范学校学生的来源和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因此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使我们的教师具备更高的素质，是改革师范教育的核心和根本目的。过去我们的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教师，文科的基本上不懂自然科学，理科的对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不感兴趣，知识面窄，知识结构单一，很难适应未来的要求。现在已经提出要让中学生学习使用计算机的要求，微型机的普及已经为期不远了。面对这种形势，师范院校应该成为新的教育思想的摇篮，成为学习和传播新知识、新观念包括电子计算机这种被称之为人类“第二文化”的基地，成为造就一代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工作母机”的“工作母机”。

海南孤悬海外，更显人才难得，更应爱惜人才。海南当然要大力引进人才，但根本出路还是自己培养人才。对于教师更是如此，一是用党的政策去“激发”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二是“造就”他们，使他们成为站在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挑战最前沿的新一代“师表”。这样，建设好了教师队伍，海南的人才开发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海南的教育以至整个开发建设就一定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哲学简明教程》评介

方里

张江明主编的《哲学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为干部正规化理论学习而编写的一本教材。这本书出版不到半年,已接连印刷三十九万多册。它的出版,不仅对广东省干部的正规化理论学习,将起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哲学工作者也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

《教程》共二十六万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基本规律和范畴,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和阐释。编者既注意保持全书内容观点的系统性、科学性,又注意章节、体系的连贯性和逻辑结构的严密性。这本书具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色。

首先,《教程》自始至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较强的针对性。

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编写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要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思想工作要富有战斗力、说服力和吸引力。要做到这些,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要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使它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一定要解决好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教程》正是在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花了力气,因而显示出它的特色。这本教材分十六章,几乎每一章都划出一定的篇幅就各章所论的观点,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哲学的论证,从而提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这本书在第一章,就首先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不但说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强调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有的干部认为哲学离实际工作

甚远,学不学都无关紧要。针对这种思想倾向,教材说明哲学基本问题在人们的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我们做工作,搞建设,从哲学观点来说,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正确处理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要做好工作,关键就在于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解决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要客观符合主观,还是要主观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是搞主观主义,还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在实际工作中是一定要碰到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教程》结合干部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实际,从方法论的角度,启发人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这样理论联系实际地说明哲学和实际工作的关系,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就显得通俗易懂,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问题。在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上,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有的人认为,精神文明是手段,物质文明才是目的。还有的人认为,精神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派生出来的,在我国目前物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不必谈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到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教程》针对这两种错误认识,根据十二大文件精神,全面论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又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的。这样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证,既符

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原理，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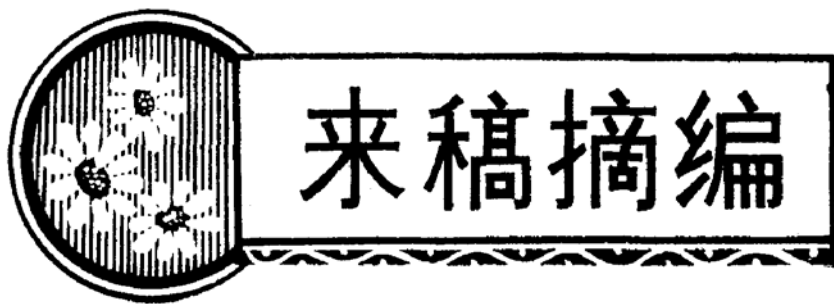
其次，《教程》注意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

例如，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规律的特点时，在肯定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适用于任何社会的前提下，着重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规律的特殊性。该书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点，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本特点是非对抗性；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自觉地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生产资料公有制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劳动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内部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已不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一段比较长时间里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甚至还要实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就明显地脱离了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对抗性矛盾，但这些对抗性矛盾并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国际阶级斗争在国内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遵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正确而妥善地加以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主观犯错误，也可使矛盾激化，由非对抗转化为对抗，对此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探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的阐释，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有助于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尤其是“左”的倾向的影响，有助于提高人们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恢复和确立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从而牢牢掌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规律的特点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未深入进行研究。在全党全

国全力以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是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教程》对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质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采取逐渐过渡的非爆发飞跃形式实现的；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的伟大任务的完成，是通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逐步实现的；三、社会主义社会中质的飞跃主要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的形式进行。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教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切面和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横断面去论述把握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规律特点的深刻意义，是富有启发性的。《教程》指出，这种非爆发式和逐渐过渡的飞跃形式，就我国来说，不仅适用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更适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到社会主义高级发展阶段，以及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同时，这种非爆发式飞跃因为是逐步过渡的，从这种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另一种质，因而工作秩序、生产秩序能正常维持，社会比较稳定；它有利于群众从实践中逐步提高觉悟，脱离旧的生产关系和生活习惯，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它也有利于发挥同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以及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中新质要素的作用，因而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程》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通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进行的，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自觉而有步骤地改革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部分质变，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这样把质量互变规律的哲学理论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变革联系起来论述，就有助于人们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当前尤其有助于提高人们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自觉性。

这本书从总的方面看是编写得成功的，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有些理论问题只是粗略地提了出来，未有深入进行论证。同时某些观点、见解的表述，仍有一般化或雷同的弊病。这类不足的方面尚须改进。



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 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姜 明 安

我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法学体系，主要应该遵循下述原则：

第一，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应该与我国国家管理体系相适应。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法，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国家管理（确切地说，是国家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关系，即行政关系）。应该说，行政法学的体系应该与行政法的体系相适应，而与国家管理体系相适应的则应该是行政法的体系。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提出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应该与我国国家管理体系相适应，这不仅因为行政法的体系与国家管理体系是相适应的缘故，而且还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我们研究法律不应该仅仅限于考察法律文件（象资产阶级纯粹法学派所主张的那样），而且应该考察决定此种法律文件的各种社会事实和社会关系；我们不应该仅仅限于解释和说明现有的法律文件，而且应该通过对具体社会事实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作出对这些法律文件的评价，并提出完善各具体管理领域法制的有说服力的建议意见。很显然，要这样研究行政法，我们的科学体系就应该与实际的管理体系相适应。此外，在我国目前现行行政法律文件极不完善的情况下，按照国家管

理体系来安排我们的行政法学体系，从探讨改善国家管理出发来探讨完善行政法制，从探讨完善各管理领域、管理部门的行政法制出发来探讨完善整个行政法制，有着特殊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们知道，国家管理体系通常由纵的管理程序和横的管理部门构成。我国国家管理纵的管理程序一般可以分为下述环节：设立机关，配置工作人员，发布管理文件，实施行政行为，为保证管理文件及行政行为的实现而适用奖励和处罚措施，对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行政活动实施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行政活动包括制定管理文件，实施行政行为，采用奖惩措施三个方面）我国国家管理体系横的方面一般可分为下述部门：国民经济管理，社会文化建设管理，公安管理，民政管理，司法管理，国防管理，对外关系管理。

适应我国国家管理的体系，我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即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部分，研究国家管理体系纵的方面的各个环节上的行政法制问题。这一部分可包括如下章目：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工作人员，行政活动，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第二部分为分论部分，研究国家管理体系横的方面的各个部门的行政法制问题。这一部分可包括与上述国家管理部门相适应的章

日，即国民经济管理，社会文化建设管理等。

第二，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应该与我国实际政治法律制度相适应。我国政治法律制度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更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研究我国的行政法学，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行政法学体系，一定要适应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例如我国的干部制度就不同于西方的文官制度，西方的文官一般不包括由选举产生的、与执政党共进退的政府官员，也不包括法官。文官和所谓“政务官”有着严格的区别（规定文官任用、考核、培养、奖惩、工资福利待遇的文官法不适用于政务官和司法官）。它们行政法研究文官制度总是把政务官和司法官排除在外。但是我国的情况却不同，我们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我们的干部，不论是一般干部，还是总理部长，不论是行政干部，还是司法干部、科技干部、企事业干部，都是统一管理的。关于各类干部的任用、考核、培训、奖惩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虽然也存在着区别，但是却不存在西方国家那样的鸿沟。因此我们的行政法学研究国家工作人员一章，不应仅仅研究行政人员，而应该研究我们的整个干部制度。因此这个制度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十分密切地联系着的。又如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法制监督，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制度。我们的行政法制监督包括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专门行政监察机关的法制和纪律监督。我们的行政法学体系在确定这一专题的范围时，显然应该把这些内容有机地组织起来统一进行研究，而不应该从整个行政法制监督中仅仅辟出专门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来研究。此外，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行政法学体系中行政诉讼一章的范围，结构亦应与我国的实际制度相适应，而不能盲目仿效外国的体系。不能认为只有根据外国的体系、前人的体系建立的行政法学才能叫做“行政法学”，我们据根自己的情况建立不同于它们体系的体系就不象行政法学了。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我们就只有抛开和不顾及我们自己的国情而改造我们的制度，使之去适应某种“标准体系”，或者抛开和不顾及我们制度的实际情况而任意地或牵强附会地去解释我们的制度，使之去适应某种“标准体系”。

第三，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应该与完善我国行政法制，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相适应。我国行政法学目前的任务不能仅限于研究现有的行政法律文件。因为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还不完善。我们现在建立的行政法学体系，不应该完全与现有的行政法律制度及其规范相适应，而应该与完善这种法制的需要相适应。又因为完善这种法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我们建立行政法学的体系最终要与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相适应。资产阶级行政法的目的是控制政府，再加上它的私有制的基础，因此它的行政法的基本方面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由此决定了它的行政法学也是消极的。这种情况反映在它的行政法学体系方面，就是它们的行政法学一般没有分论方面，即讨论具体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管理问题的部分。即使有分论部分，则也多限于讨论警察行政问题，即如何通过法律限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此外，资产阶级行政法学的总论部分很少讨论国家行政机关的科学设置，国家工作人员的科学管理和如何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问题，而往往把重点放在控制行政权行使和行政诉讼问题上。我们的行政法学显然就不能以此为模式，而必须在研究行政法总论的同时，加强分论部分的研究，即总论分论并举。并从着重探讨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来安排整个行政法学体系，来确定总论分论的章节和各章节的内容和重点。

第四，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应该与目前我国教学科研的状况相适应。行政法学在我国还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的学科，目前从事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的人员还不是很多，而且研究的深度亦很不够，对这门学科的对象、范围的认识也很肤浅，对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把握得也还不很准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它的研究范围比严格意义的行政法学的范围要稍宽些。我们在研究这门学科时，可能要涉及社会学、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学的某些问题。特别是行政学，它与行政法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目前这两门学科尚不发展且我国行政法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研究行政法学时同时研究行政学更属必需。只有在研究行政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出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法制的正确途径。

旧中国市建制设置概述

田 穗 生

“城市”和“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是指那些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方，是个地理、经济概念；它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是国家按一定的条件，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一种行政区域，是个政治、法律概念。作为一种行政区域建制，我国的市是在辛亥革命后才出现的。但是，最早将城镇与乡村在行政上予以区别，则是清朝末年的事。

1905年，清政府派出专使分赴欧洲、日本各国，考查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制度。后于1909年1月18日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以府厅州县治城厢为“城”，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屯集等，人口满五万以上的为“镇”，不满五万的为乡。同年，又另订《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内容与前者大同小异。这两个章程，是我国市建制设置的开端。章程所包含的有关内容，对我国以后市建制的设置有重要影响：第一，它第一次从行政管理上将城乡区分开来；第二，它所提出的设置“城”、“镇”标准中包含的因素（人口数量条件和政治条件——府州厅县治城厢），其后为我国各种市制所采纳；第三，它突出京师所在地方的“城”和区分“城”、“镇”，是市在行政地位上分为不同等级的渊源。

辛亥革命后，江苏省于1911年11月召开了临

时省议会，会上通过了推行地方自治的《江苏暂行市乡制》。它基本上是仿效《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但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第一，它规定凡县治城厢地方为市，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市，不满五万为乡。它用“市”这一名称统一取代了“城”、“镇”；第二，它规定市乡地方以后若因人口增减，市不足四万五千，乡超过五万五千者，经市乡提出申请，由省都督府改变之，权限属于省而与中央无关。自从江苏首先采用“市”作为行政区域建制的单位后，各省先后仿效，最终为全国所接受。

1921年，广东省将广州市政公所改组为市政厅时，颁布了《广州市暂行条例》。这一条例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普通市组织法》和《特别市组织法》的蓝本。该《条例》规定：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域，直隶于省政府，不入县的行政范围。这些都是市建制设置中的一个新的发展。

1921年7月，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飭内务部以“大总统教令”形式，颁发了一个《市自治制》，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市建制设置的正式文件。次年又制订了一个市自治制的施行细则。根据该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之规定，首都、省会、商埠、县治城厢及其他满一万人口以上的地方得设市；市分为普通市和特别市两种。它规定：特别市由内务部呈请中央政府以政令定

之，其他市为普通市。普通市受县知事监督，所选出的市长由县行政机关委任；特别市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监督，所选出之市长由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呈请内务部任命；京都市由内务部监督，其市长由内务部遴选，经国务院总理呈请大总统任命。这种市建制虽没能施行，但市种的区分对于以后的市建制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南方有些省在推行地方自治的口号下，先后颁布了各自的“省宪”，有的“省宪”对地方自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市建制的设置也被加以列举。如1922年公布的湖南“省宪”，其第十一章为《市乡自治制大纲》，规定市分为三等：省内都会商埠人口满二十万以上者为一等市；人口满五万以上不及二十万者为二等市；人口满五千以上不及五万者为三等市。一等市受省监督，二等市受县监督，三等市的行政地位则无明文规定。湖南“省宪”规定的市制是唯一将省内的市分为三等的市制。

如果说，从清末民初到北伐战争，是我国市建制设置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么，北伐战争结束后，我国市建制的设置便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全国有了统一的市制，市建制设置的权限集中于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于1928年7月3日颁布了《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这是我国第一个通行全国的市制。它规定，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特别市的设置经国民政府许可，直隶于中央政府，不入省的行政范围；特别市的设置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1）首都；（2）人口在一百万以上；或（3）其他有特殊情况之都市。普通市的设置，由所属省政府呈请，经国民政府特许，直隶于省政府，不入县的行政范围；设置普通市的条件是人口必须满二十万。按照这两个组织法，当时全国共设有8个特别市（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汉口、天津、哈尔滨、青岛）和杭州、苏州、长沙等17个普通市。

1930年5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一个《市组织法》，代替以上两个组织法。它将特别市改称院辖市，普通市改称省辖市（省辖市一名起始于此）。最重要的是修改了设市的条件，它规定，院辖市的设置必须符合原规定的三个条件之一，并规定省政府所在地虽符合设置院辖市条件，亦应隶属于省政府为省辖市，省辖市的设置条件则改为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1）省

会；（2）人口在三十万以上；（3）人口在二十万以上，所收营业税、牌照费、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者。实行新的《市组织法》后，全国设置市建制的城市大为减少，1932年全国仅有4个院辖市（南京、上海、北平、青岛），9个省辖市。

1943年5月国民党政府对《市组织法》进行了一次“根本修正”。把省辖市的原三个条件改变为：（1）省会；（2）人口在二十万以上者；（3）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重要，其人口在十万以上者。同时还取消了省会不设院辖市的规定。经过这次修改，院辖市和省辖市的设置才逐渐增多。

为了解决市建制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曾在1947年12月拟订了《直辖市自治通则》草案和《市自治通则》草案，两个通则草案提出的改变有：

一、市分为三种：甲种市为直辖市；乙种市为省辖市；增设丙种市为县辖市。首都划为特别行政区。

二、甲种市设置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1）人口在五十万以上；（2）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有特殊情形者。但省会所在城市除外。甲种市受内政部指挥监督。

三、乙种市设置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1）人口在十万以上者；（2）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地位重要者。乙种市受省政府指挥。

四、丙种市设置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1）人口在一万以上者；（2）在军事上、经济上有重要作用者。丙种市受县政府指挥。

五、甲、乙两种市之置废及区域的划定变更，由中央政府核准；丙种市的上述事项由省政府核准，报内政部备案。

六、市之区域应分为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两种，经济区域应以市之经济势力所及之区域为范围。对经济区域内之特定经济事业，市透过其主管监督机关，间接统筹与辅导，不直接指挥。

上述改变，是国民党政府原有市制阻碍市建制设置的发展、轻视小城市建设和撕裂城乡经济关系的反映。这二个通则草案在市建制设置方面提出的问题，对于我国今后市建制的设置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

段立生

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是世界上现存的一本最早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情况的专著，据作者亲历其地的见闻而录，以其记载的翔实可信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遗憾的是关于周达观本人的情况，史籍阙如。不仅《元史》无传，就是从他家乡的方志——《浙江通志》和《温州府志》中，也难寻觅到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只言片语。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真腊风土记》的作者时，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达观，温州人。”清人吴翌凤手写本《真腊风土记·跋》说：“达观，一作建观，元人，自号草庭逸民。其表字、官爵，不可得而详也。”关于周达观的身世，所知仅如此而已。

显然，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对周达观这样肤浅的了解，这跟他的卓越贡献和《真腊风土记》的学术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下面是我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提供出来，以见正于史学界。

关于周达观的名字，据夏鼐先生的研究，吾邱衍《竹素山房集》卷二，有题作《周达可随奉使出真腊国作书记风俗因赠三首》的诗。如果“可”字不误，则达可当为达观的别号。至于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周建观”，则建字显系达字之误。”①夏鼐先生的意见是对的。建字和繁体的达字外形相似，容易误刻。钱曾是明末清初人，吴翌凤则是清嘉庆年间人，故钱曾《读书敏求记》错刻在前，吴翌凤手抄本《真腊风土记》袭误于后。“达观，一作建观”，这种说法应予摒弃。至于“可”和“达”，无论从字音或字形来看，差别甚大，当不致误刻。达可很有可能是他的原名，而达观则是他从柬埔寨返回和著《真腊风土记》以后才改的名字。达观，可以“随遇而安”作解，还含“遍观”之意。《书·召诰》曰：“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蔡沈集传：“遍观新邑所经营之位。”②周达可于元贞丙申（1296年）七月抵达真腊，在那

里逗留了一年，“其风土国事之详，虽不能尽知，然其大略亦可见矣。”③他用达观之名题署《真腊风土记》，意即遍观真腊风土。书成之后，送交当时寓居杭州的著名诗人和学者吾邱衍过目，吾邱衍备加推崇，作诗三首以赠。因达观新名尚不为时人所知，所以吾邱衍仍称他的旧名周达可。至于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当是更晚一些时候的事了。

周达观的生卒年月，史无明载，但我们可以根据现存材料，推测一个大概。据周达观自己叙述，他随使赴真腊是在1296年。④这个时间是不会错的。关键是当时他有多大年纪？吾邱衍赠周达观诗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异域闻周化，奇观及壮年。”⑤可见周达观的真腊之行正当壮年时期。因而，1296年倒推三十年，周达观生于1266年左右，即宋咸淳年间。至于卒年，周达观于元顺宗至正六年（1346年）还为林坤《诚斋杂记》亲笔作序，⑥说明此时尚还健在，但已是八旬老翁。周达观辞世当在此后不久。

关于周达观的家世亦无直接材料。有人撰文说，“周达观出自浙江永嘉望族。”⑦虽然该文没有提示必要的依据，但从周达观为林坤《诚斋杂记》所作的序言中可以得到印证。序言开头说：“余家藏《诚斋杂记》，记事甚奇，目所未见者什九，第不著集者姓名。近览《孤穴余编》，有会稽林太史载卿者，少好程朱之学，以诚意为人道之要诀，故额其斋曰诚。”⑧试想，一个拥有藏书的家庭，怎会是寒素人家？周达观出身望族是很有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周达观本人没有当过官，他出使真腊是作为钦使随员的身份，并非朝廷命官。后来自号草庭逸民，正好反映他结庐草庭，无官无职，以逸民自居的生活情况。

从周达观和吾邱衍的交往，可知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吾邱衍“号贞白处士，性放旷，高不事之节，自比郭忠恕，倨傲玩世，遇人

巧官善富如虫蛆臭腐，将噬染己。其所厌弃者诣门请谒，从楼上遥与语，吾出有间矣。顾吹洞箫，抚弄如意不辍。”^⑨这样一位孤高自傲的吾邱衍，却十分看重周达观，“推挹甚至”，^⑩说明他们之间意气相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关吾邱衍习性品格的记载，同样可以视作是对周达观的写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周达观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他曾经用过的姓名、生卒年月、家世、禀性等，虽不敢持为定论，但在史料缺乏的条件下，或许能有点用处。

①夏璠：《真腊风土记校注》，校注者序言，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②《辞海》达观条。

③、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

⑤吾邱衍：《周达可随奉使过真腊国作书记风俗因赠三首》，见《竹素山房集》卷二，《武林往哲遗著》本。

⑥、⑧林坤：《诚斋杂记》，《津逮秘书》本。

⑦H. W. Ponder《读〈真腊风土记〉》，姚枬译注，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十三号。

⑨陆友仁《闲居录·跋》，见《武林往哲遗著》前编卷二十一。

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



“伎辩”应是“强辩”

董志翔

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读史述》韩非章云：“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伎辩召患。哀矣韩生，竟死说难。”逯钦立注云：“伎，疾忌。言君主忌辩者发其阴私，所以辩者每以召致祸患。《史记》本传独载非之《说难》，列举说辩者招致弃身、危身等祸患。”

按：逯注误矣。“伎”的本义为“固执，不听从。”后引申为“嫉恨。”《说文》：“伎，很也。”段玉裁注：“很者，不听从也。《雄雉》、《瞻印》传皆曰：伎，害也。‘害’即‘很’义之引申。”

《广雅·释诂三》：“拏、犴、愎、伎，很也。”《广雅》之体例乃罗列若干同义词，以一通用词来作释。故“拏、犴、愎、伎”都有“不听从”“固执”之义。拏，《说文》：“牛很从不引也。”《集韵》：“不从羈谓之拏。”犴，《玉篇》：“牛很也。”愎，《玉篇》：“很也。”《左传·宣公十三年》：“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杜预注：“愎，很也”亦即执拗之意。

《汉书·周阳由传》：“汲黯为伎，司马安之文恶。”颜师古注：“伎、意坚也。”“意坚”亦即“执拗”、“固执”。而寻绎陶文，“巧行居灾，伎辩召患”乃为互文，两句的主语都是“韩非”。即“韩非巧行伎辩终遭灾患”之义。“伎辩”就是“强辩”，“固执地争辩”。

康有为《蝶恋花》词辨

陈永正

康有为《蝶恋花》词云：“记得珠帘初卷处，人倚阑干，被酒刚微醉。翠叶飘零秋自语，晓风吹堕横塘路。词客看花心意苦，坠粉零香，果是谁相误？三十六陂飞暗雨，明朝颜色难如故。”风华卓绝，传诵一时，为选家所必录，然解者眇眇。张伯驹《清词选》录而不评。夏承焘《元明清词选》评云：“此词通过观荷咏离情。‘翠叶飘零’、‘坠粉零香’、‘明朝颜色难如故’等句，是对残荷的感唱，也是对人的青春易逝的叹息。”未有说明写作背景。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则谓是“戊戌失败史之缩影”。

按，康有为此词，为和梁鼎芬之作。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梁鼎芬上疏劾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劾奏，议降五级调用。遂作《蝶恋花》词题荷花画幅，以寓家国身世之感。词云：“又是阑干惆怅处，酒醉初醒，醒后还重醉。此意向花娇不语，日斜肠断横塘路。多感词人心太苦，依自摧残，岂被西风误。昨夜月明今夜雨，浮生那得长如故。”是年冬，梁氏自京回到广州，康有为因和此词，以慰友人栖迟零落之苦。“翠叶”二语，写梁氏之斥逐。“词客”，指梁氏。“三十”二语，写政治环境之恶劣及对忧国志士的摧残。



广东社会科学界纪事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月)

十月

- 5日 广东伦理学研究会成立。
- 6日 广东明清经济史研究会成立。
- 8日 广东省社联召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座谈如何进一步发挥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问题。
- 8—13日、15—20日广东图书馆学会举办两期“文献著录标准化”研讨班。
- 10—11日 广东省法学会召开关于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专题讨论会。
- 11日 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成立。
- 12日 广东中国文学学会和《学术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青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座谈会。
- 20日 广东教育学会教育研究会举行“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贯彻‘三个面向’的精神，积极开展教育学教学改革”座谈会。
- 21—29日 广东劳动学会组织会员到深圳、珠海调查。
- 22日 广东教育学会和《学术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青年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 24日 《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南方经济》编辑部联合召开“关于‘一国两制’学术研讨会”。
- 27日 广东经济学会召开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座谈会。
- 29日 法国科学院伦理和政治科学学部院士、法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巴黎第二大学荣誉教授苏珊·巴丝蒂夫，应广东省法学会邀请，作题为《外国人的地位与国际法》的演讲。
- 30日 广东省社联召开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座谈会。

十一月

- 1日 广东图书馆学会邀请广州图书馆馆长卢子辉，介绍访问美国三大系统图书馆见闻。
- 1日 广东科社学会召开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座谈会。

2日 广东教育学会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举行理事扩大会议，传达安徽省陶研会议精神。

3日 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

3—10日 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教育研究会举办“企业管理与企业诊断高级课程”讲座，邀请日本东海大学铃木博教授主讲。

5日 广东劳动学会举行“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创劳动科学研究新局面”座谈会。

7日 广东民俗学会成立。

9日 广东世界经济研究会邀请中山大学经济系方宗荫同志作《美国经济问题及访美观感》的学术报告。

13日 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应广东中国语言学会邀请，作题为《天文与历法》的学术报告。

18日 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举办自学考试咨询活动。

20—26日 中山大学、广东历史学会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一九八四年孙中山学术讨论会”。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香港地区及各省、市研究孙中山的专家、教授、学者共一百多人应邀参加讨论会。

22—27日 “周恩来同志在潮汕革命活动学术讨论会”在汕头举行。

23日 广东省民政学会成立。

24日 经济学家童大林，应邀和广东部分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

24日 北京大学岑麒祥教授应广东中国语言学会邀请，作题为《关于语言理论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

26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陈荣捷教授应广东历史学会邀请，作题为《欧西研究理学的情况和趋势》。

28日 广东农垦经济学会成立。

童大林谈广东经济研究的一些课题

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协会于1984年11月23日在省社联召开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座谈会。经济学家、国家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童大林同志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青年们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一般知识结构较新，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潮。所以，老一辈理论家应积极为他们撑腰，支持他们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依赖于理论的正确指导的重要意义：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开拓性的、探索性的，未知的领域很多，要有理论指导，才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理论搞清楚了，才能加快前进步伐；我们需要造就一代既是实干家、又是理论家的接班人。他热情勉励广东青年理论工作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争取走在全国的前面，要充满自信，要有热情，要勇于进行理论探索，深入调查研究，解放思想，对经济理论要进行创造性研究。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在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小康水平，进而达到和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最后，童大林同志提出了一些研究课题，希望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广东的实践经验，提出研究报告。

一、国内金融问题，如佛山市招股集资问题，广州市搞活经济和改造老企业中银行的作用问题，蛇口怎样利用资金，广东的金融改革问题。

二、世界金融问题，如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美元的地位及其与各国货币的关系和世界金融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等。

三、价格问题，总结广东开放价格管理的经验，并进一步研究如何解决煤和某些初级产品价格偏低，粮油价格倒挂，房租过低等问题。

四、国际物价问题，如国内物价同国际价格挂钩问题，经济特区的货币问题，各国物价变动的资料。

五、工资问题：在调查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工厂、企业和党、政、事业单位一般性的工资改革的原则。

六、税收问题，如第二步利改税实施的情况和问题，随着价格体制的改革，税收制度与之相适应的改革问题。

七、科学、教育体制的改革。

八、大中城市怎样领导经济（从宏观方面论证）。

九、特区的经济发展前景（方针），港澳经济的研究。

（谭淇明）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问题论点综述

黄绍汪

最近，《广东社会科学》和《南方经济》杂志两编辑部，在广州联合举行了一次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研讨会，四十名广东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就“构想”问题，从各个侧面进行了探讨。国内一些报刊，也陆续刊登了一些“一国两制”构想的文章。现将讨论中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重大意义的战略决策

大家认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梁判认

为，“构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八十年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它顺乎时代潮流，合乎人民心愿。曾牧野认为，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构想”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范例，显示了它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刘光璞认为，“构想”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而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运用它，许多棘手问题也能迎刃而解。运用和体现“构想”原理精神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草签的联合声明，博得了香港人和国际上的广泛支持，证明“构想”是能够行得通的，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想”必将为越来越多人所理解，所接受。

黄标熊、廖建祥认为，“构想”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好办法；它为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他们国家统一的经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找到了出路。

陈肇斌、王致远把“构想”的意义概括为：政治上，“构想”为安定人心，稳定大局起了重大作用，对台湾回归祖国，定会产生极大的向心作用；理论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科学社会主义上结合中国今天的实际，灵活运用的新发展、新突破和新贡献；经济上，双方彼此都有利，香港，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支持下，生产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使香港保持繁荣和稳定；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能充分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加速四化建设；总之，社会主义内地有利于香港、台湾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的港台的资本主义也有利于内地的建设；国际上，不仅使中英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以维持和发展，而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和平解决两种制度的共处问题，提供了一个明智的先例，具有世界意义。

“一国两制”构想的根据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应如何理解“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呢？张绰认为，所谓世界的现实，概括地说，就是两种社会制度，一个世界市场。所谓历史状况，简单地说，香港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还没有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香港是收回主权的外交问题；台湾是统一祖国的内政问题；我们绝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但我们是尊重历史造成的事实。所谓中国的实际，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它对更好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点，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好处。“构想”正是从这些情况出发提出来的。

许多人认为，“构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八十年代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在伟大而又复杂的四化建设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此，他们分别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对“构想”进行了探讨。

曾牧野认为，“构想”是我们在二十世纪遇到的新问题，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不可能都有现成的答案；而马列主义又始终是我们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指南；因此，“构想”的理论根据，我们应从马列主义的根本立场、方法和根本原理中去寻找。他认为最重要的根据应该是“实事求是”。

雷强认为，利用资本主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是“构想”的立论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构想”的出发点；而和平经济竞赛，则是“构想”的主要内容。

周毅之、施汉荣认为，“构想”是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指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快经济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又说：“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31卷392页、第32卷第346页）

周、施又认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它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事物无不包含着矛盾，矛盾的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利用香港的资本主义，而香港又需要大陆的大力支持。这种互相需要，就是同一性的条件，它使得两种本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矛盾，不呈现为外部对抗的形式，而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的祖国母体之中。锐之认为，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

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引自《矛盾论》),这就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共同的需要和可能。只要这种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不变,共存就不变;条件存在多久,共存就维持多久。当然,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在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时候,不要忘记矛盾斗争的一面。

王致远认为,“构想”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从长远观点看,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构想”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这一根本原理的改变。问题是,我们能否依据和创造一定的条件,使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東西,在一定期限内,能够和可以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从而达到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目的。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社会主义的大陆怎么能够同资本主义的香港和台湾共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体呢?这就要具体分析具体条件了。

香港和台湾都是我国的神圣领土,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仍未统一于祖国。它们也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同一定的国际形势相联系着的。解决港台问题,既是我国的内部问题,又不能不与有关的国际势力打交道。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其方式无非是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手。我们采取用和平的方法,即要谈判,要妥协,为了达到统一祖国的目的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谁也吃不掉谁,彼此都有利。互利,这就是双方都能接受,从而使两种对立的制度可以共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毅之、施汉荣还认为,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决策的另一理论根据。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个不平衡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国家必然长期共存。

本文参考材料:

- ①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部分讲话材料(散见于《瞭望》周刊、《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简讯等报刊)
- ②《从香港问题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创刊号
- ③《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研讨会》发言摘要 《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二期
- ④《“一国两制”与矛盾的同一性》《广州日报》1984年11月15日第五版



近两年来哲学界探讨“两变”命题的部分观点综述

陈 明 央

近两年来,哲学界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两变》)哲学命题继续展开深入讨论。现将部分观点综合介绍如下:

一、“两变”同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

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两变”命题,是对

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一种发挥,表述了辩证唯物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圆满的解决。它肯定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又阐明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同一。他们认为,“两变”的科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概括和发展。人类社会发史,在本质上说,就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历史。毛泽东提出的“两变”命题,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总规律。毛泽

东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科学概括，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把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唯物辩证地统一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一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重要的贡献。同时它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一个严密的、唯物辩证的逻辑体系。可以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把它概括为：物质→社会实践→精神→社会实践。

另一种意见认为，“两变”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回答。

持这种意见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论述，根本无意代替或发展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哲学基本问题本身是一回事，如何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又是一回事，正象考试题目和答案不是一回事一样。毛泽东同志说的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它既体现了认识的唯物论，又体现了认识的辩证法。这种革命的能动反映论，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科学回答。

第三种意见认为，“两变”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

他们认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不是科学地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科学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互相转化，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讲的。毛泽东同志是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讲认识论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两变”命题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的光辉思想，完整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有的同志还指出，把毛泽东关于“两变”命题理解为既是本体论又是认识论，既阐述世界的本原又阐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任意扩展了。他们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恩格斯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认识论问题。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二者是不能等

同的。

对于“两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论科学命题，在理解角度上也有一些不同。

有的同志主张“两变”是对认识过程的科学概括。其主要观点是：物质可以变成精神，是就人们对客观物质的认识过程来讲的。它不是说客观物质本身可以变成非物质的观念的东西，而是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眼、耳、鼻、舌、身五个官能可以把客观物质反映到头脑中来，经过头脑的加工，变成思想。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即认识运动的第一次飞跃。而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意义更加伟大的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认识运动的第二次飞跃。

有些同志则认为，“两变”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完整的科学概括。毛泽东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原理，正是在认识论方面把唯物论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法的观点三者高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生动表述。

二、“两变”同“两个文明”的关系

许多同志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包含有物质文明可以变成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可以变成物质文明的观点。“两变”是两个文明“互变”的哲学基础之一。但是具体理解的角度、观点也有不同。

有的同志提出，在人类面前有三种类型的“物质”：（1）自然变化的原始物质。这叫物质世界1。（2）经过人类实践加工改造过的物质。这叫物质世界2。（3）是“人造”物质。这叫物质世界3。物质世界2和3既是物质变的又是人们的“精神”变化出来的，打下了人的精神烙印。“精神变物质”中的“物质”，主要是指物质世界2和3，而不是指物质世界1。“物质文明”中的“物质”，是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相联系的一种物质现象，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总和，主要是指物质世界2和3而言的，不是指整个客观物质世界而言的。“物质文明”中的“物质”是“两变”中第二个变——“精神变物质”的产物。精神文明变物质文明，也是指物质世界2和3，不是指物质世界1。“精神变物质”、“精神文明变物质文明”，都是不断把物质世界1转化、变为物质世界2和3。

有的同志则认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都表现为“两变”过程。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两变”，表现为，从整体看，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过程中经由“两变”的途径产生出来。人化物质或物质文明成果的产生，包括如下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第一是提出实践精神。这是物质文明建设中物质变精神的环节。第二是实行实践精神。这是物质文明建设中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环节。第三是实现实践精神。这是物质文明建设中精神变物质的环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两变”表现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总是围绕着物质文明的建设而展开的，它只能寓居物质文明的建设之中，精神文明归根到底来源于物质文明，并且要服务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也表现为一个特殊的“两变”过程，也可以分解为三个主要环节。第一，提出建立与形势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思想与文化的任务。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始

的环节。第二，建立适合于形势发展要求的思想和文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而达到物质变精神的环节。第三，让新建立起来的思想、文化推动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精神变物质的环节。两种文明建设中“两变”有共同点，表现为：第一，它们都是实践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第二，两种文明建设中“两变”都具有自然历史性。第三，两种文明建设中的“两变”都从动态进程体现社会历史的物质统一性。两种文明建设中“两变”的区别点是：第一，两种文明建设中的“两变”具有不同的主导因素，不同的重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点在精神变物质这个环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物质变精神。第二，两种文明建设中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方向不一样。第三，二者表现历史过程的物质统一性的方式不相同。



关于郭沫若《赠达夫》诗的写作时间

吴海发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赠达夫》

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郭沫若生前手订的《潮汐集》，定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同之。龚济民等的《郭沫若年谱》则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认为都不够准确。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郁达夫正在福建省革命政府任职，他专程前往阔别了十年的日本，会见郭沫若，“劝他回国”（详见《郁达夫文集·为郭沫若氏祝五十寿》）。当晚，日本东京改造社为郁达夫洗尘，郭沫若应邀作陪。席散之前，“主人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大家题字，我自己也写了好几张。达夫坐在首席上，我是坐在他的旁边的，他也叫我写一张给他。我拿着笔踟躇了一下，结局是写出了下面的四句（略）”（见郭沫若《达夫的来访》）这次宴会即是设在十一月十五日夜里的。强有力的根据是在郁达夫的记载中。这次宴席上，达夫也应郭沫若之请写诗留念：

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

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沫若兄正

郁达夫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但是，郁达夫写诗回赠的事，郭沫若文中从无记载。诗的真迹一直珍藏在郭沫若手中，直至于听、周艾文编辑《郁达夫诗词抄》，才影印发表。

由上可见，诗应定于十一月十五日，这是无疑的了。达夫劝说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日战争，是收了效果的。一九三七年七月，郭沫若毅然离开日本归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总第六十八期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 51002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 46-64

国内定价: 每册 0.40 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 095 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